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霍英东传

 **eBOOK**
内容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从一个贫困潦倒的打工仔，到拥有百亿元的超级富豪；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到走进京城共商国是的人大常委。

霍英东的发达历来被认为是个谜。

在本书中可以找到他崛起的谜底。

他是第一位到大陆投资的港商，

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介入最早，

他对中国的老百姓贡献最大：

他向大陆无偿捐款 10 多亿元，他投资百亿元建设番禺模范新城……

他的胆识、他的气派、他的赤诚、他的慷慨，

摄人心魄，使人动情，令人折服，催人奋发！

有人评价：“上帝把霍英东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让他做生意的。

他是一个天生的商人。他的头脑就象一台运转得十分灵敏的电子计算机。”

他本人说：“江山百年一轮转。轮也要轮到我们霍家出头了。要发财、要发大财！”

胸怀大志、抓住机遇、敢冒风险。他成功了！

现在，霍英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德高望重，正积极推动着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

读霍英东的人生传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霍英东传

第一章 当今富豪 世人争说霍英东

在香港超级富豪中，霍英东事业的起点也许最低，当许多香港人已腰缠万贯时，他还在为果腹而苦苦挣扎。从一个船民之子，发展成“香港大亨”，他对中国大陆情有独钟，他是第一个在大陆投资的港商，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介入最早，支持最多。他成了大陆同胞人人皆知的名人。

在香港湾仔的扯旗山麓，有一幢可以俯瞰水天一色的钢线湾全景的石厦。里面，有一位同妻子和5个儿女（两女三男）住在一起，过着超豪华生活的亿万富翁。

他一家人拥有9辆堪称一流的、簇新的轿车。这些轿车包括两辆富豪们专用的劳斯莱斯，一辆黑色的一辆银灰色的奔驰、三辆最新流行款式的法拉利以及一辆专为上班或到华人会所玩网球的卡特勒克。

如同所有的居高临下的人物一样，他有着一整套与众不同的、奇特的生活习惯：

他每天清晨6时即起，吃一客牛扒或是一碟米饭，然后倒头又睡，一直睡到中午。除了打过网球，饮点白开水、果汁或吃一片西瓜之外，他日中不再进食。

中午起床，午后2点钟驱车抵达他的办公室。处理公务，日理万机。4点钟左右，他直赴当地华人会所，打四、五局网球；有时则去到小型足球场活动。

他是一个像夜猫子般的人，喜欢在晚上活动。整天，除了他的两个儿子能在办公室见到他，他的母亲能在每日上床就寝前通过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其他的家人于午夜之前，很少能窥视到他的踪影。

到了午夜、整幢楼厦通明如昼。他依时端坐在大饭厅的16英尺的西式长台前，补足一天的营养。他的夜宵通常包括蒸鱼（石斑、鲳、鲈、鲑等）、烧乳鸽、鸡以及玉米、芋头、眉豆、粥或饭，每一道菜都用精致的高脚瓷碟盛载着。在由他筹建的广州白天鹅宾馆餐厅和中山温泉宾馆里，人们即可以领略到这种高脚的盅、碟所带给食者的隆重、高雅和赏心悦目。

他那视为掌上明珠的小女儿霍丽娜，曾经对采访她的记者说，“我不晓得父亲是在什么时候工作。也许，他在办公室里很忙。但我想他大部分工作是搭车或打网球时在脑袋里完成的，因为他所作出的决定都是突如其来的。他的秘书陪他到网球场，而他往往就在球局间签署文件和发往世界各地的信函。直到午夜回到家里，他才松弛下来。像一个平平常常的爸爸一样，他和我们围在饭桌前谈天说地，又笑又闹，直至凌晨两点……”

他富甲一方，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在香港这样豪宫麇集的社会里，也在首屈一指之列。香港文艺书屋在《香港亿万富豪列传》中，将他列为开卷首富是不无根据的。仅从1978年以来，据粗略地统计，他在中国大陆的捐款、低息或无息贷款、投资等总额当在10亿港元以上。这绝不是他财产的全部。也许只是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人只要在阳光下站着，难免就会有影子。对于他也是一样。有褒、有贬，勿需讳言。

褒者，常在人前。香港有一家报纸在刊登文章谈及到他时，曾用了赫然16个字来概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名成利就，爱国爱乡”。中国

大陆报纸的标题，更是抢眼：《拳拳报国心》、《壮哉，龙种》、《愿炎黄子孙成为世界强人》、《为祖国的“四化”添砖加瓦》、《满腔热情惠乡梓》、《成功比黄金更可贵》等等，不一而足。

贬者，多在人后，躲在暗处，小作文章。有一位署名叫做“乐文送”的香港报人，在一篇文中不无所指地写道，“财富、名望、地位，是许多人一生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看过，也听过，不少富商巨贾在积累了亿万财富以后，怎样痛苦和千方百计地去追求名望和地位，他们或因为出身背景不好，或因为过去经营的生意有污点，即使在社会里知名度很高，却不能得到社会人士的真正敬重。财富也许会给他们带来权势，呼风得风，唤雨得雨。但他们敏感的耳朵里时常会听到背后窃窃的冷笑……总会叫他们难受一阵子……”

然而，褒也罢、贬也罢、捧场也罢、诽谤也罢、言之凿凿也罢、捕风捉影也罢，既无助于、也无损于他一根毫毛——他，还是他！挺直着脊梁、微笑着，矗立在人世间的大舞台上，挥洒自如地扮演着命运之神分派给他的“角色”。“戏”没演完，也绝不会轻易地脱下他的“外衣”。

有道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香港超级富豪中，他的事业的起点也许是最低，他本是个船民之子，当许多香港人已腰缠万贯时，他还在为果腹而苦苦挣扎，他没有祖业可以继承，完全凭着自己的目光远大和勤奋智慧，赤手空拳打天下，创建了自己的王国。

现在，他的个人资产达 150 亿元，被认为是香港的第二大富豪。单看他捐助国内及注资东方海外两宗大子笔，已可窥其财富之巍巨。

1984 年，他捐出 10 亿港元成立冠以自己的名字的基金会，每年将收益的一亿港元资助国内各项建设及教育。

在中国大陆，他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在大陆投资的港商，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介入最早，支持最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称赞他：“你的贡献很大！”他成了大陆同胞人人皆知的名人。

他今年已 70 多岁了。中等身材，虽然说不上宽肩蜂腰，却也是显得十分匀称、矫健。华发早谢，一张被户外的阳光晒得黝黑的、健康的脸上，刻下了几道岁月流逝的年轮。一副坚毅的、轮廓分明的男性的下颚，特别是那一双炯炯的眸子，但露着内心的坦荡、精明、沉稳和力量！

从一定意义来说，他是一个“金钱万能论”者。他公开地宣称，在如今的中国大陆“没有钱说不上话，也帮不上忙，有钱才有发言权……”所以他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举动，几乎都是以“钱”为前提的。尽管他经常有机会接触到邓小平等高层的决策人物，但是可以想见，如果离开了他的“钱”，空有报国之心，也定是一事无成的！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他的名字等同于捐款、馈赠、投资，等同于支票、汇单、信用卡，等同于港币、日元、美金……写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一次招待会上所听到的一段对话：

“他是谁？”

“你问的是那个秃顶的港客？”

“是啊！”

“他叫：现钞！”

“现钞？”

“他就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全国人大常委……”

“天哪！这就是他？！”

不错，这就是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遇这闻名的、有争议的新闻人物，一个香港的超级大亨，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中国人，一个纯粹的“龙种”！

他的名字叫——霍英东！

第二章 降生海上 险涛恶浪是故乡

霍英东一家漂零香江、浪迹伶仃，已有 100 多年了。他就是降生在父亲驳船的舱板上。风浪无情地吞噬了他的三位亲人。

霍英东是苦出身。

公元 1923 年 5 月 10 日的拂晓，他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水上人家。

没有医院，没有产房，没有妇科大夫。

浓重的铅云，压在浊浪翻涌的深水湾上，风像一个不知廉耻的流浪汉，随意地在棚隙间窜来窜去。

母亲就要临产了。一声、一声痛苦地呻吟着。

父亲手脚无措地在舱里、舱外走动。不知该做什么事情。他帮不上忙。空有一身蛮力，使不上劲儿。

孩子已经露出头来了。母亲疲乏地躺在血水中……多亏隔邻船上的一位阿嫂，她姓何，闻声跨过船舷。慌忙地洗了洗手，上前把孩子接了出来。

是个儿子！

何嫂在小东西赤溜溜地屁股蛋上，拍了三下。“哇”的一声，他豪壮地哭了起来。这即是霍英东的人生交响乐第一乐章悠扬如歌的序曲。

他是霍家的第三个孩子。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个哥哥来到了这个动荡的、常年与风浪作伴的世界上。

他生在香港。这是不错的。然而，说是“出生地”则不甚确切。他不是出生在陆地上，而是降生在他的父亲驳船的舱板上。这，是他的“诺亚方舟”！

霍氏是一个大家族。有人考证，往前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候霍去病和其弟奉车都尉霍光。源远流长，后裔犹存。据说，霍氏近十世的宗谱是：“和盛茂发达，耀好应时兴”。宗谱，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属于“国粹”一类。论字排辈，其俗久矣。孔、孟之家，自不必言。一般的姓氏人族，也无不以此联宗、认戚。譬如，湖南韶山毛氏宗祠，也存有家谱。近十世谓之：“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毛泽东是“泽”字辈，毛远新是“远”字辈了。

霍英东属“好”字辈。最早的名字叫：霍好刊（又名：霍官带），如今已鲜为人知了。据说大约在 1939 年前后，有感于日寇入侵、国土沦丧，年轻气盛的霍家小子愤而改名为“英东”。取其“英姿勃发于世界东方”之意。

霍英东的籍贯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不甚了了的“谜”。

据说在美国那样的国家里，并没有籍贯这一说。入境时，在移民局的官员发下的表格里；也只有“出生地”一栏，于是，就有了“在哪里出生就是哪里的人”的说法。这当然与美国的建国历史短、国民组成复杂、民族众多等原因有关。国情不同。无可非议。

我们中国人则不然。“籍贯”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籍贯即是宗祠、即是祖屋、即是者井、即是故乡……所谓“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更有所谓“月是故乡明”的诗句。

霍英东一家从祖父那一辈或更早，即漂零香江、浪迹伶仃，已有 100 多年了，他的祖父名叫霍达潮，曾拥有大风帆船来往于省、港、澳；到霍英东出世之时，家境已潦倒贫困。当时对于一个穷人来说，成年忙于糊口奔命。即没有“光宗耀祖”的福份，也没有“荣归故里”的奢望。籍贯在哪里实在

无关紧要。

管它哩！船泊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然而，霍英东是一个有心人。

1978年秋日，年近花甲的霍英东回大陆寻“根”来了。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谁都懂得对于这位巨富的港商将要寻到的“家乡”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是，从省里到各个地、县都行动、活动、开动了起来。

据霍英东口忆，曾隐约地听父亲说起过，他们的祖籍在广东珠江三角洲顺德、南海、番禺、中山一带的水乡里。

但却不知几经沧桑，如今划归到了哪一个县、哪一个区、哪一个乡？

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时的所谓“D县与P县之争”。两个县都有霍姓的人户以及零星的村落。甚至也都居然找到了古稀的老人，忆及霍英东的祖父离乡时的情景……双方争执，相持不下。不仅县的头头们出面了，公安局长也亲自调查，作了旁证。

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定论？

幸亏省府的一位陪同人贝灵机一动，从唐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得到了启示：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元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当即从语言研究所，请来了两个专攻广东方言的学者。通过与霍英东促膝长谈，两位学者居然从他的谈话中，听出了“洗脚”、“上床”、“装香”等几个词尾的归音的差异。权威地断定霍英东是“番禺”县籍的人。

从此，霍英东就成了祖籍番禺的爱国港商。

莫要说这场两县之“争”没有意义，它的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是；霍英东当即慷慨解囊，捐赠给故乡一幢称得上豪华。一流的“番禺宾馆”。接着，又出资兴建了现代化的医院、学校、图书馆以及体育场等。

有道是“亲不亲，故乡人”嘛！

霍英东的父亲是一个水上人。

在香港这样的赤裸裸的金钱社会里，做一个穷人是低下的。而做一个水上的穷人，则更是低下。

世人将水上人称之为“水流柴”，意即为无家无业，随水漂泊；更有的将之奚落为“蛋家仔”——你见过在洼死水上漂浮着的半边鸡蛋壳么？稍有风雨，或调皮的孩子扔一小块石子瓦片，即告覆没，沉沦到那龌龊不堪的洼底污泥之中。这就是水稼人命运的形象而又生动的写照。

水上人谋生一般有三条出路：

一曰打鱼。礁磐上来去，风浪里出没。一年里赶四回“渔汛”。谓之：春汛、暑海、拖风、放钓。好不容易从龙王爷的嘴边捡回一条命来，又倍受渔霸、栏主的盘剥，所剩无几，糊口也难。

二曰做盗。拉几条不要命的汉子，啸集在航道要冲。有枪使枪，无枪使刀。渔叉、铁棒也能吓杀软骨头。海盗这营生不需本钱，冒的风险也大。民国初年，在香山海域有号称“单眼王”的海匪，群聚小横琴岛。后被警方捕

捉，毙死在滩头上。

三曰驳运。俗称“舢板客”。筹得一条宽不盈半丈的小船。在海湾里摇橹、打桨。为大轮船卸货。风中、雨中，日里、夜里，搬上、搬下，驶来、驶去……出的是牛马力，挣的是血汗钱。偶尔一次半次的；捎带走私一点黄的（金）、白的（银）、黑的（烟土）的情况，也是有的。但他们多半都是规矩的、只求温饱的穷苦人。霍英东的父亲做的是驳运生意。从他的祖父身后继承得一艘驳船。年代已久，破旧不堪。稍一超载，即舱底进水、险情四伏。苦挨、苦挣，居然也熬了许多年。他是一个瘦小的汉子，人缘极好。被海风侵得黧黑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如同大多数的舢板客一样，一年四季，赤脚往来。

“他甚至已经不习惯穿鞋。”有一次，霍英东对记者回忆道，“那一年农历新年，我父亲在母亲的强制下穿了一双新鞋上岸。他跷着二郎腿在大排档吃云吞面。吃完了就回家，把鞋子留在了那里。”

这也许是霍英东唯一记忆犹新的事情。父亲的印象，对于他来说是朦胧而又淡漠的。毕竟他那个时候，还不谙世事。

1929年，对于霍家来说是灾难的一年。他的父亲在一次风灾中舟覆人亡，3天后，才在九龙奎湾的沙滩上发现了尸体。就地草草地安葬在隔海的青衣岛上。

孤坟荒冢。一家人悲恸欲绝。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半点的怜悯。仅仅只过了50多天，又一次出海翻船。幸而霍英东在海边打野蚝，不在船上。两个哥哥（一个13岁、一个11岁）落海淹死，葬身鱼腹，连尸体也没有能找回来。母亲死命地抱住一段残橹，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幼子被风浪吞噬而无能为力。当过路的渔船把她捞起来的时候，她早已昏死了过去。这一年霍英东只有7岁。

第三章 贫民窟里 环境恶劣度童年

父亲死后，他一家迁居湾仔一座摇摇欲坠的旧楼里。没有电灯、没有厕所、没有水，有的只是流行的“肺癆”。

霍英东童年的记忆，是与棚户区的生活分不开的。

父亲在世时日子已很困难。他撒手一去，一家人的生活就更没有着落了。他们只好迁居到了湾仔棚户区水渠街的一座地裂、屋漏、摇摇欲坠的旧楼里。

棚户区，即贫民窟。这是香港畸形社会所特有的产物之一。自开埠至今，一直没有真正的绝迹。正如同《香港亿万富翁列传》的编者在“导言”中所写到的：“香港的社会，以目前的情形而论，不患寡而患不均。富者虽无法田连阡陌，却是洋楼成堆；贫者则是道道地地的身无立锥。”

在霍家当时所住的一间大屋里，不过 20 几个平方米，竟横七竖八地挤住了 50 多个人。宛如成堆、成叠的沙丁鱼罐头。

“在那又破又旧的地方，有些睡三层碌架床，有些睡帆布床，有些晚上才开一张床板。如果天气太炎热了，就把床板铺在骑楼或者花架上。”霍英东回忆说。

没有电灯。只有一盏煤油灯，在穿堂风中飘忽着火苗。把人影时而拉长、时而扭曲。幸而这如豆的灯光通宵不熄。

没有水。只有一口渗进了海水的浅井，在屋后的空地上。干旱的天，那水又咸又涩。煮出来的饭，如同药般难以下咽。冲过凉后，浑身发痒，粘乎乎地不自在。

没有厕所，只有一个芦席围起的简陋的茅坑。上无顶遮，下无泄道，蛆虫爬得到处都是，且只有一个坑位，男、女共用。

最要命的，还是当时流行的“肺癆”。由于卫生条件差，全屋有半数以上的人染病，痛苦的咳嗽声，通夜不绝；带血的浓痰，随处可见……霍英东曾对笔音谈起，有一夜就从屋里抬出了三具骨瘦如柴的尸体：

一个是在码头上扛活的 60 多岁的老搬运工人；

一个是不满周岁的女婴；

一个是粤戏班子里混事的、拉高胡的中年汉子。

还有，“同楼之中，梁光华的一家死于肺病·这是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霍英东度过了他的几乎全部的童年生活。今天我们在霍英东身上所看到的许多平民气质，譬如可贵的同情心、平易近人、简朴谦逊以及热心于体育、公益教育事业等等，与他童年的棚户区生活是不无关系的。

如果今天你再去湾仔。当年霍英东住过的那一间大屋已不复存在了。据说，20 年后它已成为了霍英东购置的第一批地产中微不足道的一星半点。具有戏剧色彩的是，霍英东在这块地皮上盖起了属于他个人的一排大厦。楼厦入云，俯视着不远处的、几乎与当年别无二样的——新的棚户区！

霍英东一辈子也忘不了，那震响在童年时代的两声枪响。这是一个未经证实、传说中的故事。

在霍家所居住的棚户区的右侧，有一座面海的、叫做屿后山的小丘。丘间，汨汨地淌下来一条清溪。它有一个不雅的名字：马尿河。这是霍英东及

其童年的小伙伴常去玩耍的地方。

9、10月间，酷暑刚过。满山玫瑰紫的岗稔花，结成了一颗、一颗饱满的果实。有小枣一般大小。吃在嘴里，津甜、津甜的，比桑葚的味道还要甘美一些。只是里面有许多芝麻粒似的小籽。小家伙们顾不上把它吐出来。第二天随着大便原封不动地留在荒郊野地。于是在他们蹲下的地方，来年开春又长出一棵棵岗稔的小苗，当年就能结果。

10岁的霍英东像一只调皮的小鹿，成天出没在屿后山的丛林间。嘴唇让岗稔果的颜色，染得紫红、紫红的。

那一天，一个叫做大头仔的棚户区的孩子，从衣兜里掏出来了一个物件，在孩子们的面前炫耀着。

那是一个用锡浇铸的小狗。

“这是谁给你的？”霍英东问。

“我爸爸！”大头仔自豪他说。孩子们都知道，霍英东没有爸爸，他的爸爸落海死了。

“是用铁打的吗？”

“不是，用子弹头熔的！”

“是在打靶场捡的弹头？”

“是的。你敢去吗？”

“不……”霍英东想起母亲的告诫。她不许孩子到山那边的英军射击场去玩。

“胆小鬼！你不去，我们去！”

霍英东到底没有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也随着小伙伴一起去了。

他们一共5个孩子。

钻过稀疏的铁丝网，跳进壕沟。总共有6个靶位，并排立着。背后，蜂巢般的岩壁上嵌着一粒、一粒铅的弹头。霍英东就像神话中的阿里巴巴进了遍地都是珍宝的山洞，自顾自地起劲地挖着、刨着、拾着、擦着……好不兴高采烈！

“砰！”“砰！”

倏地，传来了两声枪响。

霍英东一惊。侧目望去，只见大头仔和另一个孩子倒在血泊之中，四肢还在痛苦的抽搐着，兜里的岗稔果，撒了一地……

是番鬼开枪了！

霍英东下意识地把手里的弹头一摔，呛喝了一声，与另外两个孩子一道，飞快地越过了壕沿，向铁丝网外窜去。

远处的靶台上，传来了几个英军喀布尔士兵开心的大笑。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一天以后，霍英东和其他几个孩子的家长都收到了“私人禁区，扰乱军事操练”的罚款通知书。不是死了两个孩子吗？是的，要知道在香港这一块英国殖民地的土地上，英军打死闯入禁区的华人是负法律责任的。过了一年，霍英东又瞒着母亲去了一次打靶场。只见大头仔他们躺倒的那一片壕沟底，长出了许多株岗稔苗儿。在如血的夕阳下，擎着一朵又一朵紫红的小花……啊，童年的小伙伴！

第四章 艰难时世 穷人孩子读书难

一天从书院回来，听见一个黄脸婆与母亲嘀嘀咕咕，要把 15 岁的妹妹送到什么地方去“赚钱”。霍英东怒不可遏，进屋赶走了那女人。从此，再没有去学校。他要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挣钱养家。

霍英东没有上过几年学，更不要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及出外留“洋”了。

香港有一本畅销书，有一章是写霍英东的老友、商界巨子何鸿桑的，说何鸿桑比起一些“一脚牛屎、半文盲的亿万富翁”来说，在各方面都有“更优厚的成功条件”。

说得多妙啊，“一脚牛屎、半文盲”！够生动！够尖刻！够刺激！

这里说的却不是霍英东（一般人理解，当指的是养猪出身的超级巨富、香港中央建筑与合和实业的董事会主席、传奇人物胡忠——知名人士胡应湘之父）！

在香港，学历毕竟不是最重要的。有人刻薄地写道，“香港是一个只有一种价值——钱的价值——的社会。钱之外再无其他。”

20 年代，阿拉斯加曾经出现淘金热。香港无金可淘。但如你有本领，却可合法地抢钱。今天香港人的口头语是：这是一个抢钱的时代。谁把钱抢进自己口袋，谁就是成功人士。亿万富翁冯景禧、郑裕彤都只是小学毕业，如今有多少博士乐于供他们驱使？他俩曾联名捐中文大学岭南研究所一张港币 250 万元的支票，堂堂的大学校长也要到门口迎接。”更有人直言不讳地宣称，“今天香港，生男不如生女，读书不如从商。”“香港是漂亮女人的世界，是精明商人的世界。”等等，看似荒谬，实则道出了真谛。

霍英东的母亲虽然自己目不识丁，但却希望自己的儿女知书达礼。大约在他 6 岁那年，便由别人背着女拜师启蒙。拜师的仪式颇为隆重：用棋子饼和一把葱供拜孔子圣人，以喻聪明。最初读《三字经》，老师先教“幼而学。壮而行”。然后读《千字文》“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直到 9 岁那一年，母亲才把霍英东送到了棚户区位于湾仔克街的一间叫敦梅小学的免费义学读了 3 年。这是某一个慈善机关办的学校，谈不上什么教学六准。只不过是把一群衣衫褴褛的贫民窟的孩子，集合在一起唱唱英文歌而已。霍英东在这一所免收学费的小学里的成绩报告单，早已不知其所踪。在一篇港人所作的专访里谈到“霍氏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和超出肖人的智力”，其根据想必只能是臆断了。

1936 年，霍英东考入了皇仁书院第八班（即 F1），入校的号数是 19737 号。“那时 13 岁，父亲早已过世。家庭生活全赖母亲维持。每月学费 5 元，几乎令全家人勒紧了裤腰带，每天妈妈还给我一毫子，用来搭电车和午饭开支。清早起床，背上书包由湾仔经玛利兵房、兵头公园步行到荷里活道上学，来回每天节省 6 个仙的电车费。”以今天的眼光看去，皇仁书院是类如中学似的学校，学制为 5 年。在这里，霍英东接受了较为完备、系统的学校教育，度过了他的几乎是全部的学校生活。霍英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绩排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脸红。”

如果填写学历的话，霍英东应当填上：“中三”！

这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

霍英东真正看重的，是社会这个大课堂；他真正读通了的，是人生这本书！他对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儿子说。“你的第一课在这里，从你处理业务的第一天开始！”

这就是霍英东的信仰：一个商人要在实践经验中成熟，学历并不是最必需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使他的5个孩子。全部完成了大学教育。

“完成学业是重要的。”霍英东对一个采访他的外国女记者说，“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形成有极大影响。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关心社会，避免罪恶。”

假设时光能够倒流，假设不是爆发中日战争，假设17岁的霍英东继续在皇仁书院读下去，他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模式的“霍英东”呢？

谁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

霍英东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妇人。

丈夫在世时，她侍候大夫、哺养儿女，里里外外一把手，把一个家管理得有条不紊；丈夫去世后，她毅然地独肩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多么艰难的时世啊！在香港那样的社会里，又逢巨业萧条，一个妇道人家自我立身电难，更何况她还要抚养3个儿女——那时霍英东不过7岁，他的两个姊妹一个9岁、一个5岁。都正是只能吃饭、不能做事的年龄。

怎么办呢？

母亲决心拼死力维持住先夫留下来的那一份小生意，即是驾驳船出海，与外海的货轮接洽，代他们转运货物（当时主要是煤炭）到岸上的货仓。

她自家已没有了船。

只好充当中间人。起早贪黑，来回颠簸。与货主磨嘴皮。把生意拿下来。然后再与其他的舢板客签约，将货运工作分派给他们做。从中藉以赚取微薄的佣金。

遇到风起浪涌，驳船出不了海。她只好望洋兴叹。

有时候，货船的吨位大货物多，驳船供不应求，舢板客坐地起价。人不敷出，她就要赔钱了。

她没文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她有一张求人的嘴。她认识船上的人，船上的人也认识她。她的丈夫生前的人缘极好，工友们可怜她一家孤儿寡母。每一个人手指头间漏一点。牙齿缝里省一点，勉强也够他们一家糊口的了。

其间，又有过两次翻船落海，她都侥幸遇救活转过来。

霍英东在谈到他的母亲时，曾感慨万分地对人说，“她就像村头的那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榕树；又像一只尽职的老母鸡，把鸡雏都护在羽翼下……”

三更梦醒，霍英东常见到操劳、奔波一天的母亲，还在灯下补补连连，穿针引线忙个不停。

霍英东学生时代的最后两年，是在动荡的时局中度过的。

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见之于各报端。

在欧洲：希特勒称“欧洲应建立新秩序”，“要用一切手段使德国人占有全世界”（1936年3月21日）；

英国的首相张伯伦飞抵柏林。“与希特勒握手言‘和’”（1938年9月15日）；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正式签字”（1938年9月30日凌晨1时半）；24个师的德军“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开进了彼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5年3月15日）；

希特勒声言德国受到了“侵略”，德国军队奉命向英、法的“盟国”波兰，发起闪电式的进攻（1939年9月1日）；英、法两国政府先后对德“宣战”（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亚洲：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芦沟桥事变”。日军“蛮横地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

1937年7月30日，北平、天津“在一天们相继弃守、沦陷”。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炮轰上海闸北一带，同时飞机也“对我狂轰滥炸”，张治中将军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奋力应战”；11月12日上海“陷落敌手”……

是时，香港亦处于极度的惶恐和不安之中。大批“难民”自平、津、沪、宁携资金南来。金融、商业市场大起大落，一片混乱。

战云密布，航道滞阻。

依附于海上货运业的小驳船生意日趋淡冷，霍家的生计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据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一位“同窗”忆及道，“他算不得是一个天才。看不出有什么出人头地的地方。成绩在A、B之间。似乎理工方面更好一些。英文不行，从不主动与先生和同学进行英语对话。他很用功。生活得十分艰难。家里贫困，常常不吃早餐就上学，有一次我见他将一只‘糯米鸡’（一种包肉的糯米饭团——笔者注）吃了一半，又包起一半留在中午吃……他爱踢‘波’（粤语：球——笔者注）却只能玩一会儿。匆匆地赶回家去，帮他的母亲做事。”

霍英东自己回忆说：“我课余协助母亲记帐和送发票。在学校，我用功读书，但经常精疲力尽。”

1941年4月，霍英东经过5年半的校院生活，升到三年级（相当于现今的F6），再过50多天就要进行“大考”了。由于太平洋地区的战局紧张，盟国的军舰频繁地出入香港海域。据说，一次他母亲的驳船被一艘美军的登陆艇撞翻。虽然救起。她却染上了肺炎而卧床不起。

家中早已四壁如洗，且欠债累累。米价一日三涨，眼看就没有活路了。

这时候的霍英东虽然个子不高，却也已长成了半大的小伙子。这一天从书院回来，听见一个穿花对襟衫的黄脸婆与母亲嘀嘀咕咕，要把15岁的妹妹送到什么地方去“赚钱”。他怒不可遏，进屋赶走了那女人。第二天，他就没有再去学校。

他要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挣钱养家，辍学这一年。他正好17岁。

第五章 人间苦力 油桶压断无名指

他踏入人生的第一件差事，就是当苦力。在渡轮上加煤添火，在启德机场扛石运料，受人歧视。遭人侮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霍英东踏入人生的第一件差事，就是当苦力。

在往来于九龙与香港间的一条渡轮“维多利亚”号上，做加煤添火的工作。

当时，由尖沙嘴穿通的海底隧道还没有兴建。所有人等，都必须乘坐渡轮过海。大肚皮、高烟囱的蒸汽机轮，巍巍然堂而皇之地进出港口码头。长长的一声、一声的汽笛，在海湾回响。

外表漆得洁白、涂着金线的渡轮，底舱却是一个但丁笔下《神曲》中的“地狱”。3英尺见方的炉口，喷吐着炙人的火舌。宛若是一条条冲出地狱的响尾蛇，发出了呼呼的响声。加煤工必须一刻不停地一铲、一铲地将原煤抛进膛里。

抛急了不行，会压着“人势”；抛慢了也不行，会燃过了“火头”。这里要求一种机械式的运动，简单的但却也是令人难熬的苦力勾当。

领班的工头姓钟，啤酒桶似的身胚。人们都叫他“肥佬钟”。他曾经也做过驳运生意，因为赌钱，把一点儿家当都赔了进去。只好上渡轮卖苦力。

那天他在码头上，遇到了霍英东。小伙子正在跳板边揽活，帮忙拎个皮箱、递个货包什么的，看人的脸色，得个5仙、3毫的。肥佬钟与霍英东的父亲原本是“把兄弟”，都属于水上人的“帮会”。他二话没说，就把霍英东拉上了船。

正好头一天船主发话，要添一个加煤的小工。

个头虽然瘦削一点，但还算结实。只要不偷懒就成。行。看你肥佬钟的面子，就留下他吧！

霍英东干得十分下力。

从凌晨5时半到午夜12时，一天近20个小时的活路，3个人来回倒班。本来“钟叔”也算一个工，“但他是工头，又爱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倒在煤堆边酣睡，他的那份工，只好由我们3个分摊了……”霍英东后来回忆悦。

铲一天煤下来，浑身像散了架。吃什么东西也没味儿。锯木屑似的往肚子里塞吧。只想睡觉，回家马马虎虎冲一个凉，还没等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梦里，手臂还在一铲、一送、一抛地运动着。不得安宁。

霍英东一气儿子了9个多月。那天，合该有事几。

肥佬钟在当班的时间又喝醉了，躺在煤堆上打滚。霍英东把他搀进了底舱一间堆放工具的小房。这家伙“哇”的一下，像倒柑水桶似地把肚子里的吃食都吐了出来。霍英东手忙脚乱还没等收拾利索，就听得锅炉房那边有人在叽哩呱啦他说着什么。

糟了！

霍英东急忙跑回锅炉房。衣襟狼藉一片，满身酒气。却正好与百年难得到底舱一次的英国老板撞了一个满怀。

这时，早已过了霍英东接“班”时间。英国佬打鼻孔里厌恶地“哼”了一声，扬手给霍英东一个耳光。

当即、霍英东就被解雇了！

霍英东实实在在地尝过“亡国奴”的滋味。在这一方面，他有着比别人更为直接、更为痛切的体会。

从小在殖民地的香港长大，受人歧视、遭人侮辱自不必言。作为“劣等贱民”的华人，尤其是华人中的穷人、穷人中水上人，更被人看低三分、五分以至十分。小伙伴被英军操演时枪杀，自己平白无辜挨英国老板的耳光……所有这些，都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然而，不仅如此。

命运决定了他必须承受另一个血腥的侵略者带刺的马靴！

1941年12月8日，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队在西南太平洋（即人们常说的“南洋”），向美、英、荷的殖民地发动了进攻！12月10日关岛失守，美军330人全部投降；同一天日军占领吉尔伯特群岛的申马金岛和托拉华岛；12月22日威克岛上的美军升起了白旗……守卫香港的英军曾吹嘘说，他们至少能守六个月。但没等到圣诞节（12月25日），装备精良的英军就全部投降了。前后仅18天，就把香港这颗在东方与印度齐名的“女王皇冠上的宝石”，拱手奉献给了日本皇军！

有钱的人纷纷暂避于澳门。当时因葡萄牙在欧洲“中立”未卷入战火，澳门故可偏安一隅。

在而后的3年零8个月的黯淡的日子里，霍英东和其他数十万香港同胞一起，生活在“日本仔”嗜血的刺刀之下。惶惶不安，度日如年。

被渡船解雇以后，霍英东备尝苦楚。肥佬钟又热心地介绍了几个活路。但因百业萧条，都不长久！

这里有一段插曲。当时许多学生参加校外的歌咏团，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霍英东的妹妹就是在歌咏团认识妹夫的，以后双双返回内地，到了广西宜山。妹妹在法院当秘书，妹夫则在一家学校教英语，他们来信说，霍英东去那里，也可以当英语教员，一月薪酬80多斤米。多开心啊！霍英东原来也打算去，但要步行十天的路程，妈妈走不动。霍英东只好留下来，在香港照顾妈妈。

20岁那一年的春天，日本人扩展启德机场，招收本地劳工。霍英东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机会。

当苦力的，每日有7毫5仙的工资和半磅米的配给。这在当时，可是极难得到的待遇啊！

在烈日下曝晒，无遮无挡。扛石运料，压得人背弯腰折。日本监工背着手到处转悠。稍不遂意，抬腿就是一皮靴。直踢得你灵魂出窍。还要反剪着手，挨一顿鞭抽。

从霍英东所住的棚户区到机场，差不多有10多里路。如果图方便的话，每日的交通费就要花去8毛钱。

这怎么能行呢？

霍英东只好每天早晨5时即起，喝一碗稀粥或是一块番薯，匆忙地小跑着去天星码头。能混最好，不能混就花1毛钱过海。在父亲一个生前要好的舢板客的席棚里，寄放有一辆残旧的英制“莱里”脚踏车。霍英东骑上它直奔机场。遇到车胎爆裂或是其它的意外没法骑了，就以步代车、一路长跑去到戒备森严的机场工地。

哪里是做工哟，分明是搏命！

“现在想起来，肚都饿哟！”40多年后，霍英东在豪华的白天鹅宾馆总统套房里对一位作家说，“清水一样的稀粥，拉一泡尿就没有了。晨午还可以坚持，到了傍晚就肚皮饿得直叫，即使吃完晚饭，肚子也只填充了十分之一。躺在床上，还梦见干饭一碗一碗的……”

霍英东的十个手指中，有一个指头显得僵硬。他告诉记者，“这还是在同德机场当苦力的时候，不慎给压断的。”

香港的启德机场在九龙半岛上，毗连九龙城，面向九龙湾。南侧有一条长长的、颇为壮观的跑道，直插在维多利亚港内湖般的海湾之中。

日寇占领香港，意犹未尽。194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马尼拉，接着。开始了对菲律宾八打雁半岛上的科尼吉多要塞长达4个月的进攻。同时，在1月下旬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的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的海、空军基地，继而准备向苏门答腊和爪哇进攻。不仅如此，1月上旬，日军决定向缅甸南部发动进攻，在最短时间内离开萨尔温江的军事据点，进而攻取首都仰光。

面对这样一条漫长的战线，日寇扩展香港启德机场的战略目的和企图，不言而喻。

当时，“似乎有一个盟国的特工小组在机场活动”。

一有机会，就可以发现有人明目张胆地怠工或破坏机场的设施：

加油车被人扎穿了轮胎；

跑道上挖了一道深沟；

指挥塔突然断电；

刚修好的围墙，又被推倒……

更有甚者，一架满载着军需品的日本运输机起飞不到5分钟，就一头栽进了波光粼粼的九龙湾。据说，这是因为飞机上的制导系统遭到了破坏。

日本仔气急败坏，采取了严厉的惩戒、报复措施。

有人亲眼看见，日本人的两条大狼狗，将一个因为“打野外”（拉屎）而越过警戒线的中国苦力活活地咬死。凄厉的喊叫，撕扯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然而，霍英东当时似乎却没有参加任何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一是因为害怕（这不是主要的）；

二是没有人注意到他，一个沉默寡言的、瘦小的半大孩子。

“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说不定多会参加的。”霍英东后来说。

这一天，日本人吹哨下了工。天已经麻麻黑了，霍英东精疲力竭地拖着双脚向铁丝网外走去。

突然一个矮墩墩的、留着两撇仁丹胡子的日本监工追了上来。他让霍英东和其他十几个工友打转身去，有几车汽油桶要卸。

又整整卖了一个多钟头的命。

眼看就要卸完了。霍英东左手扶在卡车的底板上直喘粗气。谁料想站在车上的一个被人叫做“鸡泡鱼”（一种有剧毒的豚鱼）的中国工头，一脚将一个50加仑重的满满的一汽油桶滚了过来。霍英东抽手不及，汽油桶正好压无名指上，指头“叭嗒”一声断了。十指连心，痛彻全身。

血，一滴一滴地洒在机场正在扩展着的跑道上。

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想当一个“顺民”也不易啊！

第六章 社会课堂 听何叔讲古论今

霍英东想，我非干出一点名堂来不可。何叔说：“江山百年一轮转。”轮也要轮到我们霍家出头了。要发财、要发大财、要发大横财！

霍英东虽然辍学许久了，但他却在湾仔棚户区的一间小窝棚里，找到另一个课堂。

窝棚坐落在一个不大的鱼塘边。四根竹竿交叉撑起，铺几张苇席即所谓的“马架”，一侧是一个吊脚楼似的厕所，也用一张破苇席遮挡着。附近的后生仔多喜欢光顾这儿的坑位。一是空气相对好一些；二是大便掉在塘里游鱼来争，也是一乐。当然最引人的，还是可以捎带拐到小窝棚来，听何叔讲“古”（粤语：故事）。

何叔，是一个老者。他看上去有 50 多岁，祖籍是广东宝安。自小北上混事，一直在四川和沪宁等地当公务员。“八·一三”后随难民到了香港。也有的传说他是犯了案子（老婆和人私通，他用柴刀劈死了奸夫和淫妇）而潜逃的。

何叔的差事是替人守塘。鲩肥、鲢嫩、鲮鲜……日夜看护，严防偷捕。他嗜酒，却从不醉。一盅在手，飘然欲仙。信口开河，游戏人生。

第一次见面，他冲着霍英东劈头就问了一句。

“小兄弟，你想做官么？”

“我……”霍英东一愣，不知应该作何回答。

“世人谁个不想当官呢？”何叔抿了一小口肉冰烧酒，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我教你们求官的六字真言。小兄弟有了这‘六字真言’，以后当上香港的布政司，也没有啥子稀奇的。你听好！”

最后这几句话。他是用四川话说的。霍英东听去，颇有些怪声怪气。

“何叔，你快说说！”屋里的其他几个后生仔凑趣他说。

“好。”他操着半懂不懂、似通非通的四川话讲道。就像峨嵋山的佛爷读经似的，“这六个字是‘空、贡、冲、捧、恐、送’。六字俱是仄声。具体来说……”

霍英东听去，如坠十里雾中，茫然不知所云。

深夜，踏着星光回到屋里。放下床板躺下。霍英东久久不得安睡。脑海里潮水一般翻卷。

做官？

霍英东想也不敢想。似乎听母亲说过，霍家的光祖也是当过官的。早呢，两千年以前。皇上封了“侯”，就如同现在授了“爵”一般，可能比香港的总督还大、还威风！如今败落了。

为什么霍家不能再发达起来呢？

我霍英东非干出一点名堂来不可。何叔说，“江山百年一轮转。”轮也轮到我们霍家出头了。

再也不能安干这种比要饭强不了好多的日子啦！

细想何叔说的当官的“六字真言”。说到底是一个“钱”字。有了钱，才得“它”、才能“贡”、才敢“冲”、才会“捧”、才善“恐”、才舍“送”要发财、要发大财、要发大横财！

发！发！发！

谁能想到，一个在机场当苦力的棚户区的穷措大，“这一夜里，做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发财梦哩！”据说霍英东始终把这一个晚上，看作是他新的生命的起点！

霍英东的手指压断了以后，工头“鸡泡鱼”开恩，放了他5天假。

他欠的睡眠太多，困得不行。死猪似地睡了一夜又一天，连身也没有翻一个。醒来时，手指头肿得像棒槌一样，碰一下如同针扎般钻心地痛。

霍英东找来一块旧毛巾，撕成条结成绳。把整个胳膊吊在脖子上。这“伤兵”形象：他在中环的电影院里看到过。果然舒服了一些。

母亲在说，快去找何叔敷点草药什么的，要不，这亲手臂就废了。

都说，“三百六十行，何叔他懂三百行”。能干得很。在棚户区人的眼里，他顶得上半个郎中。

霍英东向何叔的小窝棚珊珊地走去。还早哩，这会儿不会有人。都还没“落”工。

果然。小窝棚里空荡荡的。靠床头一枝竹节头做的水烟筒，袅袅的冒着淡烟。何叔却不知上哪里去了？

“哎！有人捞鱼罗！”霍英东童心未泯，恶作剧地喊道。

“哄鬼，小杂种！”何叔有一种怪癖，喜欢用四川话骂人。

嗨，在隔邻的茅房里！

“何叔，是我！”

“坐，坐，就来。”

霍英东坐在用竹条架起的宽床沿。那被褥积了厚厚的一层黑垢。只见枕头边，摊着一本用绳头小楷手抄的小册子。

是一本什么宝贝书？

霍英东好奇地把它捧了起来。封皮上用魏碑书写了三个大字：“厚黑学”。

厚黑学？！

“嗨，这可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大学问！”何叔边提着裤子边走了进来。

对于何叔的这一番理论，霍英东久久未能忘却。

据说，“厚黑学”是一个叫做李宗吾的四川人发明的奇谈怪论。

“厚”，就是面皮要厚；“黑”，就是心眼要黑。

“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想为英雄豪杰。求之四书五经，茫无所得；求之诸子百家，与夫计四史，仍无所得。以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不过吾人赋性愚鲁，寻它不出罢了。穷索冥搜，忘寝废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及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这是其开宗明篇的后。何叔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对年轻人侃侃而论：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眼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他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眼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全靠了“黑”，而称为一世之雄。

另一个三国的英雄，就是刘备。他的特长，全在面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甘愿仰人鼻息，而且生平善哭。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胜。所以俗语有道，“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全仗了“厚”，而得逞干一时。

不仅三国如此，再以汉的事来反证一下，“譬如项羽，有拔山盖世之雄，

为什么会身死东城呢？韩信一言以蔽之，‘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根子在于心眼不‘黑’，‘匹夫之勇’，最受不得气，其根子在于面皮不‘厚’。鸿门之宴，项羽已把剑拔出来了，却偏偏徘徊不忍，下不了手，以至放跑了刘邦；垓下之败，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业，未必没有生机，他却偏偏说什么，‘无颜见江东父老’，而拔剑自刎。不‘黑’不‘厚’，必然成不了大事。”

何叔又说，“再譬如韩信，能受胯下之辱，面皮算‘厚’；却感恩于刘邦，不忍越轨，最后为刘邦所杀，这是因为心眼不够‘黑’之所至；又如范增，千方百计置刘邦于死地，心眼够‘黑’，却受不得气，最后疽发背死，面皮不‘厚’也……”

好荒唐的“厚黑学”！说得霍英东激动不已，竟连手指的伤痛也忘记了。

此说十分荒谬，霍英东在以后的一生中，无不时时冷眼旁观。但见世人无不在“厚”、“黑”之中纠缠、较量、拼搏。是故其亦有几分醒世、喻世、警世之用矣！

霍英东每至此，不禁咽然一声长叹！

霍英东对于何叔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说不上是敬重，还是蔑视；是尊为师，还是鄙力邪；是做他的信徒，还是当他的叛逆？

对于一个不满 20 岁的年轻人来说，凡此种种的奇谈、怪论，都不乏兴趣。更不用说身处战乱时期，听人讲“古”无异是一种躲避、一种享受、一种偏安。

尽管何叔有时候神神颠颠的。讲起“古”来，故作深奥。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南一个典，北一个典。上下五千字，寰宇万国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算到哪儿。有道是“一夜的口水能浮船”！

这一天晚上，月明星稀，秋虫呢喃。一伙人不甘于窝棚的窄狭、憋屈，出来并排坐在了塘基上。好一通胡聊！

有一个叫做阿炳（据说此人后来当了新加坡一家银行的董事长）的小青年，猛然问了这么一句：

“何叔，你把厚黑学讲得这样神妙，为什么不见你发达呢？”

这话问得十分无理。何叔却毫不介意，照样笑吟吟地答道：

“你知道孔夫子么？他讲的为政为邦、道千乘之国，究竟做成了几件？屁！曾子著一部大学，专讲治国平天下，请问他治的国在哪里、平的天下又在哪里？屁！你应该去问问孔夫子、问问曾子、问问子思，再来问我！”

说罢仰天大笑。

一帮后生仔似懂非懂，也跟着附声笑了起来。

“正所谓，明师难遇，至道难闻。传世的学问岂是急功近利的雕虫小技！”何叔喃喃地低语道，似乎在说给他自己听。

“何叔是生不逢时啊，要不然……”霍英东平时话不多，此刻插了一句。

“此言对极。”何叔仿佛遇到了知音，马上又讲了一通真货与假货的“辩证法”：

最初的商人，尽都货真价实、公买公卖；忽有一卖假货者，以劣充优压低售价，众人不防，争相购之，此卖假货者必大赚其钱。等到其他的商人仿效之，全市都是假货；其独家货真价实，则购者云集，此公又当大赚其钱。时也，机也，运也。

物以少见珍。

世人也是这样：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面皮）又厚（心眼）又黑，众人必为所制，其独占优胜。旁人见了，争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此其人必力众人所信仰，而独占优胜。其中三昧，只可意会。

霍英东听毕，不由想到：

如今的世界，是又“厚”又“黑”的人当道呢？还是不“厚”不“黑”的人得志呢？这可得费一番思量啊！

第七章 备尝苦楚 家常便饭“炒鱿鱼”

在浪迹香江的日子里，他接触到了清道夫、厨师、小贩、玩杂耍的、相命先生以至于小偷、暗娼、走私贩子等社会的底层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殖民地的香港——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说：“一个先后被两个流氓强奸的少女！”

霍英东又过了 10 天，才回到启德机场上班。

工头没有责怪他。见他的手指还未痊愈，就把他分派到了一个较轻易的职位上，跟一位修理建筑工地载重大卡车的技工当学徒。

技工的年纪很轻，比霍英东大不了几岁。生得匀称、潇洒。踢得一脚好“波”（粤语：足球），在这一点上，与霍英东十分“拍档”（粤证，合拍）。

霍英东自搬入棚户区始，就拜师傅，习南拳。母亲的用意是，健身强力，以御痲疾。对于穷人来说，无病即是福。

此外，霍英东还特别喜好游泳和踢球。尤其是足球，他简直就着了迷，13 岁那一年，有一次为了看英国海军的足球队与省、港华人联队的比赛，逾栏而入。将唯一的一条没有打补丁的布裤子，扯了一个大口子，挨了母亲一顿狠揍。

技工姓周，香港本地人。他是向前任的一位英籍技师学的技术，因此也懂几句英文。工具叫的都是英国名字，比如不叫“螺丝刀”而叫“斯潘拿（Spanner）”，不叫“螺母”而叫“勒提（Nut）”，不叫“扳手”而叫“司各其尔（Screwdriver）”等等。

他和霍英东的任务，是维修和保养 11 辆英、美制的“道格拉斯”和“福特”牌的载重卡车。

活路很轻，且技术性并不太强。霍英东基本能够胜任。不出一个礼拜，一些简单的事情譬如换轮胎、检查油路电路之类，他就敢于单独操作了。

看着一辆一辆的卡车，霍英东的心里不由痒痒地。

他从小就崇羨开车。对于坐在高高的汽车皮坐垫上的司机，特别神往。水上人家。的孩子，看待陆上的一切都不乏新奇，更不用说开着汽车在笔直的公路上兜风了。

这一天终于有了机会：

姓周的技工要去油麻地一块空地踢球。一群工友在日本仔的凌辱下，“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寻乐”，呗。下午，还没到四点钟，他把一串车钥匙往霍英东面前一甩，要霍英东替一辆刚刚大修完的“福特”车灌油。自个就去了。

霍英东虽然也跃跃欲试（他踢左边锋在华人青年中小有名气），但不敢有违师命，到底忍住了。他知道如果一个人也不留，就怕日本人的监工来了坏事。

他灌满了车的油箱。

又下意识地拉开驾驶室的门，一个跨步跃了上去。一把抓住那方向盘。车是发动着的。油门一踩，“滋溜”地向前滑行……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不过想将货车驶前，再退后回到原来位置。但先前那位司机没有弄直车轮，我的货车就‘恍’的一声撞到另一辆货车上去了！”

怕鬼怕鬼，偏闯了“鬼”！就在这个时候，机场工地的小胡子日本监工，

正好经过这里，差点被冲前的车辆撞倒。

日本仔凶狠至极。他骂了一声“八格”，抬起马靴就是一蹬，把霍英东踹在水泥地上，小腹一阵剧痛……要不是“鸡泡鱼”跑上来拦了拦，霍英东的一条命，没准会丢在这启德机场的旷野里。

当即，霍英东就被赶出了工地，结束了又一段屈辱的苦力生活。

霍英东在他 20 岁这一年，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浪迹香江的日子。

1942 年是日本侵略者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由取得而转为开始丧失主动权的一年：

5 月 8 日，日军在珊瑚海之战中失利，成为自发动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受挫；

6 月 4 日，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8 月 8 日，日军盘踞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被美军登陆占领。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瓜岛之战”，最后以日军的覆没而告终……

侵占香港的日军日益加紧扩展机场和增加船队。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的日本陆海军统帅部迫切要求补充军舰和进一步征用占领区的商船；另一方面作为弹丸之地的、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急需更多的船舶来运输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原料，以维持其战争经济。

侵略者开始了血腥的、空前的、罕见的抢掠和劫夺！

霍英东被赶出机场后，一时找不到事情做。竟然在街头游荡了一个多月。

在母亲的眼里，霍英东是一个一事无成、专门招惹是非。不求上进的“衰仔”（粤语：倒霉的家伙）！

霍英东从不讳言，他与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理解和谅解过。他是独子，是霍家的血脉、嫡传。但母亲一点也不宠他，任他在人世间摔打、磨练！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让他自己舔干血迹。她对儿子所望太高、太多、太急，所以总是不满意！

霍英东一早就溜出了大屋，午夜才回。不管是什么工作，也不管它是多么的脏、是多么的累、是多么的不体面，只要揽得上就干。

开始有一家铁匠铺招收学徒，霍英东去应招。店老板让他脱去上衣，一看他琴健似的一排肋巴骨。没有言语，挥手让他去了。

后来，一艘被征集的商船检修，霍英东募招而去，当上了一名铆工。没有什么技术，熟练工种而已。拿一柄铆枪，往船舷上或甲板上铆钉。开始三天，干得不错。谁料到第四天下午前舱突然起火，将舱面的帆缆、机件烧得焦黑。从码头上开来一队日本兵。把在货船上干活的工人，连同霍英东一起总共有二十七、八个人统统带去了军营。审讯了一夜，天亮时分全数释放。虽然无辜，却都被解雇了。

霍英东又到了一家水果店当“马仔”（粤语：跑腿的）。由于老板娘看他看不顺眼，当天就卷铺盖炒了“鱿鱼”。

又有人介绍霍英东到一间夜总会当差，霍英东去了一看，哪里是什么夜总会，分明是一所变相的“军妓院”。霍英东还在犹豫，同去的一个工友，二话没说，拖起他就走。

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几乎处于半流浪的状态。在浪迹香江的日子里，他接触到了清道夫、厨师、小贩、玩杂耍的、相命先生以至于小偷、暗娼、走私贩子等社会的底层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殖民地的香港——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说，“一个先后被两个流氓强奸的少女！”

这样的日子，霍英东过了将近半年。

他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职位，在“太古”的实验室里做试糖的工作。如果不是他的母亲强令他离职的话，今天的霍英东很有可能成为了一个有经验的化学实验师。

第八章 为母打工 过早结婚有了家

尽管老板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霍英东也一刻不敢怠慢。因为，“倘若你不能做到面面俱圆，顾客舍你而去，母亲就会毫不留情地扣除你当日的全数工资，恨不得吐你一脸的口水才好……”

霍英东从事商业活动的第一个雇主，是他的母亲。

其时，霍英东的母亲趁 1940 年前后香港当局填海造地之机，发了一笔小财。“数目并不大，三几千块钱。但对于从无隔夜粮的家里来说，已是拾得金元宝一般的感觉了”。

霍母是一个颇具生意头脑的妇人。有了一点钱，她既没有像守财奴一般，把钱盛在瓷罐埋在地下；也没有如同利欲熏心的“贷”者，把钱放出去收取高利。她选择了一条经营发财之路。

滚雪球一般，“用钱赚钱”——这即是现代人的意识，是对付通货膨胀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这一点看，当时的霍母堪称明智、果决和有主见。

中国有句古训“民以食为天”，又有民谚曰，“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1942 年春、夏之交，霍母倾其所有，连金链也卖掉了，同其他 13 个人合资，买下了湾仔市场附近的一间杂货店。

店名为“有如”。其实本意名为“有和”，但登记办证时写得太潦草，误写为“有如”。也就将错就错。

霍英东的母亲当了掌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董事会主席兼总经理。大权在握，“有百分之百的人事任免和经营销售业务的权利”。她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 20 个小时。为了钱、为了生存而搏命。”“身体却依然那么硬朗、康健。虽然不会写、不会算，脑子就像电子计算机般一清二楚，不差一毫一仙。在湾仔一带，‘有如’店的女老板是有了名的……”

在母亲的强行命令下，霍英东退了“太古”的职，到母亲的店里负责管理店务，即当售货员。

“那是经营大生意的好训练。”霍英东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在繁忙时间你会发现面对 20 多个顾客。每一个顾客都是你的上帝，你首先要学会和练就的就是保持亲切的微笑……”

这一点，相当重要，30 多年以后，在美国的十大畅销书中有一本迈克·柯达所写的《权术》。作者是欧洲有名的电影制片家亚历山大·柯达爵士之侄。“自幼出入欧美的豪门望族之家，对于上流社会的习俗排场、逢迎巴结，自是司空见惯；对于如何鉴貌辨色，酬酢往来，应对进退，亦有独得之秘。”在他所列的处世要诀中，第一条便是：

要练得一副真诚而开朗的笑脸。中国古谚不早就有“和气生财”的说法吗？使用笑脸（请特别注意此处挑选的动词“使用”——笔者注），要能得心应手，毫不牵强做作·方为上上。

“真诚的笑脸”，这是成功的诸要素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霍英东可以说是不教而会、无师自通了！

“拿人家的钱，看人家的脸”。打工仔自有打工仔的苦衷。

尽管老板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霍英东也一刻不敢怠慢。因为，“倘若你

不能做到面面俱圆，顾客舍你而去，母亲就会毫不留情地扣除你当日的全数工资，恨不得吐你一脸的口水才……”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霍英东急需需要钱养家啊！

霍英东如同许多东方人一样，过早地结婚成家，在他 21 岁那一年，就当爸爸了。

战乱之年，他为他的女儿取名“丽萍”。是祈望“平安”呢、还是祈求“和平”呢？也许二者的意思都有。

“因为是独子，母亲对于他的婚事就特别操心。盼望着早点抱孙儿，好有一个传宗接代的‘种’。对此，他当时倒无所谓。四处打工，半流浪的生活。自己的一张嘴，都顾不过来。哪有结婚的兴致呢？现在想起来，结婚就像一根绳子拴住了他的腿。要不是有了太太，当时拔腿去了南洋也说不定……”这是他的一位“老友”的看法。

对于霍英东元配吕燕妮的情况，了解的人不多。他自己也不愿多谈起。当有人问及时，他顾左右而言它。

据说，霍英东的元配夫人也是水上人家的女儿。从小腰间绑一个漂物，在舱板上长大。两家人关系不错，来往甚密。究竟是两家父母“指腹为婚”，还是俩小无猜结的姻缘，现在已无人考究了。总之，大主意是母亲拿的。“经济没有独立，连婚姻大事的自主权也没有。这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霍英东同其元配算不算是“包办婚姻”呢，只有天晓得！

据说，还有一份海外的杂志，编撰了一个所谓“霍英东午夜归来，听呼喊拳脚相助；援救得梨园女子，诉衷情缔结良缘”的故事。不必讳言，富贵如霍氏这样的香港豪门，其婚姻状况绝不会像 $1+1=2$ 那般简单。在一本刊物上，更有所谓“三妻九子”之说。

不管有多少种传说，但霍英东 21 岁当了爸爸，却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棚户区内又多了一间棚户；

烟囱群间又多了一根烟囱；

排队接水的铁桶行中又多了一个烂铁桶；

苦挨苦守的夫妻堆里又多了一对小夫妻……如此而已。

成了家以后，霍英东干活更努力、更巴结了。唯恐老板、工头、带班的种种人等，对自己不满意而被炒了“鱿鱼”、砸了饭碗。

要命的家啊！

生了一个女儿，霍英东的母亲固然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但终究未遂心愿。“她希望能有一个孙子。中国的老妇人传统的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

从妻子怀孕到分娩，霍英东可算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在产后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每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女儿要抱在手里，不停地在窝棚里转圈子，否则一放下就哭，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而且她似乎是一只漂亮的小花猫转生的。白天睡觉，打都打不醒；一到夜里就精神了，一家人都得陪着她熬通宵……”

尽管如此，在母亲的暗示和主使下，小丽萍刚满周岁、还未断奶，霍英东夫妇便开始孕育另一个小生命。

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霍英东的长子、现今商界的风云人物、

“香港小姐”朱玲玲的夫婿——霍震霆出世了。

霍英东并非生下来就是坐富豪们专用的“劳斯莱斯”车的。湾仔到西环一带的老住户，至今还在传说着霍英东当年自制四轮木头车以及他运货的故事。

棚户区的杂货小店，“靠的就是两条：一是勤勉，二是节俭。”

凌晨六时，维多利亚港湾上蒙蒙的雾气还未消散，滨海的集市上已经人影幢幢了。在码头大楼的钟响以前，“有如”杂货铺开始卸下门板，招揽生意。

霍英东照例要提前半小时到店，清点商品，准备“散纸”（粤语：零钱）。

20岁出头，又有娇妻作伴。正是“春眠不觉晓”的时候，偏偏要踩一脚露水去打工。睡眼惺松，“有一次走着走睡着了，一头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

杂货店的生意，看上去还算兴隆，虽然“1毫酱油”、“5仙醋”、“毫半白糖”没有多大的赚头，但小本经济蝇头小利也不弃，一星半点也不敢闪失。

霍母除了自己也常常帮手做上几笔交易外，更多的时候是端一张高凳坐在一旁。她高踞铺面，眼观四方，不放过任何怠慢顾客、与人“通水”（粤语：作弊）的现象。她几乎不相信所有的人。据说当她有一次发现她的一个远房侄儿多称了半斤细盐给熟人时，就像拿小刀刺了她的肉似的。从此，甚至对于霍英东也虎视眈眈。“她是穷怕了！”好在儿子对于她是能够理解的。

依例杂货铺在晚上10点钟“收档”（粤语：关门），但常常要拖到10点半钟以后。霍英东接着还要打算盘、记帐、结算现金等等，午夜时分才能忙完。“有一次，错了10元港币的帐。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数目。母亲虎着脸站在一旁，整整查了一个通宵，直到弄清去处才罢休。”

白天还要运货。

到几里外的西环三角码头的杂货批发商买货，然后运回湾仔的小店。有时一天要来往两次。

“说起来，路程不算太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部‘丰田’农用车一趟就‘搞掂’（粤语：办妥）。但那正是日治时代。瓶瓶罐罐的‘生抽’（粤语：酱油）、陈醋之类的杂货，只好雇三轮车运送。一趟就要花好几块钱……”

每次母亲站在店门前付款给三轮车夫，都要讨价还价地磨蹭老半天，常常在“5仙”、“1毫”上打主意。

霍英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忙里偷闲与在店里打工的表弟李志明一起，精工细凿，做了一辆四个轮子的木头车。“虽然显得粗糙、笨重一些，推起来‘吱、吱’地响，但是却非常适用。稳稳当当，一次就把一到两天的侍都运回来了。”

很难想象霍英东年轻时制作的这一件工艺品的形状，以及当年霍英东推着木轮车招摇过市的英姿。但是可以想见霍母喜形于色的神态和乐不可支的心情。

“每星期7天，甚至农历新年，我们仍然开一扇门，便利要买东西的顾客。”在年三十晚上，母亲在霍英东手里塞了一个“红包”：哗！一张大红的港纸——100元！

第九章 亡国遗恨 好人冤枉坐班房

他的母亲和姐夫在铁窗里，被无辜地关押了 40 多天。这件事宛如一把盐，撒在霍英东心头亡国的伤口上。

在与母亲经营“有如”杂货店期间，霍英东还遭受了一场无妄的牢狱之灾。

霍英东对几十年前的这一段往事还记忆犹新。

那一天是清明。香港地从午夜过后，即飘起了纷扬的细雨。

霍英东的母亲一早就来到店里，原已约好一同去“拜山”的姐夫也来了。一家人还未及坐定。

突然，响起了异常急促的“呼”、“呼”的敲门声……凶神恶煞一般闯进来两个日本宪兵，随同的还有一个相识的台湾汉子。

有何贵干？

抓人。

众人一惊，连忙探问。原来是杂货店十四个股东中，有一个姓陈的老兄，替日军运货中偷了些货物，事发后跑掉了。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不，日本人上门缉拿要犯来了。

霍英东说，姓陈的不在。

日本宪兵追问去了哪里？霍英东说，可能在附近饮早茶。宪兵见他姐夫在，问是什么人；他说是相邀一同上坟的亲戚。宪兵押着霍英东去找人，并叫他姐夫一同去。

在大街转角处有一家香港茶楼。

霍英东便把一行人带到了那里。母亲放不下心，一路跟着来了。霍英东暗中摇手，示意她不要跟，她却不肯，尾随不舍；后来被日本宪兵察觉，问是什么人。霍英东说是妈妈，这更倒霉，又要一同去。

一路吵吵嚷嚷，拉拉扯扯。

到了茶楼更是一通喧闹，却找不到那个姓陈的。于是，日本宪兵就把霍英东和他的姐夫、母亲押到警厅。

走进警厅，看那情景不禁使霍英东心慌脚软。那里正在行刑，被抓去的人有吊飞机的，又有灌水的，十分恐怖。

霍英东索性铁下一条心来。他说：“你们抓我们来也没用，两条腿扛一张嘴，我们确实不知道那个姓陈的跑到哪里去了。”

日本宪兵还是不依。

警厅把霍英东的母亲和姐夫扣了下来，只放他一人脱身，迫他去找人。

谈何容易。

像姓陈的这样的水上人家是很难找到的。哪一片云彩下没有一片海水？！

谁让他是自己的合伙人呢？只好自认倒霉吧！

霍英东的母亲和姐夫在铁窗里，被无辜地关押了 40 多天。霍英东卖了自行车，得 20 多万旧军票，给警厅送去，这才将人释放了出来。

这件事宛如一把盐，撒在霍英东心头亡国的伤口上。白发回首，亦未能忘。

霍英东永远难以忘怀，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香港沉浸在狂欢的情潮中的那许多个日日夜夜。

香港人的根，在哪里？

在中国！在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五大国之一的——中国！

“当时，我们几个相好的年轻仔，最羡慕的就是参加‘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仪式’的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

据香港报载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签降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首先，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是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签字：美、中、英、苏以及所有对日作战的同盟国的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国的代表也依次签了字……。

“你们听说过当时麦克阿瑟‘五支笔’的轶闻吗？”对于此，霍英东的一位老朋友至今仍津津乐道，“麦克阿瑟在签字中用了五支钢笔：用第一支写了‘Doug’，然后把笔给了（曾在菲律宾投降的美国将军）温赖特；用第二支写了‘Ias’，他把笔递给了（曾在新加坡投降的英国将军）白西华；他用第三支笔写完‘MacArthur’，这支笔交给美国档案馆；接着又用两支笔签署了他的官衔，第四支笔交给西点军校；第五支是他从自己衣兜里掏出来的红色小笔，用后送给了麦克阿瑟夫人……”

没想到，对于此类历史的小插曲，他竟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可见当时欢庆胜利的情景给他们的印象之深。

然而，对于香港的大多数人来说，战争结束得过于突然。

日本人抽身走了。百废待举。兵燹之余，物资十分匮乏。运输业一下子成为香港迫切需要发展的一个行业，各种类型的船队应运而生。有名的一代船王董浩云（据《香港超级巨富列传》介绍，他的船队的总吨位数甚至超过了无人不知的包玉刚），就是在这个时候返港申请复业，成立“中国航运公司”而发达起来的。

运输业的开展，必然要带动依附于它的驳运行当。一时驳运业主忙不胜忙，大发其财，让人眼红。

霍英东的母亲不失时机地将“有如”店的股权，全部卖出。换得8条“金牛”（面值为1000元的黄金色港币）。连夜找人洽谈，租下湾仔傍海的一处地方。联络了旧时主顾的几条驳船，打出旗号，再次经营起已搁置多年的驳运生意来。

霍英东别无选择。

他仍然在母亲的店铺里打工。每月和其它的打工仔一伴。从母亲那里领取工资。干得她满意，偶尔可得到几十、上百元的“红包”；否则她一点亲情也不顾，劈头就是一顿呵斥。

霍英东“照常逾时工作，但负担较前为轻；霍母继续负担所有开支，而霍英东就替她管帐，代她去收佣金，每个月按时交给她。”就这样又过去了一年多。

第十章 买旧卖新 中标卖单初发家

霍英东无时不在梦想着生财捷径。要想出人头地，做官没有这个可能，发财却是大有机会的。“然而，机会是突如其来的。记住我的话，任何的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霍英东无时不在梦想着生财捷径。要想出人头地，做官没有这个可能，发财却是大机会的。

“乱世英雄起四方”，身处战乱之年，各种版本的发财故事充耳可闻：最为人知的要数梁昌的发迹史：

梁昌在澳门出世，比霍英东只大了4岁，应该算是同一辈人。早年家境清贫，曾在澳门米糟街勤泰办馆任杂役。二次大战期间，加入英军服务团，似乎与英国情报部门有了某种关系，曾协助英国军事人员逃离沦陷区。梁昌与第一任妻子梁文燕的结识，也始于战乱的澳门。据说梁文燕那时在澳门“东亚酒店”八楼“八重天”酒楼做女侍应，多次协助梁昌避凶险。有一次梁昌亏她的通知才得以逃脱日军的追杀。乱世男女结为了夫妻。抗战胜利前后，澳门闹“米荒”严重缺粮。1元钱仅可买米4两。梁昌凭藉其社会关系，靠了何贤、钟子光、傅德荫等人的帮助，又加上其有过办馆的经验，脱颖而出。他与友人合作揽了一间“英昌行”，由中山、顺德运米来澳门。更设法打通了当时澳门经济局长罗保（亦是澳门财团的首脑）的“关节”，把食米的专营权拿到了手。于是，他的米行生意愈做愈大、愈做愈发达起来了。梁昌，被人称作“粮仓”。一时间世人都说他的名字起得好。

顺便写一笔，这个梁昌的结局却一点也不令人心羨。1976年6月4日上午，已积累了庞大财富（税务局的估计是18亿）、有名誉有地位（1973年获C·B·E勋爵衔位、数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儿女满堂（先后两个妻室共为他生了8子2女）的超级富豪梁昌，竟然从浅水湾25层高的花院大厦顶楼天台奋力跃下，当场腿臂折断、血流满地而亡。时年61岁，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谜”。

霍英东自认不比这些“暴发户”的本事差，他缺少的是机会，“然而，机会是突如其来的。记住我的话，任何的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他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四处钻营、两面讨好。每天一大早，就找一份日报来，从头至尾，经心地浏览一遍，掘金似地在字里行间觅找。特别注意的是报上的那些广告和启事栏目。当时经常发布有战余物资拍卖的消息：

譬如，日军的被褥、行翼、雨布、胶鞋一类的物品；

譬如，美军的饼干、牛油、咖啡、罐头一类的食品；

又譬如，各种军用的车辆、机械、舰船、橡胶制品以至于营房、码头、没收的敌占军用设施等等。

这是一个发财的极好机会！

霍英东终于说服了母亲，拿出了自己份下的佣金，买下了一些需要小修的军用艇、廉价舢板和舰船上的发动机、水泵之类的机械。这些物品对于在驳船上混过相当时日的霍英东来说，颇具有驾轻就熟之便。一眼就能看出差价的多少和经营的可行性。买下后，自己或请人稍加修缮，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转手把它倒卖出去。

“这种急功近利的买卖，虽然赚头不大，但聊胜于无。慢慢地，使我个

人勉强有了一些储蓄……”霍英东说。

这是发生在 1946 年到 1947 年间的事情。

霍英东天性正直，待人真诚，重信用，讲义气。他的朋友多，且分布面广，似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

其实在香港那样的地方，无所谓出身的高低贵贱。“英雄不问出处”。能把钱赚到荷包里来，就是英雄好汉，就会在人前受到尊敬、抬举、褒扬。对不对呢？

霍英东浪迹香江之时，曾结交了无数的“老友”。譬如驳船的水手、码头的苦力、码头的挑夫、酒吧的侍役……在这一大群沦落人中，相互抱成一团，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当官的人、有钱的人，合法地牟取暴利；卖苦力的打工仔相互提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朋友两肋插刀”，无异于是一种“适者生存”的动物本能。

大约在 1947 年春夏之交，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当局拍卖一批日军码头的附加设施。包括一个趸位，两艘略有损坏的趸船，十几条八、九成新的舢板和一批柴油发动机。这些热门的物质，在当时十分抢手。参加拍卖投“标”的客户，有十多家。霍英东极想能投得中“标”。他粗略地结算了一下，一出一进，最少能有 5000 元的收益。

他一方面说服母亲能将驳运社押出，借回 2 万港元来，一方面四处活动、求助于几个要好的朋友。

“拍卖”在湾仔码头前后一片空地上举行。一排木桌，将卖家和买家分隔。一张高凳，上面端坐着报价的人。侧面另有一张小桌，有两位“律师楼”的公证人出席作证。

拍卖从底价“12,000 元”起叫。

“12,100！”

“12,200！”

开始进展缓慢，十几个买家都不动声色、相互摸底。

“15,000！”霍英东到底年轻气盛、按捺不住。使“标”价陡地上升！

“15,500！”有人在与他叫劲儿。霍英东转头看去，是一个 40 多岁的中年汉子。叼一根纸烟卷儿，显得十分沉稳。

“标”价稍稍徘徊了一下。霍英东一咬牙又要了：

“18,000！”

“2 万！”

霍英东傻了眼了。两万元无异于他的身家性命，况且钱还是母亲的驳运社典当的呢！

“2 万……20500！”他陡地泄了气似地。

“3……”那中年汉子正要开口，却张着嘴止住了声。他感觉到了——一个硬物抵住了他的腰间。这是霍英东的一个在码头打工的“老友”靠近了他的身旁。

场面一下子被控制了。霍英东以 20500 元“标”下这批物资。兴高采烈的他回到家里，却被一个意外的消息浇了一盆凉水：母亲根本就没有去典当她的驳运社，“因为她不相信霍英东能办成任何一件事。”一位霍英东的传记作家写道。

怎么办呢？

千方百计“标”下来的物资，只好又忍气吞声地托朋友出面，让给了那一位“中年汉子”（据说此人现在在加拿大，是一个华侨巨富）。按其最高报价“2万”付款。霍英东这一笔买卖，非但没赚到分文，反倒赔出去了500元港纸。

对于传说中的这一段轶闻，霍英东本人的回忆却小有差异：

“和平后，许多战时剩余物资在市面出售。那时候，我开始在经济收入方面动脑筋，常常留意香港政府《宪报》的招标公告，当时看懂《宪报》的人不多，所以我占得一些便宜。有一天，在《宪报》看到有40部轮船机器招标，就向妹妹借了100港元落标。想不到过了几天，水师塘通知我中了标，要我准备18,000元出货，天啦，哪里来这18,000元，真是一个大难题。……一天，看准妈妈比较开心的机会，我大胆提出希望她拿出18,000元，说可以赚10万元。谁料妈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口拒绝了。没有办法，只好走到九龙杂架摊找朋友，说出这件事，表示愿意4万元‘卖单’。朋友同意了，给了我4万元。这宗无本生意，赚得22,000元，这是我第一次赚得来的作为日后发展的本钱——靠的不是妈妈，而是朋友！”

霍英东与母亲的隔阂，也愈来愈深了！

第十一章 远征东沙 打捞海草受重创

霍英东带着 80 个和他一样满怀发财热望的渔民，远征东沙群岛。然而，等待他的不是遍地黄金，而是地狱般的生活。没有盐吃，加上海风吹洗，慢慢地，他们的头发和胡须都变成了灰白色。一条三角短裤遮住羞处，几乎全身赤裸。“互相看去，都似原始人一般。”熬过半年，黄金梦破灭了，打回的海草出卖后仅够补贴开支。

霍英东终于决定漂洋过海，远走柏拉达斯（即：东沙）群岛。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行动。

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夜深人静，倚在湾仔的小窗前似乎隐隐可闻隆隆的炮声。各色人等，蜂拥至弹丸之地的香港。一时间，颇有几分人心动荡。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母亲照常做她的驳运生意。甚至比之以前还要更兴隆一些。霍英东就像神话中的六耳猕猴，支开顺风耳四方捕捉着一个又一个发财的消息。

这天，霍英东到铜锣湾的一家客户收款。客户姓董，是搞远洋运输的。在他的写字间里，两个过去的“老友”与霍英东不期而遇。没想到几年不见，这两个曾一同在机场卖命的苦力，如今浑身的衣着光鲜，显然是发达了。

“大佬（粤语：大哥），不知现在哪里发财？”霍英东禁不住问道。

“还不是跟东洋人罗！”

“日本仔？”

“没错。‘猪头’又来香港了。”

“‘猪头’！”霍英东猛地怀疑自己听错了。“猪头”是机场那个留仁丹胡子的日本监工的浑名。这才胜利几天，怎么他又回来了呢？

“没错，是做生意来啦！”

“什么买卖？”一听说是生意，霍英东全身的细胞都进入了亢奋的状态。

“海藻。”

“紫菜？”

“不。是海藻。好价钱。120 港币一担！”

“哪儿有？”

“远一点。”

“有钱赚，不怕远。在哪儿？”

“八达岛。”他说的是柏拉达斯（东沙）群岛的俗称。距离香港有 100 多海里。

“哪里交货？”

“公司有船。东洋人定期去岛上收购。好容易赚的，海藻满海都是，捞起来就是钱。快过印钞票……”

这两个家伙说得天花乱坠。果然，霍英东的心给说动了。可还觉不稳当：

“日本人要这海藻做什么？”

“说是可以制胃药。你就放心吧，小老弟。谁对谁呀？我们还能骗了你！肥水不流外人的田。这事儿就关照你了”

霍英东听罢，顿觉儿时读过的《金银岛》、《鲁滨逊漂流记》的描述，似乎在心头翻涌起来。他就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似的，蹦回了家里。与母亲一商量，觉得可以试试。第二天，霍英东在湾仔一带走家窜户，四处游说。

几经波折，总算联络了 80 个渴望赚一笔大钱的渔民和散工。

由霍英东领头，一共签了三个方面的“契约”：

一是同“猪头”的日本公司签约，他们保证按预定的价钱收购海藻；

二是同 80 名“自愿远行”的工友签约，“生死在天。如有意外，责任自负”。

三是同霍英东的母亲签约，由她筹资购买了一艘 61 英尺长的摩托艇。讲明“产权”属她所用，而且此行全部所得收入的 30%（即：三成）要归她所得。

1949 年冬日的一天凌晨，趁着维多利亚湾的满潮，霍英东一行离开了香港，转道澳门、汕尾、直向水天苍茫处的柏拉达斯群岛驶去！

霍英东在柏拉达斯群岛上，整整度过了 6 个月流放一般的生活。在与人们交谈中，他便直截了当地称之谓“有如置身地狱”。其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日本人没有说错。这里的确有着茂盛的海藻资源。但绝非是“满海都是，捞起来就是钱”。海藻生长在珊瑚小岛的礁盘上。一般都在两人多深的海水中，必须潜水下去打捞。

霍英东他们这一帮人，一没有经验、二缺乏必要的装备和工具。“扑通”一声跳下水，三下两下就累得喘不过气来。还没采到一小把海藻，就得攀在船舷喘气。累了一天，捞不到半筐。

加之，海藻中、礁缝里经常有海蛇出没。蛇不长，却有剧毒。有一个名叫“黄仔”的青年，不慎叫蛇咬了一口。赶忙翻身上船。挥起柴刀，将手指搁在船帮上，“叭”的一声剁掉了。舍了一根手指，捡回了一条命。

再就是天气酷热。“整天气温都在（华氏）100 度以上。太阳又毒，每人都晒脱了两、三层皮。岛上没遮、没檐、没荫，热得你喘不过气来，只好往海水里跳……”

粮食缺乏。讲好的补给船只，经常误期。“一遇到台风，更是 10 天、半月不见米粒。只好啃鱼干、吞螺肉、嚼海带……唉，那时真是苦不堪言。”

“说来也许叫人不相信，守在海边却吃不到盐。只好往饭里、菜里浇海水，又苦又涩。还不如吃白饭、淡菜……”

不吃盐，加上海风吹洗，慢慢地，他们的头发和胡须都变成了灰白色的。一条三角短裤遮住羞处，几乎全身赤裸。“互相看去，都似原始人一般。”

身体稍差一点的人，哪里受得这一番的折磨。上岛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几个青年仔宁可不要工钱，攀上补给船回去了。

霍英东后来只好雇用一批台湾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这种非人的生活，他们也能捱得下去。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煮好饭团，带些咸菜，就下海去了。中午和晚上，饭已发馊，他们也照样吃。他们还有一套叉鱼的本领，生吞活嚼。霍英东就是靠着这一群特别能吃苦的人，最终熬了六个多月。

那一年霍英东正好 28 岁。他咬着牙硬挺着。

组织和分派着每天每个人的工作和定额，一刻也不敢松懈。“这一段生活，苦虽说是够苦的了。但是它对我的意志力的磨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只要想起在东沙群岛上的日子，现在的逆境也胜过天堂了。”霍英东时常对人这么说。

生活上的苦、累，算不了什么。最让他烦恼的还是海藻的收成不好。近

海的捞得差不多了，远一点的又去不了。两次骤然而至的台风，更把两大堆晒干了的海藻刮进了大海。足有一、二百担。“看着一大团、一大团的海藻被卷上半空、向大海落去，自己真恨不得也一头扎下海……”

到了 1950 年四、五月间，往来的渔船带来了大军“解放”海南岛的消息。据说，解放军很快也要上柏拉达斯群岛来。

这可是一个要命的信号！

大家找到了霍英东，吵着、闹着要回香港去。霍英东的心里，也仿佛塞了一团干的、杂乱的海草，想不出应急的办法来。

有一天夜里，一艘路过小岛的军舰朝岛上放了几炮。虽然偏得厉害，远远地落在礁盘外，但是已足以吓跑这群乌台之众了！

只隔了一天，霍英东就带着他的同伙们，载着多半船海藻匆忙地驶去。他甚至顾不得朝那东沙群岛深情的回眸一瞥！

没想到回程中又走错了航线，摩托艇撞在礁石上差点沉没。想尽了办法，总算凑合着把船驶回了香港。

这次“海藻行动”，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了的。他们带回来的海藻，仅够贴补开支。为了修复摩托艇，更搭进了霍英东几乎全部的个人积蓄。

更严酷的后果是，通过这次惨败使霍氏母子两人坚信，他们必须分手！已经到了各自谋生的时候！

“我母亲从未信任过我。”霍英东坦白他说，“我经常我行我素。她总是认为我冒的风险太多，过于莽撞。离开了她以后，我买了一艘拖船，开始自己做起生意来！”

第十二章 时来运转 韩战时一举发迹

一个外国记者写道：“上帝把霍英东先生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让他做生意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商人。”究竟霍英东是如何利用命运之神赋予他的机会，发迹、腾飞，一举出人头地的呢？

霍英东的“发迹”，始终是一个人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

他如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没有被失败的大山压倒。挺直着脊梁，从事业的废墟上站立了起来！

他终于成功了！当之无愧地自立于香港超级富豪之列！

有多少人羡慕他；

有多少人逢迎他；

有多少人妒忌他；

有多少人中伤他……

更多的人，则希望从霍英东的“发迹”中悟出一点什么“真谛”来，从而效仿之、尾随之、实践之。

可以说，这一切是枉然的。

霍英东发家的“模式”，具有其强烈的时代特色、社会因素和个人属性。它是独特的、仅有的、天工偶成的。任何别的时代、别的社会、别的个人，都不可能仿造、翻版和复制！

一般的说法都确认：霍英东发迹的时间跨度，在 1950 年到 1954 年之间。

这是没有错的。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史册上有如下记载：

1950 年 10 月 25 日，由志愿人员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数十万人，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

即：所谓的“韩战”。

这一场以中、朝为一方，以美、李（承晚）及“联合国军”为一方的战争，一直打到 1954 年才停火“谈判”。

而这一段时间（前后 4 年），正好是霍英东发迹的日子。

答案似乎要从这里面去找！

在香港出版的《香港亿万富豪列传》一书中“霍英东发迹史”卷后，编者写道：

“《霍英东发迹史》原刊英文《南华早报》，作者是 BertaManSon 女士。她能找到霍氏，写成这篇故事，大概不必花太多时间。《南北极》远在两年多前，已着手搜集有关霍氏的资料。想和他作一次访问。向有关方面洽商，从信德船务有限公司负责入处得到的答复是，‘时机未到，以后有机会再说。’大约在两个月前，《南北极》又通过霍丽娜小姐和霍氏商讨作访问的事，霍小姐征求她父亲的意见，仍认为‘不太好’。其时，龙慧君已译妥这篇‘发迹史’，该刊已准备出《香港亿万富豪列传》这一特辑了。”

“《南北极》的编者念念不忘要和霍英东一谈，因为他是香港社会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说是‘出身草莽’，而今却富甲一方。近二三十年，香港社会涌现了不少新富翁。他们原无籍无名，有的甚至连一家的温饱都成问题，只因风云际会，抓住了一个机会，从此扶摇直上。《霍英东发迹史》，即是这批新富的生动写照。”

“‘发迹史’的作者认为‘韩战带来了他（霍英东）一生的大突破’，这和我们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迟至 1949 年还要远赴柏拉达斯岛采海草赚取蝇头小利的霍英东，1954 年后已有资格在铜锣湾区以现金支票购买他的第一幢大厦了。韩战期间霍氏驳运业务的昌盛、由此可见一斑。1951—1954 那几年他倾全力经营的海上驳运业务，不仅为他带来可观财富，也奠定了他和香港左派不寻常的友谊。这可以解释，何以他能获得中国海沙的入口专利权。

“‘发迹史’的作者，对这改变霍氏一生的‘大突破’，只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想必有她这样作的理由。我们也不拟在这上面大作文章。”

是这样吗？非也！

一篇标榜为“发迹史”的专访，却偏偏将“发迹”的 4 年，“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这显然是不合情理，且难尽人意的。其实，许多人最感兴趣的恰好正是这哥德巴赫猜想式的“4 年”！

霍英东同其他的一些白手兴家的超级富豪们，有无通性可循呢？

在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有的。

据介绍，美国有一位名叫森姆·詹纳斯的医生。他是纽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的教授。这位大夫曾对 200 名不靠父荫致富的百万富翁进行问卷调查。他发现这些白手兴家的富商们，在某些性格上均有共同性。于是，这位美国教授认为，任何人如果能够培养成这些“白手兴家的百万富商通性”的话，他们都可赚取大笔金钱，跻身达官贵人之列。

森姆·詹纳斯概括的这种“通性”，包括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必须对金钱充满浓厚的兴趣。把赚取的钱积累起来经营、发展，日常生活则要坚持朴素无华——这一条对于霍英东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从懂事那一天起，他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在做青发财的梦。应了一句民谚：“钱钱钱，命相连。”钱生钱，利滚利，他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个买卖。生活上近于菲苛。衣着平常，茶饭清淡。

其二，必须一心一意为工作卖力，每星期做足七天，每月 30 天，每年 360 天，永不准备退休——霍英东曾经说过，“他 60 年来没有放过假，除了生病……”算一算，60 年是多少天？21,900 个日日夜夜！

其三，必须要有极大的忍耐性和坚毅精神，不因工作偶遇挫折而气馁，永远坚持自己既定的信念——霍英东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潦倒和一事无成的。正像一句成语里所说的，“靠山、山崩；靠水，水塌。”当了两个孩子的爸爸以后，还浪迹街头、四处温食（粤语：找饭吃）。他没有颓唐、堕落（在香港那样的社会里，要沉沦是很容易的），也没有因为一时的小康而自足。认准了要出人头地、发大财，终于得以如愿。

其四，必须不因为工作的贵贱而取舍，只要有钱赚又不是为非作歹的，一般人不屑干的工作，都乐于接受——这一点，尤为重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霍英东“发迹”的关键。在当时（所谓的“韩战”期间），他正是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些“一般人不屑干的”生意，而得以发达的。个中的奥秘，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

上述几点，是森姆·詹纳斯医生概括的百万富翁们的共通性格，也就是其本身具备的一些基本因素，但是，这当然不是说，凡是有这些性格的人，都能赤手空拳、创业兴家，“时势造英雄”是一句至理名言。任何人在事业

（“百万富翁”也是一种事业）上获得成功，都还必须兼有各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及机遇等等，缺一不可。

不是么？

经历过“韩战时期”的香港人何止千万，但却只造就了一个霍英东及其他几个为数极少的超级富豪，这便是明证！

霍英东的成功，举埠瞩目。有好事者，概括了一条所谓的“霍英东式的公式”：

胆识 + 机会 = 财富

——对照之，不无道理。

胆识似乎是天成的；而在一群同伴有胆识的人中，机会就是最为重要的了：

李嘉诚的机会是“塑胶花”；

郑裕彤的机会是“当上了乘龙快婿”；

胡忠的机会是“捡到了花旗纸（美金）”；

郭得胜的机会是“运战略物资到澳门”；

何善衡的机会是“黄金炒买”；

马万祺、梁昌的机会是“趁粮荒之机，贩粮营利”……

那么，霍英东的“机会”又是什么呢？

有一篇介绍“可口可乐”的新强人罗伯托·葛施达的文章，谈到“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商人能够赚大钱，不外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是机遇。比方有人在战乱或战争刚结束时，一下子有机会得到许多资源而成为巨富；

“第二，是特权。比方停止发出某个行业的牌照，已领有牌照者就是有特权。此外，公卖、独占业、总代理、总经销都是特权，专利权、配额乃至某种进口货品设立限额以保护本地同业，但自己有权在这个限额以内进口这种货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权。有特权者，自然比无特权者容易赚大钱；

“第三，是经营得法。靠经营者的智慧和辛劳，发展业务扩大业务，增加利润，也是致富的条件。”

所列三条，活脱就是霍英东的“发迹”的写照。

且看：

“战乱”的条件么？有。霍英东离开母亲的驳运社买船单干的时候，适逢愈演愈烈的朝鲜战争；

“特权”的条件么？有。霍英东自从取得了中国海沙（建筑用）的总经销权后，在房地产界呼风唤雨，十分得势；被入称作香港“沙皇”；

“经营”的条件么？更不成问题。“上帝把霍英东先生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让他做生意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商人。他的脑子就像一台运转得十分灵敏的电子计算机。在一瞬间，全面调动数以百计的信息和数据，从而得出正确的、唯一可行的结论来……”这是一个外国记者对他的评价。

究竟霍英东是如何利用命运之神赋予他的“机会”，而发迹、而腾飞、而一举出人头地的呢？

笔者曾经当面询问过他。他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它。”

笔者只好转而求助于资料。遗憾的是，几近一无所获。大陆的文献自不

必言，除了褒扬的言辞外，空洞无物。就是能够找得到的海外文本，包括美国记者 Berta Manson 女士的采访记，对于“1950年—1954年”亦“一笔带过”，近乎莫名其妙。显而易见，这“4年”是公认的“谜”、公认的“禁区”、公认的“隐私”！

怎么办呢？

笔者有机会接触到几位香港的老资格的商界人士。灵机一动，转弯抹角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据你们了解，在朝鲜战争时期的一个香港人要想发财，他可能通过哪几个渠道呢？”我得到了答复。

这个“答复”，能否作为霍英东式的成功公式中，“机会”一项的假设呢？我没有把握。

霍英东的“发迹”，完全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例外。笔者的香港朋友的两点“假设”，并无事实根据，亦非“暗示”；纯属道听途说的推理，未经证实，亦未经霍氏本人表态。仅供读者诸君参考：

“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实施对华全面禁运。一切与战争和建设有关的物资，均在禁运之列。

“譬如，军人、机械、燃料、车辆（及其配件）、建材、钢铁、水泥、纺织品以及粮食、医药等等。

“中共正处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又逢战事，捉襟见肘。

“一方面向苏联‘老大哥’伸手要武器、弹药（不是白给，以后要还的），一方面只好通过秘密通道，‘走私’军需物资。

“当时最缺乏的是药品，止痛的吗啡、消炎的盘尼西林以及其它的外伤用药和药棉、绷带等。香港左派的报纸登载过，志愿军伤员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刀’的消息。其目的也是要海外的同胞设法筹集药品，以解战场燃眉之急……

“再就是武器、装备，特别是弹药和零、配件。众所周知，志愿军用的枪、炮，主要都是大陆易手时缴获的美式装备。弹药要补充，器械要更换。靠谁？正常途径不行，只好求助于‘地下交易’……

“据说当时中共派了一个秘密的小组赴港。成员之一是广州部队的参谋总长（原说如此——笔音注）。

“由于对华禁运，以转口贸易为生命线的香港首当其冲，一时百业萧条。

“韩战给予香港人的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共大陆急需的物资。比如一个国际单位的盘尼西林，从新、马购进，一转手就有三倍的利润，做军火‘走私’比医药的赚头更大，用一句广东话来说，‘赚到你惊’，‘赚到你怕’。笑话，赚钱哪有惊怕的呢，虽然要冒一点风险，从事这项生意的，大有人在。

“由于在关键的时候帮了忙。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一般都是非政治、纯经济的），中共当局给予了相当的好处，譬如某项大陆商品物资外销的总代理、总经销之类。

“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是‘爱国’的举动。但当时英国是‘联合国军’的参加国之一，在香港暗地为敌方运送战争物资，被视为是非法的……”

这是香港朋友所说的“假设”之一。

“当年还有一个发大财的机会，那就是‘走私黄金’。

“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实行黄金自由进口’。据说，如将1两黄金由墨西哥或泰国等地进口至澳门，再通过各种途径卖至香港或印度、东南亚各地，纯利在几倍或十几倍以上。

“本港的暴发户，不少就是靠运金来港而发了大财的。”

以上是“假设”之二。

除此以外，还有无别的办法呢？

“如果有船的话，还可以从‘金三角’……”够了！

说了半天，都是莫须有的猜想。究竟霍英东是因何而“发迹”？只有霍英东自己才知道。

若问笔者个人的看法？宁愿相信是第一种“假设”。但是任何假设，都不可轻信。“发迹”从来是不可告人的隐秘。世上有许多常人没法揣测的事，焉知霍英东不会通过其它的途径？！有道是：

鱼有鱼路，

虾有虾路；

蛤蟆无路。

蹦三蹦，也是一大步！

然也。

第十三章 投资地产 预售楼花开先河

霍英东生来喜欢冒险。在他的血脉里，显然有着来自父辈的搏风击浪的遗传基因。他一刻也不安于现状，一时也不乐于守成。他认为，“不断地寻求新的途径，从长远来看绝非投机。”

霍英东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现代的、开拓型的富翁。

利用“韩战的机会”，他赚了一大笔钱。有人说达“三十万美金”，也有人说达“一百余万美金”。没有人问过他本人。因为谁都知道，问也白问，就像西方女性不会告诉“芳龄”一样，对此类的问题，他从来都是缄口如锁的。

有一点可以知道的是，霍英东没有仿效乡下的土财主、暴发户，把钱装进小坛子里埋在地下；或是安于“小康”，买一幢楼宇，当一个不问世事的“寓公”。

不，他想都没有想过那样做。

假如那样做了的话，霍英东就不会成为今天的超级亿万富豪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厮守着妻子儿女、每天起身“叹”早茶“一盅两件”的温饱老者而已。

更何况，中国古训还有“坐吃山空”的说法呢？！

有一篇叫做《如何投资——这里为你讲述一些基本道理》的文章，曾堂而皇之地公诸于香港报端。文中写道：

“通货膨胀的威胁，叫现代人寝食不安。职存在银行的钞标，一天天不值钱。

“最厉害的是英国。1971年一磅还可以兑2.4美元，现在（1980年——笔者注）却只能兑1.65美元——贬值率48%（到了1986年，英镑与美元的兑率更低至1比0.7——笔者注）。

“意大利也很糟。里拉每年的贬值率更高达17%。香港、美国还算安定，但每年的贬值率也有5%。这已是十分‘幸运’的了。

“试想想，仅仅5%的通货膨胀，20年就‘面目一新’了。能叫你不吃惊吗？20年前有3万元（港币）已经可以买到一层两房一厅的楼宇，现在却仅仅可以买一个卧室（到了1990年，只怕一角厨房或四分之一卫生间，也买不到了——笔者注）。”

那么，假如有了多余的钱，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用钱，去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霍英东式的回答。

在香港，成千上万的财务公司、投资顾问、股票分析家都在绞尽脑汁，或者想自己“发财”，或者想藉教人“发财”而沾光。

“其实，发大财和赌博，所差不过一线而已。”此言极是。

如何押“宝”呢。

一是“集中投资”——看准时机，把全部积蓄、身家性命。一齐压在一个“桩”上。侥幸一炮中的，一夜暴富。这种做法，是“大勇者”、“大智者”所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敢尝试的（“也许还是先去相相命的好”）。

二是“分散投资”——毫一仙，来之不易。“三三”分投，最为稳妥。即是地产、股票、现款各三分之一。这“平均”的结果，是失败率减低了，

但肯定的是也减少了不少盈利。

至于投资方向，一般来说有以下四种：股票、基金、债券和买楼（房地产）。

“其中，我以为投资的最佳选择是：房地产！”

这是霍英东式的观点。

“从古至今，以房地产最能保存币值和牟取暴利。尤其是在‘寸土尺金’的弹丸之地——香港！”

于是，霍英东于 1954 年开始进军房地产市场！

霍英东翻开了他的生命的新的一页。1955 年初春，他毅然投身于方兴未艾的香港房地产大战。成立了立信置业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做出这一个抉择，绝不是“傻小子”的轻举妄动。对此，霍英东经过了一番精心的策划和思虑。香港是霍英东的“根”，是他的事业的舞台、阵地和疆场。因此，一切的安排和部署都必须从香港的实情出发。

这是毋庸置疑和无可撼摇的。

香港地域狭小，却人口众多。而且不论人口的数目与密集的程度，都与日俱增。有人说香港居民像住在白鸽笼里；也有人说香港居民的住所像火柴盒，“人如苍蝇生活其中，局促不安”……这是指一般中、下层人等，自然不包括那些居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富豪人家。

一方面是民用住宅楼宇的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写字间、办公楼亦奇货可居。

朝鲜战争以后，香港经济处于“起飞”状态，由于香港作为开放的“自由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使之一举成为远东的“冒险家的乐园”和“投机家的天堂”。各种国籍、各种肤色、各种资本的各方人士，纷至沓来。三山五岳人马聚集，九洲百国商贾齐汇，正所谓：鱼龙混杂，备显神通，办厂经商者有之，滚红挂绿者有之，买房买楼者有之，置地置产者有之。

生逢此时，怎能放过这个发财的绝好的时机！

大约在 1954 年冬日的一天《查过了皇历，注明今日“忌”理发，而“宜”置房），霍英东走进了铜锣湾的一幢多层楼厦。

“请问这楼是要转让么？”

“没错。”

“报纸上说‘价钱面议’。”

“没错。”

“多少？”

“我们要同买主当面商议。”

“我就是。”霍英东沉稳他说。

“你？！”楼面的经纪人斜睨了霍英东一眼。

“没错！”这回转到霍英东说了。

“要现金交易，一次付清嘛！”

“没错。”

只过了半个小时，霍英东就从旋转着大铜把手的门里走了出来。那个花白头发的、保养得极好的白脸胖子，一直把他送到门口。一躬近地，十分恭敬。

从这个 30 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把一张可以立即兑现的 20 多万港元的支

票搁在案头的一刹那起，他就成为了这幢大楼的业主。

“如果我是他，哪怕花上5毫钱去梳理一下一头蓬乱的头发，再去买一身半新的西装穿上，然后才来添置房产也好啊！”胖子经纪人望着远去的霍英东的背影想道。

第二天，身穿一套半新的中山装的霍英东又来了。他把一块大理石镌刻的招牌挂在门前的石墙上：

“立信置业公司”。

10年以后，“立信”的名号在香港几乎无人不晓。

霍英东的经营之道极有个性。一是富于想象力，二是敢于冒风险。

从1954年以后，发展至今日。他名下的60多间公司，大部分经营房地产业生意。他兼任香港地产建筑商会的会长，会内300余名会员，共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人把霍英东称作香港的“土地爷”，也有的叫他“地头蛇”。

“我将房地产工业化。”

在谈到房地产的经营问题时，霍英东一言以蔽之。

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购置物业。如果要买一幢楼，你得先准备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现金，一次付清。所谓“当面交钱，当面交屋”。少一毫一仙也不行，拖一时半刻也不行，一点通融的余地也没有。

买一幢楼如此，买一层、买一个套间，当然也是如此。

那个时候的房地产生意不好做。无论买者还是卖者，都感到周转不过来。霍英东常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只有最大限度的扩大购置对象，房地产才能‘发’起来。”

于是，他采取了楼宇“预售”的办法。你只需要先付10%的现金，就可购得一幢即将破土兴建、可供销售或出租的大楼。也就是说，以前你只能建造1幢楼宇，现在用同样的资金，你可以兴建（预购）10幢楼宇。

对于一般的房地产商来说，这样做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

更有宣传价值的是，今天，一个普通的、略有积存的女佣也可以拥有一层楼或是一个套间。她只需要先付一笔小钱“购”下，然后等待着楼层一天天地升高，慢慢补足差额即可。往往到落成时房价飞涨，她亦可将其产权“转手”而获取暴利。

“这就是香港盛行的‘炒楼花’。”

据说，靠此道发财的人不在少数。“炒楼花”远比“炒股票”安全。也就是说，即使卖不出去，仍是赚钱生意。10%或20%的首期，为数不多，用香港人的话来说，这等于买“孖展”（Margin）一样（买空）——一层楼的钱可以买五层至十层，只要每“层”涨价10%卖出，就等于赚了原资本的一倍或者更多……为时也不过一年左右而已。

霍英东说：“我们开展各种的宣传，以使更多有‘余钱’的人（譬如来香港定居或投资的华侨、侨眷，劳累半生略有积蓄的职员，赌博暴发者，做其它小生意涨满了荷包的商贩，等等），都来投资房地产。只要众多的人关心它、了解它、参与它，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

说到这里，霍英东的两眼炯炯有神，一改矜持、沉稳的神态。平时说普通话要字斟句酌，但一谈到房地产的问题，就变得异乎寻常地流畅和清晰起来。

“ 弓地产 ” ，这是霍英东全身心投入的、神圣的事业！

他说，买房产的好处有三：

一是强制积蓄。买了“ 楼 ” 后，难以立即脱手换回现款。结果使你的资产累积，不致东搞西搞把资金散失。

二是确保币值。打从我们老祖宗的日子起，房和地的价值从无动摇。现时代更是人口日多、地皮日少、币值日跌，房子自然看“ 涨 ” 。从表面数字看，是大幅度升值；从实质上看，是保存原有币值。

三是因地制宜。甚至从世界范围来看，买房地产发财最快的地方，首推香港。香港的巨富如李嘉诚、郭得胜等，几乎无一不是以“ 房地产 ” 为跳板，而登上亿万家产的巅峰。令人仰慕不已。

“ 当然，房地产的‘ 工业化 ’ 亦不是万元一失。遇到经济不景气或者政治动乱（譬如 1967 年的所谓‘ 左派暴动 ’ ），你会亏蚀。甚至倾家荡产，也说不定…… ”

霍英东生来喜欢冒险。在他的血脉里，显然有着来自父辈的搏“ 风 ” 击“ 浪 ” 的遗传基因。他一刻也不安于现状，一时曳不乐于守成。他认为，“ 不断地寻求新的途径，从长远来看绝非投机。 ”

一位外国记者在采访他后，写道：

“ 纵观他的大半生，他的所有的行动和心理，都具有鲜明的个性。非霍英东所不为，非霍英东所不想。有人称之为大企业家的风度和气魄。我以为还要加上职业赌徒孤注一掷的冒险特色。 ”

第十四章 独出奇招 沙里淘金成巨擘

20艘进口的最现代化的挖泥船“像那长龙的巨首，高傲地昂起了头颅。”船队，搅动了整个南海！淘沙业成功了，他因此想到了填海造地。

霍英东在迈进二十世纪60年代这个门坎的时候，做了一件令香港实业界瞠目结舌的壮举——淘沙。

钢材、水泥和沙，是三大主要建筑材料，离此一项，纵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这是属于常识一类的问题。

“沙”在哪里有？

一是河滩；但是车载船装，由内地运到香港，“豆腐盘成了肉价钱”，且数量有限。面对蓬勃兴起的香港房地产业，无异杯水车薪，难以应付。

二是海底；尤其是南海的礁盘浅海区，厚厚的沙层，几乎可以称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人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区区一个海域的储沙量，就可以整个地铺盖香港（包括大屿山、九龙、新界），且相对要“近”得多，随要随取，堪称方便。

要命的是“淘沙”业极富冒险性。投资大，周期长。在一般的情况下，需要的人工、机械量，与所取得的海沙相比，颇有些得不偿失。

面对一张特绘的“南海海底储沙分布图”，霍英东沉思了整整一天一夜，又召开了由各方面的“军师”（即人们常说的“智囊团”）参加的恳谈会，吵了一个晚上……最后，在霍英东的脑海里，勾勒出了这样一幅图画：

“在那大海的波涛中，大规模（只有大干，才能大赚）的机械化开采，捧出了源源的海沙，处于困境的淘沙业得救了，房产建筑业添上了一双翅膀；

“挖深海床，对疏浚码头、航道、泊位，将有开创性的意义；

“同时，它无疑地还可以为新兴的填海工程业务助上一臂之力……”

一石数鸟，何乐而不为之！

“闯！闯它一家伙！”这个柏拉达斯的冒险者，又一次血液沸腾了！

正如同一篇传记文学中所描述的那样，“霍英东悄然地进行着准备工作。他习惯在静默中行动，而不愿把计划过早地披露于报端”。

冬日的一天，在暮色苍茫之中，霍英东登上了“拾和号”远洋巨轮，开始了他神秘的欧洲之行。

然而神经敏感的香港报界，就像一台运转得十分警党的电子扫描仪，很快地就在报面上显示了他的行踪，1961年12月9日，香港《循环日报》刊登出了《霍英东购大泥船，代价港币120万元》的快讯：

“殷商霍英东，最近应邀赴英伦，作为时3个星期之考察教育及建筑商务，道经曼谷时，曾以400万余铢（约值港币120余万元），向泰国政府港口部购买了一艘载重2890吨、长288英尺的大挖泥船，于去周驶返本港……”

39岁的霍英东的行动，更比这“快讯”要快得多。

他属下的“有荣船务公司”成立了淘沙的分支。大、小近百艘船只，“像一条水上长龙，向大海远处进发了。”20艘进口的、最现代化的挖泥船“像那长龙的巨首，高傲地昂起了头颅”。船队，搅动了整个南海！

由于霍英东操有中国海沙的外销“垄断权”，淘沙业巨擘的地位，更使霍英东一跃而成为香港实业界的一个头面人物。为了进一步扩充设备、增强实力，霍英东一举收购了美国人的太平岛船厂。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

产业，这回却是全港最早由中国人收购外国公司的产业。他还收购了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从事填海造地，承包国际性的招标工程。从而向更大利润的领域进发！

霍英东无论什么时候与人交谈，都会使对方感觉到一种强烈得近乎于偏执的民族自尊心、自立性、自豪感。

话题常常是从大埗海底淡水水库谈起：

香港自开埠以来就缺饮用淡水。除了九龙的锦田河、林村河等几条水溪外、并无横贯的干流。靠天“落水”，好不惨矣。

有一位诗人把“深圳水库”输往港九的渠道形象地喻为“祖国母亲的乳腺”，这不无道理。

于是，香港当局修建了许多淡水湖（譬如“船湾淡水湖”、“万宜淡水湖”），水塘（譬如“薄扶林水塘”、“香港仔水塘”、“大潭笃水塘”）。殊不知在借地如金的香港，大片的人工湖、塘也是一种奢侈和浪费。七十年代，有人提出了修筑海底淡水水库的想法。很快地得到当局的支持。

通过紧密锣鼓的策划，香港“大埗海底淡水水库”举行了国际招标。

各国的财团及建筑客商，闻讯纷至沓来，差点挤破了“美丽华大酒店”的大门。

霍英东说：

“最厉害的要数日本人。整个日本的建筑业同仇敌忾，联合起来投‘标’，志在必得。却事违人愿，没有投中。

“法国的建筑财团欣然命‘中’。也许是港督更相信欧洲人的聪明才智一些吧！法国人却只干了一期工程，就赔得不清不白的，打了退堂鼓。

“用一句文诌诌的话来说，叫做‘挽危难于既倒’。第二期工程由我们‘立信置业公司’挑了头。怎么样？工程完成得漂漂亮亮，广东人说话‘湿水棉花——有（没有）得弹（谈）’。

“而且还赚了大把的钱。

“一个日本的建筑商看了眼红，问我请了多少外国的专家和设计师？我告诉他，没有！一个也没有！众所周知，在我的公司里从不雇用外国专家，全部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能力，一样能干得好！而且能够比他们外国人——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都要干得好！”

霍英东意犹未尽，他激情满怀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凡有人群、烟火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中国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人不服……

“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心始终都向着中国！中国！中国！不像英国移民到澳洲、新西兰、反过来反对英国！

“人材在哪里？在中国人里！在我们的同胞里！不要迷信洋人、不要一味重金去聘请外国专家。有时候你需要的人才，就在你的身边。要注重挖掘、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

霍英东以他的三个儿子（霍震霆、霍震寰、霍震宇）作例。他说：

“我的三个儿子都到外国留过学，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但要论本事儿，可以说他们都还没有胜过我这个‘土包子’。譬如，我主持生产的水翼船；譬如，我经营的房地产公司；譬如，我一手修筑的海底水库大坤淡水湖；等等。”

啊，大埗淡水湖！它就像一张摊开在海底的白纸，上面大写着七个汉字：
“中国——霍英东修建”！

第十五章 事违人愿 生意场上受挫折

1967年在“星光行”事件中，他挨了港英当局一“闷棍”。打得他叫苦不迭，心有余悸。没想到7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有关部门，又让他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霍英东从事地产建筑生意已40余年，最大的一个挫折，据说是1967年的“星光行”事件。

有人将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用三个陡变的时期来作为象征：

其一是1967年—1968年人心惶惶“萧条”的香港；

其二是1971年—1972年股市起落“疯狂”的香港；

其三是1978年—1979年房地产价如火箭升空“兴旺”的香港。

就像一条呼风唤雨的巨龙，霍英东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盘旋、呼啸、搅动于维多利亚港湾的上空。似乎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是吗？

四川有一首民歌唱道：“猛虎哟落在平阳地，蛟龙哟无水滚沙滩。”

这，正是1967年。它将作为动乱的、浩劫的年代，而永远载于中国史册：

1967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英政府纵容美军利用香港作为侵越战争基地；

1967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的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

1967年5月22日，罗贵波副外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

在北京，发生了一小撮极“左”分子（后来被称作“五·一六”分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

在香港，出现了一部分工人和市民的激怒和骚动……

中、英（港）关系，产生了一时难以弥合的裂痕，有谣言传出，“中共要动用武力收回香港”。

有钱人纷纷出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百业萧条，地产已属有价无市。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倒霉的是，属于霍英东的一幢坐落在九龙天星码头前的“星光行”大厦，恰好就在这时建成。

“星光行”大厦从一楼至三楼，绝大部分由专售中国大陆高级产品的“中艺公司”占用；四楼是星光邨，已休业的香港蜡像馆当初便设在那里。四楼以上是装修一流的数百间写字间。招租给各类客商。

没想到事违人愿。由于当时所谓的香港“左”派与香港政府势成水火，霍英东又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海沙的总经销。属于他的产业的“星光行”在招租时，受到官方的苛待和刁难，不难理解。

据说，当时凡有意租用“星光行”办公室者，都收到政府“电话公司”的“忠告”，要他们三思而后行；如租下来，安装电话则可能遥遥无期。做生意的人大都贪“利”而忘“义”，又最会见风使舵，谁敢同港府“拗手瓜”（粤语：作对头！——笔者注）？！再说，离了电话也确实无法做买卖。于是，纷纷退却；有的甚至连交了了的“按金”都牺牲不要。

在这种情况下，霍英东百感交集。只好一咬牙，把“星光行”以 3000 余万元的最低价售给了香港置地有限公司。

整个这一笔交易，霍英东亏损了数以千万的港元。他可买得了什么教训么？有的，正所谓“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

霍英东深知作为一个香港的商人，经“商”之尤艰、作“人”之倍难。

香港一方面为他提供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使之能够凭借各种“机会”大赚其钱；另一方面又将他置于了微妙的政治关系之中，宛如高空的杂技演员走钢丝，必须不断地在左、右间谋求“平衡”。

谈何容易！

1967 年在“星光行”事件中，他挨了港英当局一“闷棍”。打得他叫苦不迭，心有余悸。

没想到 7 年以后，到了 1974 年，据说中国大陆的有关部门，又让他陷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是年伊始，江青、王洪文等在中国大陆提出开展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所谓“批林批孔”的运动。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继续呈现出一片混乱。

4 月，霍英东到了北京。

这一年出现了少有的“倒春寒”。首都机场大道两旁绿化带的嫩芽，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白霜。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就国内建材的出口价格取得一些“谅解”。在香港 1972——1973 疯狂的股市跌落后，地产界“淡”风弥漫。霍英东感到稍有些力不从心。

有消息说，中国将提高水泥和建筑用海沙的价钱至国际水平（在此之前，采取的似乎是双方“议价”）。也就是意味着，水泥价增高了两倍，海沙价亦增加了一半。

作为大陆水泥的主要经销者、海沙的总代理，霍英东能不感到切肤之痛吗？！一边是买家的“淡”、一边是卖家的“涨”，奈何！

傍晚，长安街上华灯初放。他步出了北京饭店，没有要车，独自在王府井的人流中穿行着。心绪也像周围的环境一样嘈杂和紊乱。各式各样的购物票证、或长或短的购物人龙、又喊又叫的购物男女……都使他发烦、发燥、发闷。

他差一点就要喊出声来了。

“不，不能这样下去了！”

据说通过与一位接近周恩来的国务院人士坦率地交谈，他了解到当时中国大陆濒于崩溃的经济状况。国家外汇紧缺。你说是“挖肉补疮”也罢，你说是“杀鸡取卵”也罢，“提高水泥、海沙等建筑材料的出口价格势在必行”！

准又能够用身体去挡住“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呢？

翌日，霍英东飞回了香港。

1974 年 4 月 19 日，他在《明报》晚报发表了所谓的“大陆归来谈”。在这一次以及以后的多次谈话中，霍英东“恍若换了一个人”，他“一改过去那种‘打脱了牙齿和血吞’的形象，大吐苦水”。声称由于楼价暴跌，建材飞涨，“房地产业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困境为近数年所罕见”。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视此举为“霍氏的一种策略。不过是大放烟幕弹，以图伺机再进而已。”

平心而论，霍英东有霍英东的难处。有人曾经戏谑地把他比作是一块“汉

堡包”，就像是“夹在当中的一片肉，无论从那一边咬都难免祸及其身”。

第十六章 热爱大陆 言必称“三中全会”

他透过“三中全会”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光明，于是，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事业。

霍英东言必称“三中全会”。或者说，“霍英东在中国大陆的事业，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真正开始的。”

有一篇“寄自香港的报告”，在论及70年代末期巨富的霍英东时写道。

“……在世界经济强人之伍中，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也应该是踌躇满志的了。他似乎应该心满意足了。”

“然而，霍英东变了，他变得难以为周围的人（香港的、海外的）理解了。

“这位大富翁在事业成功之时，眉头却常常闪过一丝愁云，潜在的失落感、空虚感、孤寂感，时时煎熬着他的心，泛起一阵阵若有所失的怅惘……

“霍英东变了，变得难以理解了。

“这位大实业家，在他事业成功时，忽然间开口闭口必称‘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对大陆的一切都那么关心、那么热衷。

“有一位青年诗人说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既容易理解又难以理解。是的，如果纯粹从商人眼光来看，霍英东似乎不易被理解；若变换一个角度看呢，则又是最容易理解的了。

“有人这样理解他——霍英东透过‘三中全会’，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光明；他闻之，顿展笑容。

“有人这样形容他——于是，霍英东迫不及待地于1979年以后，真正地开始了他在中国大陆的事业；他欣然点头称是。

“有人这样描述他——他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踏上神州故土，投资、建设的第一批有志、有识之士中的一员！他听及，更是心喜得很，引为知音、知己。”

但是，仅仅这样来理解、形容、描述霍英东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心灵深处，是一个丰富得多的精神世界！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在“中国共产党”一栏里，它是这样记载的：

“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由三中全会起，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目共睹党的“三中全会”是我国开放和改革政策的划时代的里程碑！

这样比喻，一点儿也不过分。

“心有灵犀一点通”。

从1979年初的那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霍英东历史性地跨过罗湖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个年头，在这些年里，霍英东做了哪一些事呢？

数目字是枯燥的，但有时却又是生动、形象且最富有说服力的：

白天鹅宾馆——捐赠、投资合营 12,200 多万港元；

中山温泉宾馆——投资、捐赠 2,390 多万港元；

扩建广珠公路以及修建大桥（四座）——捐赠、低息贷款 6,060 多万港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 1000 万港元；

体育事业基金——捐赠 1 亿港元；

暨南大学——捐赠 780 万港元；

北京饭店贵宾楼——投资 5892 万港元；

扩建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捐赠 2000 万港元；

中国癌症基金研究会——捐赠 846 万港元；

国家教育委员会（30 名留学生）捐赠 100 万美元（近 800 万港元）；

国家教育基金——捐赠 1 亿港元；

第十一届亚运会——捐赠 1 亿港元；

还有，北京首都宾馆、洛溪及三善大桥、沙湾大桥、番禺体育馆、中山大学体育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和仲恺农业技术学院教学大楼、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中心、中国体育历史博物馆及中华武术研究中心、北京体育中心游泳场馆、中山运动场……不及全列。

据不完整的统计（仅公诸于报端的消息）可知，近 10 年来，霍英东通过几个基金会（包括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霍英东番禺建设基金会）资助了国家 110 多个建设项目，分别以投资合营、捐赠及低息贷款等方式进行。截至 1991 年 3 月，其支出金额高达 132,600 多万港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曾经三次问及霍英东投资总额的翔实数字，三次得到的回答都是，“问题不在于投了多少钱，问题在于我们办成了几件事。我这个人办事，不办则已，要办就办成；不是一件，而是几件、几十件……”

党的“三中全会”像不像一首诗中所说的长青的梧桐树，引来了许多只如同霍英东似的“金凤凰”呢？

第十七章 投石问路 建中山温泉宾馆

他不但有钱，而且有胆、有识，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仅用一年多的时间，温泉宾馆如期开幕了。投资者的远见，办事效率之高，实属胜人一筹。

霍英东颇具幽默感。他不止一次地谈起回番禺寻“根”的两件奇遇。一是浴盆里的软木瓶塞，二是汽车排队轮渡。

那还是 1979 年的早春时节。根据语言专家的断定，霍英东的口音应属广东番禺。于是他和澳门名流何贤一道，回到番禺老家寻“根”来了。

说实在话，霍英东三代旅港、本人亦出生在香港，对故乡毫无印象。既没有童年时的池塘、老榕、秧田，也没有俩小无猜、青梅竹马的邻家小阿妹……哪里有“根”可寻？只不过是一种理性的表现而已。

然而有关方面对此却十分认真。

第一流的接待。第一流的规格。

他被安排住进县委院内小招待所一号楼的一间最好的套房里。

据说，某年某月某一位中央的领导同志视察珠江三角洲，就下榻在这一间完全有资格辟为“纪念地”的房间里。

又据说，前不久一位大军区的司令员经过此地，盛宴之后曾在这里午休过片刻，堪称难能……

京官遗迹，将帅雄风，给这一间套房罩上了辉煌而又神圣的光圈。

霍英东被带进了这一套大而无当、处处都显露着简陋、粗笨的房间。

没有贴墙纸，没有地毯，当然也就更没有空调设备。

稍顷，一位热情的黄脸老妇（“公关小姐”乎？）拎来了一大桶滚烫的“冲凉水”。

霍英东推门进了卫生间。

隐隐一阵没有冲净的尿臊臭……只见蹲式的白瓷厕坑沿，积了淡淡的一层黄垢。

最不能叫人忍受的是、又大又厚的浴缸里的出水孔、竟塞了一个软木的热水瓶塞。天啊，可真能凑合！

霍英东到底没有按原定的计划在家乡县城住一晚，而是连夜赶回了广州市。他感到了一种失落，是他欠了故乡一点什么，还是故乡欠了他一点什么。一句话说不清楚。

在回程的路上，又遇到了不愉快。

来时因为有预告、有关部门进行了提前安排，没有感到特别的不方便。回去是临时决定的，车队被堵在洛溪附近的一个渡口。暮色浓重，春寒料峭。前、后动弹不得。纵有当地父母官出面，奈何！

“没有想到，由番禺到广州不过 10 多 20 公里，因为要等汽车过渡，竟然走了 4 个小时。天还没黑由县城动身，回到省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一位陪同人员回忆说。

为什么不在 4 条截断公路的河汊上建造大桥呢？

不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没有钱。修“桥”补“路”，属于国家的公益事业。除非国库拨款，当地政府断无财力完成。

霍英东的心里，又是一阵苦涩。

几乎就在现场，他表了两个“态”：

一是约请何贤、彭国珍等“乡里”（粤语：老乡），或是捐赠、或是集资在番禺、在广州、在中山建宾馆、盖酒楼。“对外开放了！外国人要来，港澳同胞要来，海外华侨要来……人来了，总得有个落脚点嘛！要是连个像样一点的住的地方也没有，人家谁还愿来？”

二是策划建桥。他带头投资，会同港澳的其他富翁，在省市县的共同努力下，5年内修造四座横贯广州到番禺、珠海的长桥。由霍英东倡议，采取了“过桥收费”、“谁用桥谁掏钱”、“合理均摊”的办法，据说很快就能收回全部建桥投资。“这种办法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国外早有实行。许多高速公路、海底隧道、桥梁等，都采用类似的步骤。坐等国家投资，多少事儿也误了……”

“不是给人以金子，而是教人以点金术。”这是霍英东的另一句名言！

霍英东不但有钱，而且有胆、有识。他当然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他想到如果成功地建设好一家现代化的旅游宾馆，这对增强人们的信心、激励甬进精神、加强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管理经验，都有莫大意义。

他终于决定硬着头皮去试一试。

他首先选择在中山三乡雍陌温泉兴建第一座宾馆。为什么呢？他扳着指头，告诉记者：此地毗邻澳门，既有温泉，又与翠亨中山故居、古歧、长江游乐园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旅游区。于是，他与澳门巨富何贤等共同投资四千万港元，与中山县（现为中山市）合作兴建。

说至此，霍英东先生一笑。他说，他当时发现在县里的事情好办一些，只要县委书记同意了，便可统一指挥，互相扯皮的事也比较少，牵涉到体制上的互相制约因素也比较少。

在管理工作上，霍英东采取灵活措施。他针对“大锅饭”的弊病，改善了一些长期不合理的体制。譬如，在部分员工中试行合同制；又对工资奖金试行改革，多劳多得，以调动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许多方面他用承包的办法，限期搞好，使工作加紧进行。

他放出豪言，决定在一年内争取把温泉宾馆建成。

要知道，那是在“百废待兴”的1979年。物资缺乏，样样都要进口。廖承志曾对他说，内地只有砖、瓦、沙、石和人力，其它都要你来搞了。在这种条件下，在5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要建成10幢住客大楼、14座别墅，共200个房间包括附属建筑。总建筑达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园林式宾馆，而且还要有与之适应的设备和良好的服务，更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办好；其所面对的困难和窘境，可以想见得到。

霍英东搞过驳运、搞过房地产、搞过填海工程等等，却没有办酒店的经验，因而处理许多事情颇费脑筋。但他虚心向人请教，又事必躬亲在中山蹲了一段时间，处处抓紧，终于赶上预定速度。

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如期开幕。宾馆各种设备要从外地进口，十万件物品尚未向美国落单；临近开幕，要命的水、电尚未解决。霍英东日夜督促赶工、争分夺秒，他用承包的办法，样样限期办好。那时宾馆土建虽已完工，但室内墙纸、家具、甚至暖水壶、水杯都待进口后布置。有了水电，他马上通知人把在美国定购的东西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物资立即转到澳门，随即入关；来不及报关了，便申请特准，先入关再补办手续。

开幕时需有住客，难得热闹。霍英东在当地举办网球比赛，请来国内各地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港的好手参赛。宾客即将入住，这对服务员是

个考验。他们过去从未受过训练。连吸尘机也不会使用。客人在房间丢下件衫，要不要把它挂起来；客人饮剩一杯茶，要不要倒掉，都要有个章法。霍英东又抓紧培训服务员。

开幕那天，霍英东坚持举行正式宴会，而不是简便的酒会，使客人都能坐下来吃，这又增加了大量的工作，筵开百席，在当时来说，办副食品并不容易。他要求县府给予支持，每个公社承包一道菜，譬如烧乳猪即由一个公社包办，终于顺利解决了。

自 1979 年始建，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山温泉宾馆如期开幕了。霍英东给全体员工多发了一个月的奖金，以示鼓励。

“温泉宾馆”开创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河。1980 年底宾馆开业时，距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1980 年 8 月），还不足 3 个半月。投资者的远见、办事效率之高，实属胜人一筹。正如王匡在《庆祝中山温泉宾馆开业十周年》一文所指出的，霍英东“把自己从事的合作事业看成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业，而不止是自己集团的企业”，满怀爱国受乡热忱，才能如此高瞻远瞩。

到 1982 年，霍英东又投资 1500 万港元，与温泉宾馆合作兴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设 72 棒、18 个洞、总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温泉宾馆开业以来，以其优雅舒适的环境、先进的设备、优质的服务，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宾馆十年间总收入达 3 亿 7500 万元，资产总值达一亿元。

霍英东小试锋芒，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为其投资更大的旅游宾馆——“白天鹅”，摸索了方式、走出了路子、积累了经验。

第十八章 立体丰碑 白天鹅婷婷玉立

他，堂堂正正的站在中山大学的讲坛之上，他讲的是：白天鹅宾馆！这是他心目中最钟爱、最得意、最引以为自豪的“博士论文”。

公元 1987 年 2 月 7 日。

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

还是那一个传奇的香港汉子：霍英东。是年，他已经 60 多岁了。华发早谢；黝黑的男子汉的轮廓分明的脸上，有几道深深的皱折；目光的穿透力很强，透出沉稳、机敏和自信；大耳朵，直鼻子，一笑，有几分和善，又有些许老年人的童稚……他西装革履、端坐在大会的主席台上。

台下聚集着南中国最高学府——中山大学的五千莘莘学子。

中山大学校长李岳生教授在讲话。

他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四条‘对于国内外卓越的学者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学位授予单位提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规定，中山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并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著名社会活动家、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话至此，李岳生教授一顿。

轰鸣的掌声响起。

霍英东的眉头向上一挑，抑制住涌动的心潮……起身向校长及师生们致意。

李岳生教授继续讲话：

“霍英东，广东番禺人，1923 年 5 月 10 日生于香港，1941 年以前就读于香港皇仁英文书院。战后从事商业活动。1955 年起，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及有荣有限公司等 60 多间公司。现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国际足球联合会理事、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亚洲足球协会副会长、亚洲象棋联合会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及香港十多个单项体育组织的名誉会长。”

寥寥数语，勾勒了霍英东的人生之旅。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接下去聆听李岳生教授的发言：

“1980 年霍英东先生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现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1985 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霍英东先生热爱祖国、拥护我国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支持祖园的统一大业，热心祖国及家乡的建设事业……”

“……从 1977 年开始，便在内地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交通、旅游事业，为了更有效地支持祖国建设和促进香港地区的繁荣安定，霍英东独家出资约十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通过投资及捐赠等方式，参与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地及香港、澳门地区的福利事业……”

一阵又一阵热烈而又真诚的掌声。

“全国政协常委”——“中大名誉博士”——“十亿港元的霍英东基金

会”！有谁能够把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与当年的那一个漂泊在香港青衣、广州白鹅潭的一文不名的“蛋家仔”联系在一起呢？

他站了起来！

是的。他，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中山大学的讲坛之上——要发表他的名誉博士的学术讲演！

他要讲什么呢？

可以讲的有许多许多……

但是霍英东的心目中，最钟爱的、最得意的、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一篇立体的、里程碑式的博士论文《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

他要讲的是：白天鹅宾馆！

他开宗明义，直奔主题：“四年前的今天，即1983年2月7日，是本人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也是全国第一家高级宾馆对广大群众全面开放的一天从白天鹅宾馆的筹建、施工到开业、管理、发展，我深深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政策的正确性。”

他侃侃而谈。

不善言辞的霍英东博士一改往日之习性，大谈起建设白天鹅宾馆之三部曲奏曲。

其一，“建设宾馆应选择在什么地方呢？”霍英东博士说：“北京是十亿人民的首都，世界各国使节与万商云集，有看不尽的名胜古迹，长城、颐和园、故宫和宏伟的天安门广场等；看来，是最理想的。

上海在30、40年代已经同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著名城市。

而广州除了在交易会开会期间外宾较多外，平时多是接待回乡探亲的港澳同胞、华侨，并无吸引游客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接近港澳，沟通较易，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有利条件很多。于是，在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下，我们决定新宾馆的地点选在广州。

霍英东博士进而阐述道：

宾馆设在广州，但具体建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这里也有学问。

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市内公用交通工具不足，加上考虑购物的方便，酒店一般多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但是，经过几天对全市的亲自观察，发现沙面河畔有一块淤塞沙滩。我认为在这里兴建宾馆最为理想。因此，要求以填河方法获得土地用来兴建，方案马上被接纳了。这样可以减少拆迁。

当时，很多人以为我选择这块地方是借鉴耸立在湄公河畔的世界大酒店之首的曼谷东方酒店，其实也不尽然，白天鹅宾馆面临珠江三江会台的白鹅潭，河面宽阔，风景特佳，比湄公河更具雄壮气派。

为了增添沙面休憩地方，我还决定拨款多填6000平方米土地，另捐资300万港元建设公园，供市民享用。

其二，“关于白天鹅宾馆设计、施工、采购等问题”，霍英东博士如数家珍：

我提出“三自”方针。这就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和自己经营管理。

首先，我在广州参加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师对宾馆设计的座谈会。听专家们各抒己见。在座谈中发现，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

师们对新的事物仍然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对内地情况也有不理解的地方……由于设计工作涉及部门达 30 多个，所以我认为必须由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比较合适。后来这批建筑师应邀到香港参观考察一段时间，开了眼界，他们的智慧便充分发挥出来，终于设计了一间矗立如玉屏，配以飞瀑流涧、花艳草翠、堂内庭园中西台壁的白天鹅宾馆。

对于施工问题，当然是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但也采取新的办法，以承包方式进行。至于设备的采购方面，又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原来一间宾馆需要采购的东西不下十万种，大的如空调、电梯，小的如专用信纸、信封、杯、碟等，需要的品种多、数量少，而且内地大厂供应不易，要向世界各地采购。但决定仍然交由内地自行负责。我们设法从旁协助，从而也为内地培养了一批采购人材。

至于经营管理方面，我们当时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交由外国管理集团管理；

二是完全由没有干过宾馆行业的国内人士自行管理。

衡量之下，我们还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方式。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整个宾馆 2000 多个员工，包括总经理在内，没有一个干过酒店行业。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的精神。1985 年 10 月，白天鹅宾馆正式被国际旅业组织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间超一流酒店。这就证明了炎黄子孙无限丰富的智慧和才能，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是可行的。

其三，“宾馆开业前的几段小插曲”，霍英东博士谈及往事，感慨非常；众多细节，记忆犹新：

白天鹅宾馆终于在 1982 年 10 月 14 日秋交会前，试行部分营业——先是将 5 层楼 200 个房间开放，边施工、边营业，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开幕前我入住白天鹅宾馆，房间还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的供应。

14 日客人快要来了，我早上巡视厨房，发现炉灶还未安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只有一塘水。当时见到一位青年主管，我对他说：

“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书记来宾馆吃晚饭，就算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待客！”

原来我以为只有很少客人，开几桌就够了。结果省、市来了 100 多个贵宾。出乎意料之外，开出来的也不是四菜一汤，而是颇具规模的晚宴。部份营业计划终于实现。

经过 3 个月部分营业，我们积累了对 2000 多个员工实地培训的经验。下一步决定在 1983 年 2 月 6 日春节前全面开业。有些人误会以为抢先营业是为了赚钱，其实并非这个原因，如果春节开不成，南方天气潮湿。将会损坏宾馆的大量物资。

1983 年 1 月初，我察觉工程进度很慢，就决定要求抢在春节之前最后一个星期全面开放，就是四年前的今天。

当时大家对能否赶上，还没有信心。因为宾馆情况极为混乱。宾馆内有一个 2000 多人的施工队伍，另有 2000 多个服务人员，加上旅客总共不下 5000 人。酒店进出非常凌乱，搬运货物进出电梯拥挤不堪，工棚和数干部单车把半个沙面都占了。然而，在省市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白天鹅宾馆依时于 1983 年 2 月 6 日正式对外开放！

第十九章 平易近人 亿万富豪赤子心

白天鹅宾馆刚刚开业，霍英东先生就提出要“四门大开，欢迎群众进来。”他说过一句流传得很广的话：“先有‘人气’，才有‘财气’”！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

1983年2月7日。

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后的第2天。

公共关系部副经理史濠陪同霍英东先生去参加广州“华侨酒店”的剪彩仪式。车刚刚开到沙面引桥的一半……霍英东就示意道：

“停车！停车！”

——怎么啦，老板？

“你即刻下车！”

——嗯？！

“你看这宾馆门口冷冷清清的，引桥上一个人也没有……”

——酒店有规定，非往店的客人一概不得入内。

“这样不行。你马上去告诉朱一明总经理。就说是我的意思，从今天开始：四门大开，欢迎群众！要知道，这句话说得多好啊！先有‘人气’，才有‘财气’啊！”

这句话说得多好啊！先有“人气”，才有“财气”——成为霍英东先生的一句流传在海内外的至理名言。

然而，谈何容易！

霍英东先生的“意思”，首先就遭到了宾馆内包括一些高层人士的反对。

——老板不懂。这个“门”绝不能开。一是走遍北京、上海，没有先例；二是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三是损坏了物资谁负责？别的不说，单说这地毯一平方英尺（脚掌这么大的面积）就值十港币，经得几踩？

无奈霍英东坚持不让步。他说：

“广州沙面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以前就有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创口；如今修了一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与当年的洋人买办有什么两样？！”

又说：“北京、上海的酒店，我们管不着！但我知道，全世界的酒店都是向公众开放的；没有理由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酒店，要对公众封闭！”

于是，某些人士退让了。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春节期间，“白天鹅”采取了买门票（每人一元人民币）的做法，票款可作为消费的茶资——今天听来，无异于一段令人捧腹的笑话。

霍英东愤怒了：“为什么要限制人进来：公众有什么好怕的呢？让广州的、外地的人都进来看一看！看一看祖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建设、新面貌，有什么不好呢！”

终于只卖了一天多的“门票”，就停止了。宾馆的四门敞开、万众涌入！人山人海，闹市一般。

史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有人别出心裁，在昂贵的进口地毯上铺了一层花布；还有人说，晚上清扫大堂捡了几箱子的、被踩掉的鞋……这个我没有看到，属于花边新闻

一类！”

开放了一段，又有港澳人士向霍英东先生进言：为了保持酒店的“高档次”（东南亚之最），应该不让那些衣着随便的人入内，以免破坏了绅士淑女的氛围……

霍英东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他说：“什么叫‘衣着随便’？什么是‘绅士淑女’？……你们今晚都见到了省委书记、省长：一件风衣、一双便鞋……难道连他们也不够资格、也要赶出酒店么？”

众口缄默。

“至此，白天鹅宾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国际五星级的、中外合资的酒店！”史濠说。

我看见，在他的脸上漾满了无比的自豪和得意之情。

宾馆首任总经理朱一明，对笔者说了他与霍英东相处在一起，印象最深的事情。他说：在到“白天鹅宾馆”以前，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霍英东先生。好像一次是足球、一次是“中山温泉”的落成庆典。只知道他是一位爱国爱乡的香港知名人士、一位超级的亿万富翁。

一见面，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朴素、易于接近和富有平民的气质。精明、强干、远见卓识，自不必说。

相处这么多年来，对于霍英东先生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很多……譬如：宾馆装修期间，他光着膀子与员工们一起为客房搬家俱。

请进来、派出去，他自己掏腰包为宾馆培训各方面的专业人材；

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大至斥资数百万美金的 21、22、23 层商务楼层的改建，小至餐饮部牙签尖尖上的一层淡淡的薄荷；

为了宾馆迎送国宾的需要，他亲自给杨尚昆同志写信，一次就免税赠送给“白天鹅”30 辆豪华奔驰轿车；

一到年终，他就派来自己的财务人员，为宾馆两千多员工发“红包”；

如果说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发生在宾馆外的一件事儿：

那一年，我陪同霍英东先生驱车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干病房看望一位他的老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冲。

病人重危。时值炎夏，房间里温度高达摄氏三十八九度，宛如热腾腾的蒸笼一般。一会儿的功夫，汗水就湿透了我们的衬衣。正常人都受不了。遑论病危者。

霍英东即刻请来了医院的领导。询问能否在屋里安装冷气器。

当然可以。只是，钱……

这个不是问题。麻烦你们作为非常情况，立即予以购置、装修。

李冲在凉爽、舒适的“空调”的环境里，只过了三天就“去”了——霍英东为此花费了数万元——多么值得记忆的、弥留的三天啊！

这就是霍英东：一个满怀同情心、富有人情味、不忘老朋友的人！

曾初荣是 1984 年 8 月调到白天鹅宾馆的。第二年，即满了 50 岁，进入“知天命”之年。在“白天鹅”一群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之中，曾初荣显出父亲一般的突出和重要。曾初荣当了 3 年多的保安部经理，1988 年 11 月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

客家口音。中等个儿。不胖不瘦，貌不惊人。可是只要见他一面，就叫你许久还忘不了他。

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观察能力。

笔者与他谈起了对霍英东的印象。他一点也不回避、直抒胸臆：

“我很赞赏霍英东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管理白天鹅宾馆，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此乃印象之一。

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白天鹅宾馆，体现了什么？

我们说，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志气和才气！外国人能办得的事儿，中国人也能办到。白天鹅宾馆矗立在珠江岸上，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广州的形象、中国的形象！

要为“白天鹅”增光，不能为宾馆抹黑。这一点每一个员工都要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经济，这是政治。

印象之二，是霍英东先生的“群众观念”。宾馆刚刚开业，霍英东先生就提出要“四门大开，欢迎群众进来”。他说过一句流传得很广的话：“先有‘人气’，才有‘财气’”！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

有一回，宾馆保安部接到内部通报：有人要暗算霍英东先生。

霍英东先生是宾馆的副董事长，更是全国政协常委，宾馆保安部即刻与省、市公安部门联系，除采取相应的保安措施外，决定霍英东先生外出活动，派警车开道……霍英东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

“这样不好！……会打扰广州市的市民。警笛一响，弄得众人不安！”

他几次告诉专车的司机：

“开慢一点，离警车远一些。不要招摇过市……”

这，就是香港亿万富豪霍英东先生，无论何时、何地，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平民意识。

霍英东曾说，我们都是“龙种”，要让我们的巨龙在东方逞起威风。

1984年10月1日。正值国庆三十五周年的盛典。

秋空高朗，秋水澄碧，秋风染金。

北京天安门城楼整修如新。在十月的阳光照耀下，益发显得巍峨、挺拔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金碧辉煌。

被外国记者誉为“世界最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如海、花如潮，彩旗像一个个奔涌的浪头。

上午10时整，等待已久的、激动人心的阅兵式开始了！

军乐团奏起了雄浑、壮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看，过来了仪仗队、军事学院方队、海军学院方队，空军学院方队、步兵方队、水兵方队、伞兵方队、坦克方队、炮兵方队等等。

好啊，“勇士如云唱大风”！

喊声震天，机声撼地。凡身历其境的人，无不为之惊心动魄、盛叹不已。真正地感到了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的骄傲和自尊！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儿童喜欢模仿军人的英姿，而老人则常有着孩子似的真诚。”此刻，天安门城楼上的一群德高望重的人物，虽多已近暮年，亦无不沉浸在欢欣、激奋和自强不已的情潮之中。

有人告诉正在西观礼台上现场采访的记者说，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正仁立在观礼台的前排。

这位记者是一个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北方姑娘。她顺着手指的方向望

去，见到的是一位身着藏青色西服、现代绅士模样的人的背影。他，中等身材，皮肤呈健康的橄榄色，匀称、矫健，一点儿也没有发胖。他一动也不动地“钉”在石阶上，双手凭栏，像一尊青铜铸的“金山伯”（粤语：老华侨——笔者注）的雕像。

年轻的女记者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个上佳的“新闻目标”。她轻盈从观礼的人群中穿了过去，手里拿着一个话筒，想请这一位名闻遐迩的香港富豪谈点国庆观感。

“霍英东先生，您好！”

没有回答。

广场上正隆隆开过巨大如飞艇般的导弹牵引车……

“霍先生，您好！”

记者一连问了三声好，竟还是没有得到回答。

蓦地，霍英东如梦初醒，转过了脸来。看得出，他已经不年轻了。微秃，一张晒得黝黑的脸上，纵横交错着不多的几条皱纹。那坚毅的、男子汉式的、轮廓分明的下颚，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此刻，那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的是什么？

是泪花。

只见他略显老态的松浮的眼角，噙着两朵晶莹的泪花；而另两滴泪珠，正顺着脸颊缓缓淌下……

他无意掩饰自己的落泪。

啊，不！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这是真诚的泪，

流自心底的泪……

这是一个挨过英国警察的皮靴、日本皇军的耳光、美国水兵的唾骂的炎黄子孙——一个香港人的泪！

这是在五星红旗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的泪：

欣喜的泪！自豪的泪，庄严的泪！

他听到了记者的问话么？听到了……但，没有听真。通过话筒，记录到录音磁带上的似乎是所答非所问：

“霍先生，您好！”（一连三次）

“好！好！好……好哇，中国导弹！”这是霍英东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声音。

“好哇，中国导弹！”

谁说这不是一句最为生动、最力精辟、最为动情的观礼即感呢？！

女记者注视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只觉得一股热浪直向眼眶涌去……

第二十章 孝敬“母亲” 盖酒店不为赚钱

他说：“我并不希望把钱都留给子孙。中国人历来最讲孝道，我发达了，理应孝敬母亲……我出一点钱，对整个国家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

一天，霍英东先生忽然同笔者谈起了老庄。他挥笔潇洒地在纸上写下了《庄子·逍遥游》中一段文字：“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鼯鼠饮河，不过满腹。”

那意思是极明显的：

小鸟栖止在树上，所占的不外一根树杈；鼯鼠饮水，所喝的不外装满肚子。

一个人，他的需要、享用是有限的。

是啊，要那么多的钱做什么呢？

“我已是 60 多岁的人了。并不希望把钱都留给子孙，只想在去见老祖宗之前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

他又说：

“中国人历来是最讲孝道；我发达了，理应孝敬母亲……我出了一点钱、一点力，对整个国家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

又近十年来，霍英东通过几个基金会（包括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霍英东番禺建设基金会等）资助了国家 110 多个建设项目；分别以投资合营、捐赠及低息贷款等方式进行。截至 1991 年 3 月，其支出金额高达 13 亿 2600 多万港元。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摊在每个中国人头上，正好一块多港元。

有道是：在商言商。

兴办教育、建医院、筑球场、修桥铺路……古往今来，都称之为“善事”。这些当然可以不以赚钱为目的。那么盖酒店（特别是盖白天鹅宾馆这样超豪华的酒店）呢？

霍英东的回答同样是明确的。

宾馆的档案资料中，有霍英东先生亲笔签署的三封信函。

一封写于白天鹅宾馆筹建阶段（1982 年 4 月 1 日），函致；广东省旅游局并呈刘田夫省长、梁威林副省长——

有关维昌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广州白天鹅宾馆由贷款方式改为合股方式问题，业于 1982 年 3 月 31 日与彭国珍先生备文送呈，谅邀达阅。本人对此项建议，其目的希望为白天鹅宾馆的经营管理多尽点力量。以个人立场，绝不计较将来利润收益之多寡；且对于宾馆营业后，我个人所分得的全部收益，我亦准备用于国内再投资或捐赠给有关部门，用于教育、医疗、或其他公益事业。

为此，表白我的心意，希望省局及二位省长惠予接纳，俾能在四化中多尽点绵力。如何之处，仍侯示覆。

并致

敬礼！

1983 年 3 月 7 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刚好一个月，港方维昌发展有限公司的另一大股东彭国珍先生不幸病逝于英国伦敦。霍氏收购了公司的全

部股权。正当白天鹅宾馆如日中天、蓬勃发展之时（1989年8月13日），霍英东再次致函：广州白天鹅宾馆总经理杨小鹏先生——

为表示本人对白天鹅宾馆全体员工的谢忱，进一步鼓励大家之努力，也为祖国之开放政策做点尝试工作，对白天鹅宾馆从今年（1987年）开始，陆续偿付给维昌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本息拨给成立开发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和职工房屋补贴方案之资金。望能在商品房开发工作上，为祖国各企业解决职工住宿问题上，共同研究可行办法。至于开发公司之组织及经营管理方式，将由我们共同协商，以符合本人1982年4月1日致广东省旅游局转呈刘田夫省长及梁威林副省长函内声明：“对将来白天鹅宾馆营业后，我个人所分得的全部收益，我亦准备用于国内再投资或捐赠给有关部门，用于教育、医疗或其他公益事业”之本意。

谨此致意您及白天鹅宾馆全体员工！

一年后，霍英东又一次剖腹但心地表露了自己的意愿。他致函：白天鹅宾馆转广东省旅游局——

敬启者：查1982年4月1日，本人就有关投资白天鹅宾馆事，曾致函贵局及刘田夫、梁威林两位先生，提及准备将本人在白天鹅宾馆所分得之全部收益，用于在国内再投资或捐赠给有关部门用于教育、医疗及其他公益事业。由于本人在1984年间成立霍英东基金，并且对捐赠省教育及医疗方面，已有安排。例如医疗方面：有省人民医院；教育方面：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仲恺农业学院、番禺中学、元甲学校等项目。因此，今后本人在白天鹅之收益请白天鹅宾馆代为储存，以便成立一个基金，作为长期性解决白天鹅全体职工住房及福利计划之用，来响应我国房屋改革计划解决职工之住房问题。深信此举将有利于白天鹅之长期发展。

用特函达，即请查照为荷！

此致

字里行间，其泱泱之情、拳拳之心，可以明鉴。

也许有人会好奇地询问，信中“本人在白天鹅宾馆所分得的全部收益”究竟是一个多大的数目？据了解：除了霍英东先生捐赠或无偿提供给白天鹅宾馆数千万港元的车辆、设备、建筑外；他投资宾馆的本金和利息，到1998年（宾馆正式开业15年）总额应为4000万元美金——约合港币3亿多元。

至今有目共睹，他却是一毫、一仙也没有拿走过。

那么，盖酒店（特别是盖白天鹅宾馆这样超豪华的酒店）不是为了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第二十一章 三次光临 小平说“‘白天鹅’好”

他们到了 28 楼总统房和 25 楼高级套间。俯瞰江景时，邓小平十分高兴地称赞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宾馆）还要好！”

1985 年 2 月 23 日（乙丑年正月初四），邓小平同志再次来访白天鹅宾馆。

一切同往常一样。

没有封馆清场，没有红地毯，没有盛大的欢迎仪式。

就像一个普通的客人。乘车沿引桥悄然而至。随行的还有王震、余秋里等中央的领导同志。

霍英东专程由香港而来，他在正门迎候邓小平。

两人紧紧地握手。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的瞬间。在霍英东的脑海中，还有另外三次——那永生的记忆啊！

记忆之一——

1964 年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的知名爱国人士，收到了一份烫金的大红请柬。落款是赫然几位历史伟人：

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

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朱德（全国人大委员长）

周恩来（国务院总理）；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自然是霍英东先生生平有幸的、莫大的荣誉。

在国庆招待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身着中山装的、个子不高的、精神抖擞的中年人，走了过来，依次同港澳的知名人士握手。他还似乎特地问候了霍英东一句：

“欢迎您来北京！”

这是谁？

有人告诉霍英东，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

霍英东想起来了！只是觉得眼前的他，比之照片更要目光有神、更要步履矫健、更要坦诚可亲。

记忆之二——

1977 年 7 月 30 日晚，“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闭幕。球场的气氛，空前地热烈。

人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猜测到了什么，而且十分急切地等待着什么——关于一位人民爱戴和敬仰的共和国领袖的命运之谜！

一阵无声的声浪卷过了全场。

倏地，整个赛场 8 万观众静了下来。静得似乎听得见计时钟“嘀哒”、“嘀哒”……秒针的行进声！

所有的目光，一齐聚焦在主席台上出现的那盼望已久的、熟悉的身影——邓小平！这位被外国记者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正健步向他的人民、他的时代走来！

这是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陡地，全场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恰如那“于无声处听惊雷”！

所有在场的人——当然也包括即将与中国青年足球队进行闭幕战的香港足球队的领队：霍英东——无不欢呼起来！人们在欢呼：正义的胜利！真理的胜利！民心的胜利！

掌声持续了近十分钟。

你除非身历其境，不能体会此时此刻爱的火山所能够迸发出的不可压抑、不可抵挡的强大的原动力和穿胸透腑的力量！

霍英东心潮奔涌、激动不已——十多分钟前，在休息室里，他和其它国家的足球代表团的领队们一起，接受了邓小平的亲切问候；并与他紧紧地握手——他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

有一首《船长——献给一位敬爱的人》的诗，是这样写的：

他说自己是普通水手，
只不过多经几回风浪；
人们赞颂伟大的船长，
他带领中国胜利远航。

记忆之三——

仅仅两个月后，霍英东又到了北京。

金秋时节，西山叶红。

1977 年 9 月 29 日的晚上，国务院办公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欢迎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活动和旅行探亲的旅居海外的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华侨、外籍人士。

前来参加庆祝活动和旅行探亲的共有 27 个代表团，共 800 多人。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出席了招待会，并在招待会前会见了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和知名人士，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的谈话。

走进会见大厅，邓小平一眼就认出了霍英东。他笑着迎了上去，连声地对霍英东说：

“欢迎！欢迎！”

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致词祝酒。

他号召全国各族人民，遵循党的十一大的路线，为完成大会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他指出，一定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王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他还讲了许多。

霍英东从邓小平的祝酒词里，依稀感觉到了一股清新的、别样的风……有道是：

律回岁晚冰霜少，
春到人间草木知。
八年过去了！神州天翻地覆。

其间——1984年1月。早春时节——邓小平南下广东，走访中山温泉。他兴致勃勃地登上罗三妹山，眺望温泉宾馆全景。到下山时，随行人员建议沿来路归去；但邓小平却意气高昂地说：

“不走回头路！”

于是，大家再向前走一条崎岖、漫长的下山路径……一时传为佳话。

此前，邓小平亦曾先后两次到过“白天鹅宾馆”——

一次是在1984年1月31日。

据宾馆“大事日志”记载：

上午10时45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及杨尚昆、王震等一行31人前来宾馆参观视察。

他们到了28楼总统房和25楼高级套间。在28楼俯瞰江景时，邓小平十分高兴地称赞说：

“‘白天鹅’好！比美国的（宾馆）还要好！”

下到大堂，邓小平仁足观景台，对“故乡水”表示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他到“丝绸之路”高级西餐厅——扒房进餐，连声夸奖：

“很好！”

很多东西使他想起了当年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情景……餐后，邓小平接见了西厨的厨师们；并同他们合影留念。经过咖啡厅时，正好有许多外国公司的职员（长包房的客人）在进餐。邓小平和其中的一位外宾握了手。一些持有摄影机的客人纷纷拍照，摄下了珍贵的镜头。

12时40分，邓小平一行离开了白天鹅宾馆。

还有一次，是在四天前的1985年2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在白天鹅宾馆举行了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宴会。

正在广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及邓颖超、徐向前、王震、杨德志、韩先楚、王首道、何长工、宋时轮、钱昌照、杨成武、肖华等出席了联欢晚会和宴会。

除夕。宏伟壮丽的白天鹅宾馆披上了盛装。春意盎然、灯火辉煌，呈现一派节日景象。”

邓小平等一行走进宾馆大厅时，受到了宾馆员工和住客的热烈鼓掌欢迎。他们连连呼喊：

“邓伯伯，您好！”

8时20分，宴会结束。步入“宏图府”会场，邓小平神采奕奕，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文艺演出，并在演出结束后与全体演员合照留念。

“白天鹅”永远难忘的除夕之夜啊！

大年初四，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三次来到宾馆的日子。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白天鹅宾馆的副董事长霍英东以及霍震霆夫妇，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会见；并与邓小平一行在“丝绸之路”西餐厅共进晚餐。

霍英东先生祝福邓小平主席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邓主席祝霍先生等新春佳节好，并向港澳同胞致以节日问候，希望他们和港澳同胞为香港、澳门的繁荣作出贡献。

据霍英东先生几年后对笔者回忆说：席间邓小平多次提到了“一个珠江三角洲、一个闽南三角洲、一个长江三角洲……”，表露了极大地关注——此后不久，果然中央宣布了继续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的决定。

从谈吐中笔者感觉到霍英东先生对邓小平同志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由衷的敬爱之情。

第二十二章 友好使者 迎送 35 个国家元首

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阿维兰热下榻白天鹅宾馆，他高兴地对霍英东说：“一个拥有这么富丽堂皇的宾馆的国家，没有理由不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足球队”

霍英东先生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曾经引用了《三国志·魏书》中的一句话：

敦睦亲亲，
协和万国。

他说，要通过“白天鹅宾馆”，把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以及对各国人民的友情，通过各国来访的友好使者，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这是“白天鹅”的职责，也是“白天鹅”的光荣！

从 1983 年 2 月正式开业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白天鹅”共接待了 35 个国家的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及军队的要人。“白天鹅”给贵宾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86 年 10 月 18 日，这是自无鹅宾馆盛大的节日、难忘的日子之一。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爱丁堡公爵，于午间到达广州后，在广东省叶选平省长的陪同下，乘坐名贵的劳斯莱斯轿车来到白天鹅宾馆，在宾馆门口，宾馆的副董事长霍英东、总经理杨小鹏等带领 100 名服务员，热烈欢迎女王与公爵一行的光临。

两名少女手捧红玫瑰和白玉兰，献给女王和公爵。

女王一行步入白天鹅宾馆宴会厅——宏图府的通道时，女王看到了大堂内刻有“故乡水”三个大字的人工瀑布：

别来此处最萦牵

她不由驻足观赏、面露微笑，轻轻地赞了一句：“美丽的景色！”

是时，叶选平省长在宏图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席上，突然有人悄悄他说：女王来了！由广州乐团 60 位艺术家组成的乐队，立即奏起了广东音乐《娱乐升平》。

全场嘉宾起立鼓掌。

女王和公爵在省长叶选平和霍英东等陪同下就座。

宴会筵开 13 席。

主宴席是个巨型长方形的桌子，可坐 22 人。桌面上有康乃馨花（俗称母亲花）和气生兰花砌成英、中两面国旗。每面国旗的长度达一米多。英国国旗用白色、红色的康乃馨以及染上淡蓝、红两色的气生兰砌成；中国国旗的五颗金星用黄色康乃馨花、底色用全红的康乃馨花砌成。两幅国旗的外面，都饰以山茜草。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显示出一种庄重和华丽的气派。左右更分别设置了精制的两个昂贵的水晶玻璃的白天鹅。

宴会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一个适合女王口味的菜谱。伊丽莎白二世出访经北京、上海、昆明后，才到广州。各地的名菜，很可能都尝到了。为此，菜色不但要做到清淡可口，而且要少而精，富有广东风味。

上菜了！

欢宴女王的菜只有六道。菜单上的名字寓意吉祥、浪漫主义色彩颇浓，

不容易叫人猜得到。且看那菜一道一道上来：

“月映仙兔”，即是遗迹闻名的广东点心的拼盘；由精制的白兔饺、炸芋角、春卷、干蒸烧卖配成；

“双龙戏珍珠”，是由龙虾和明虾制成的虾球；两只造型生：动的龙虾，眼球在银盘上闪闪发亮，细雕的皇冠加盖在宝鼎上，有龙有凤倍添宴会的喜庆气氛；

“燕乳入竹林”，是以名贵燕窝和鲜嫩竹笋为原料配制；碟上摆有一只由红萝卜雕成的小鸟，比喻乳燕穿飞于竹林之间；

“金红化皮猪”，是一道广东名菜；上菜的程式更成为宴会的高潮；四名男服务员穿着古代皇宫服装，抬着一顶富有中国传统的“花轿”，轿内摆着两只金红色的化皮乳猪，在轻松欢快的广东音乐《得胜令》中步入席间；两名宫女装扮的服务员，手提宫灯作前导；轿后跟着两排各六个服务员，用手托盘，依次上席为贵宾献上佳肴；如此精彩的中国宫廷式上菜表演，使整个大厅兴致更浓，霎时掌声四起……女王微笑着向服务员致意；

“凤凰八宝鼎”，即是广东有名的冬瓜盅；为避免冬瓜因焯得过久而变形，厨师巧妙地用一个刻着大熊猫和各种图案的去瓢生冬瓜壳，套在焯好的冬瓜盅上，冬瓜壳的上盖还摆着用红萝卜雕成的一只美丽的小鸟；女王赞叹道：真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冬瓜盅内的填料更是精致，内有鲍鱼、鸡粒、花菇粒、湖莲子、金华火腿、鲞肚，瑶柱、肉柳粒……吃来味道格外鲜美；

“锦绣石斑鱼”，是一道海鲜；经过人工的装点，显得不同凡响，恰如其名，像锦绣般的美，又博得了一片溢美之辞……

上完了六道菜，接下来是甜点心：

“淋杏万寿果”，取意祝愿女王健康长寿；是用南杏和被成为万寿果的木瓜，加糖清焯而成的……

最后，服务贝捧上用哈密瓜精雕成的一艘盛满各色佳果的游船“一帆风顺”，表示祝贺女王访问成功，满载着中国人民对英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喜乘游艇一帆风顺地回国。

宴会从 12 时 30 分女王一行入宏图府开始，直到午后 1 时 40 分结束，耗时只有一小时零十分；全过程就像在电脑指挥下，精确而有条不紊地在预定的轨道上滑行……创下了本地有史以来大型宴会的高效记录。

宴会将要结束时，叶选平省长将一盆有 60 年树齿的“九里香”盆景送给伊丽莎白二；而向爱丁堡公爵则送以一尊陶像——笑容可掬的“钟馗饮酒造像”，叶选平笑着说：“钟馗是能驱鬼的！”爱丁堡公爵报以开心的大笑，场面十分融洽。

宴后，女王及公爵乘电梯直上白天鹅宾馆 28 楼总统房。

稍事休息。

下午 2 时 15 分，霍英东先生及其长子霍震霆、长媳朱玲玲，还有杨小鹏总经理等，齐集 28 楼总统房，向伊丽莎白二世赠送精美玲瓏的、中国传统的内画鼻烟壶——这个鼻烟壶颜色有如白雪，壶盖以白银制造，上缀有红、蓝等各色宝石；在壶的两边内壁，一面画着女王的彩色画像，另一面刻着白天鹅宾馆“故乡水”的彩景，用笔精密奇巧，活灵活现，真个是鬼斧神工，令人赞叹不已——女王收到礼品后，端详了一番，甚表欣悦；即时说：“漂亮极了！”并连声道谢，再次与霍英东副董事长握手。

女王在宾馆的留言簿上，高兴地签上了名字——“伊丽莎白二世”。

在 28 楼上，女王临窗眺望，对刚落成的风景如画的宾馆后花园和秀丽的珠江两岸的景色，表示欣赏。

女王对随身的侍从说：这间酒店实在是太漂亮了！她还向总统房的服务员，索取了白天鹅宾馆的明信片。

据记载：最早莅临“白天鹅”的，是来自非洲的刚果总统德黎·萨苏·恩格索。总统一行 70 余人，于宾馆正式开业后一个多月的 1983 年 3 月 15 日抵达，并下榻了一晚。临行，热情的刚果总统称赞道——

“……白天鹅宾馆的服务、她的美丽和舒适，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们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

1985 年 9 月 9 日，曾经到过 90 多个国家、住过几乎世界上所有五星酒店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白天鹅宾馆举行的宴会上真诚地说——

“可以说，白天鹅宾馆是最漂亮的，比著名的美国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还要好。”临行时，又写下留言：“我曾经往过美国 and 全世界的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与白天鹅宾馆相比。其精美的菜式、优质的服务 and 超水准的诚挚接待，使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白天鹅宾馆的特色是优雅、舒适。”

1985 年 10 月 17 日，美国副总统布什及夫人到白天鹅宾馆参观访问后，热情洋溢地写道——

“……你们的接待是一流的，服务是优良的。”

此外，白天鹅宾馆还是一座具有世界影响的“体育宾馆”。许多重大的国际足球或其它体育项目的比赛，都以这里作为“大本营”。体育世界的“首要”们，也多次云集广州白天鹅潭畔——他们既是副董事长霍英东的老朋友，又是白天鹅宾馆引以为骄傲的、无比珍贵的客人。

1987 年 11 月 19 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应邀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下榻白天鹅宾馆，他盛赞——

“白天鹅宾馆是中国、是东方最叫人留恋的地方之一。”

1988 年 6 月 11 日，亚洲足球联合会第十三次会议在白天鹅宾馆召开，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阿维兰热出席了会议并下榻白天鹅宾馆；他高兴地对霍英东说——

“一个拥有这么富丽堂皇的宾馆的国家，没有理由不拥有一支高水平的、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足球队！”

在采访中，霍英东先生对于笔者引用《左传·隐公六年》中的一句话，十分赞赏：

亲仁善邻，
国之宝也。

他引为宽慰的是：为扩大我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为开展“和平共处”的外交、为密切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白天鹅宾馆聊尽薄力、功不可没！

第二十三章 吉人天相 战胜死神的挑战

像过去的七次挑战一样，癌症没有能征服霍英东，而霍英东则一举击败了死神。在病愈以后，他更是新添了一套奇特的健身法。

屈原在他的名篇《离骚》中写道：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霍英东先生国学渊博。他说，诗中所道的，正是他那一年面对死神时的心境。

——他曾患有癌症？！

这是一条鲜为人知的、秘不可宣的内部消息……

它曾在少数圈内人中悄悄地传递着，却一直未能得到证实。

这次，是霍英东先生本人当面向笔者坦言的——

1991年11月10日。

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的乡村别墅式的餐饮厅。

在他和我的座前，各摆着一樽桔黄色的鲜榨橙汁。霍英东刚刚从户外打“波”归来，兴致勃勃地对笔者讲起高尔夫（GOLF）球的掌故。他说：

“G”，是绿色（Green）、是草地；

“O”，是氧（Oxygen）、是新鲜的空气；

“L”，是光（Light）、是阳光；

“F”，是足（Foot）、是脚部乃至四肢的运动。

这是高尔夫的A、B、C。作为我当然不是头一回听到；而作为亿万富豪的霍英东，则是一种谈话的艺术。他善于在一种营造的无拘无束的氛围中，进行一些对于双方都不轻松的谈话。

他淡然一笑，继续了昨晚我与他的一番长谈：

“你可能也知道，那一年我得了要命的癌症……”

他的普通话说得不算太准。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您说什么？”

“我说‘癌’Ca.！”

我的笔停了下来。我缓缓地抬起头来，面对着我的是一张清瘦的、红润的、健康的花甲老人的脸……我不明白此刻他告诉我这一件事的用意何在？

昨夜，我们谈到了他的人生跨越的七个“高峰”。那既是他的事业上的七座险隘，又是他向命运作出的七次大的挑战：

其一，是远走东沙岛捞海藻（1948年）；

其二，是抗美援朝期间，驳运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1950年）；

其三，是在香港进军民地产业（1954年）；

其四，淘沙及疏浚澳门港口、开发航运和娱乐事业（1959年）；

其五，承建香港大坡海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1972年）；

其六，是争取中国重返奥运及“国际足联”（1975年）；

其七，是率先兴建中山温泉和白天鹅宾馆（1979年）。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但主要的，就这七次：每一次都是一次登高攀险，每一次都是一次拨雾穿云；每一次都有淌不尽的心血，每一次都有诉不完的苦衷；每一次都要殚精竭虑，每一次都要披肝沥胆；每一次都不希望有下一

次，每一次又都紧接着下一次……第八次呢？第八次竟是面对死神的挑战！
我等待着霍英东说下去。

他似乎觉得不值一谈。只是轻轻他说了一句：

“我死不足惜。毕竟来得及做完了许多我愿意做的事儿。毕竟‘白天鹅’飞起来了！这是最令人欣慰的！”

可见，“白天鹅”对于霍英东的一生功业，有着举足轻重、绝不可小觑的地位，都说，如果是一个小说家，“白天鹅”是霍英东的压卷之作；如果是一个画家，“白天鹅”是霍英东的传世之笔；如果是一个作曲家，“白天鹅”则是霍英东的生命交响诗中最后一个乐章的、最辉煌的、最华彩的一段旋律……是不是呢？记得宋人陆游诗曰：

壮心未与年俱老，
死去犹能作鬼雄。

然而，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到的“死神也望而却步”，像过去了的七次挑战一样，癌症没有能征服霍英东，而霍英东则一举击败了死神。

梁东海——他的亲如子侄的秘书，对我讲起了这一段的始末：

1983年2月6日。

白天鹅宾馆历经周折，终于如期在广州正式开业了。就像一部快速飞旋的机器，倏地慢转下来，奔走、忙碌、运筹达5年之久的霍英东先生和他周围的人，好不容易停下来，舒了一口长气——这时候人们才感到：周身劳累的交困、通体疲乏的积淀、遍处隐疾的表露……

3月7日，“白天鹅”的另一个香港投资者彭国珍因为肝癌而病逝于英国伦敦；距开业的一长串鞭炮声响起的时辰，刚好过了一个月。你知道“积劳成疾”的含意么？

这一年春夏之交，天气暖得特别地早。仿佛从冬天一步跨入了夏日……霍英东先生从香港“第一届世界超级女排邀请赛。”的赛场，回到他在扯旗山麓的住宅。

沐浴方罢，时近子夜。

他端坐在长长的餐桌前，享受着这一天里第一顿也是唯一的一顿美食：玉米、芋头、粥以及乳鸽、鸡等。

记不得当晚是谁在霍英东的左腋下，发现一个隆起的小肉疙瘩……他自己摸了摸，也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头。

翌日，即到医院检查。

由香港名医陈焕章主持。切片化验，确诊为——淋巴瘤。

宛如晴天一声霹雳，一向自持强身有术的霍英东先生，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得此几近无望的绝症。

难得他，却能处之泰然。

根据医生的意见，霍英东入住玛丽医院。华人名医王元美教授主刀，切除了癌肿。手术十分成功。

是时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杨尚昆打来电话，亲切慰问；并转达了国家有关领导人的关心和安排。

不久，霍英东先生北上进京，住进了西郊的三 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经过电疗、化疗等三个疗程，癌症居然得到了控制、没有扩散（据说，淋巴瘤是“跑”得很快的！）。

吉人自有天相。

弹指间，已过去了8年。“癌细胞”再也没有来打扰这位爱国爱乡的香港亿万富豪！他不但仍然活着，而且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洒脱、更加充满活力！

除了一如往常的饮食习惯（笔者曾经在一次“午夜餐”上，亲眼见到霍英东先生的惊人的食量：两碗鸡丝粥、两个嫩黄的玉米棒子、一截半杯口粗的槟榔芋以及三只烤得金黄油亮的中山乳鸽。他说：“不吃这么多，晚上睡不好；吃饱了，才会睡得安稳……”）外，他更加注重运动了。

那一天，在广州二沙头的网球场，人们有幸观看了霍英东参加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网球比赛：

第一场是他与万里委员长配对，同广东省前省长梁灵光、朱森林代省长组成的一对，进行双打比赛。霍英东先生的后场长球，打得相当漂亮；与万里委员长的既飘又旋的短球，配合默契。最后，前者以三比一取胜。

第二场，仍是霍英东与万里结伴，直落三盘，战胜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和国家奥委会主席何振梁的组合。而后者的平均年龄要比前者年轻10岁以上。

梁东海说，霍英东在病愈后，更是新添了一套奇特的健身法：

一、首先在跑步的器械上，进行20分钟左右的、由慢到快的练习——谓之“动”；

二、接着在热气腾腾的、超过50°C的木屋中，进行10分钟左右的桑拿浴——谓之“热”；

三、然后在3—5（用机械制冷或倒成桶的冰粒入池内）的冻水里，进行4分钟左右的没顶浸浴——谓之“冷”；

四、从刺骨的水中爬起即裹上浴巾，再入热屋里蒸烤；蒸毕，又入冻池中浸浴。

如此这般：“热”——“冷”——再“热”——再“冷”……三至四个来回。这一套路，不知是霍氏自己创造的，还是经人指点的？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第二十四章 强身健体 心醉神迷当“球星”

霍英东经常身先士卒，带领足球队员冲锋陷阵，在他 43 岁时率队第一次参加香港甲组联赛，首场开赛他一人竟打进了三球，一时在港岛传为佳话。

在霍英东先生保存的一棵珍贵的照片中，有一张他于 1971 年与巴西球王贝利的合影。照片上贝利的那一行龙飞凤舞的签名，更增添了它的难能可贵的身价和意义。

记得霍英东先生曾说过：

“孩童时，我便恋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驰骋球场，受到万众欢呼拥戴的球星！”

霍英东的“球星梦”，从孩提时代一直做到了古稀之年。

三十年代，学龄前的霍英东常与邻里的伙伴在横街窄巷踢小皮球，弄得一身的黑汗水流。入了小学，老师不准在狭小的校园里踢球，去大足球场又不够格，他们只好又回到横街窄巷“操练”。阵仗一开，霍英东总是身心投入，尽情体味过关斩将、叱咤风云的欢欣。霍英东忆及有一次踢得浑身发热，他脱下羊毛衫，返家时忘记带走，被母亲好揍了一顿。

四十年代，人皇仁书院读书时他爱踢小足球，无奈功课太紧，练脚的时间不多。日军侵占香港，主计尚且难继，哪里还顾得上踢球。光复后忙干糊口，更是没有时间，五十年代初，从东沙岛回来，身体情况每况愈下。到了 1954 年，霍英东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夜以继日，每天仅睡三、四小时，体重只剩一百零二磅。这时他才警觉到要认真锻炼体魄，决意每天定时参加足球及游泳，网球等项体育活动。

六十年代前朗，年已“不惑”的霍英东经常下场参加足球比赛。他组织的“有荣”小足球队和“卓然”队，在港澳地区是支劲旅，每年比赛近三百场，连续十年风雨不辍。他本人就是这支球队的中锋，在圈内颇有名气。直到今天，香港足球界仍拥他为“大哥大”。霍英东经常身先士卒，带领年轻队友冲锋陷阵；在他 43 岁时率队第一次参加香港甲组联赛，首场比赛对有名的“杰志”队，他一人竟打进了三球，一时在港岛传为佳话。各大报均刊登了霍英东射门破网的特写照片。他的足球队每年的活动经费都在一百万港元以上。他乐此不疲。

霍英东先生的网球亦打得相当出色。在 1972 年至 1977 年间，曾六度获得香港网球公开赛双打冠军。他还参加过在英国温布尔顿的“老将”双打比赛。尽管未能获胜，但却是第一个在温布尔顿参加元老网球比赛的中国人。

有一位中国记者，曾经这样描述了年过“花甲”的霍英东先生打高尔夫球的情景：

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所。

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从别墅式会所出来，过阳台，下阶梯，踏进灌木成行、遍野绿茵的丘陵——18 洞、72 标准棒锦标赛球场。

几十名记者追踪着他。霍英东的正面、侧面、背面，无论哪个角度，似乎都有摄影机在掀动快门。霍先生组内共四人。其中，一名职业选手是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的教练邓树泉。他是从香港聘请来的。据说，在香港从前中国人是没有资格打高尔夫球的。邓树泉打做球童、为外国球手背球棒开始，

学会球艺，成了香港高尔夫球会第一名中国教练。根据高尔夫球规则，职业选手在离终点最远的一号球台发球，然后，业余选手在二、三、四号台发球。

霍英东和另一名业余高手朱宗奇选了二号台发球。霍英东侧身而立，发球棒与球道成直角，虚劈几下，一棒猛击，白色小球如流星一般破空飞去，落在百余公尺以外。

第四名年轻女选手黄丽霞在四号台发完球后，霍英东等几位球手来到落球点，找回各自的球再往终点方向击去，如是者二次三番，四个球便都飞进了终点球台。

霍英东把坡度、角度、力度、风向等因素估量了一阵。举棒击球，用力大了，“过犹不及”；再计算一番，轻轻一拨，球进洞。

一阵喝采！

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是由国际著名高尔夫球垦阿诺·庞玛设计的。

18个洞根据地形环境布置，洞与洞之间距离远近不等。全程计5,991公尺，打完一场球约需四小时（霍英东他们这一组，从十一时二十分开始直打到十五时四十五分方告结束）。

这个球场位于中山市南部温泉区。东部是罗仙姑山，西部则为广阔的田野。置身其间、可欣赏到田园景色又可呼吸到乡土气息。

霍英东击出一个漂亮的远程球之后，兴致勃勃，谈兴陡起。池向记者介绍：打高尔夫球对中、老年人最合适。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有益于身心健康。他说，在欧美，高尔夫球非常普及，几乎人人会打。

打到第四洞，已是十二点钟。观众陆续返会所吃自助餐。除了零星的几个球迷，绿茵场上只剩下四个球手及各自的球童。

第十洞。霍英东一棒击去，糟糕！球儿飞进了一百多公尺外的池塘里。霍英东不无遗憾地跺了跺脚。

对此，一位了解内情的球会工作人员说：霍先生对这个场地并不熟悉。虽然他参加了投资，但只是在1984年8月落成典礼时打过一场球，此外，是在前一日练习过一次。

团体赛每组只记两个人的棒数：一为职业选手，二为业余选手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第十四洞，起止466公尺。霍英东略呈疲态，停打一洞。坡地上，他手拄球棒；寒风中，他轻擦汗泥。

最后一洞，尤为紧张。

全部记者、观众围了过来。

起止479公尺。按常规，职业球手五棒进洞，业余选手六、七棒也算好成绩。只见霍英东每打一球，看一眼地势风向再换一根球棒，背着十四杆球棒的绿衣球童，递一根收一根，与之配合得非常默契。

第一棒是个好球，飞过池塘，落在球道中央；

第二棒，球差一点儿就飞进树丛，幸亏从坡地上滚落；

第三棒美极了，象燕子般飞落球道；

第四棒一击，力气稍显不足，球儿未能进入终点球台；

第五棒向插着旗杆的洞儿击球而去，落点离洞只有几公尺远；

第六棒是地滚球，未进洞，大感失望；

第七棒，绝妙！进。

只见霍英东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是漂亮的最后一击！第二十五章 倾注心

血 助中国走向世界

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德黑兰参加亚洲足协会议。他有意藉此机会，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中国加入“亚足协”，再图扩展。

在七十年代，霍英东倾注于协助祖国的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他认为，在国际乃至世界的竞技场上夺取金牌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从而参与各项赛事，发挥其作用，乃是十分紧迫，丝毫不可小视的问题。

谈何容易！

当时，外有反华势力作梗；内有“左”的干扰。要解决这一难题，阻力甚大且曲折颇多。

霍英东选择“国际足联”为突破口。

1974年。北京。

霍英东邀请赫赫有名的国际足联的会长和秘书长一行抵埠。由于有关方面心有疑虑，相互推诿，以至这两位及其它国家享受“红地毯”待遇的足球世界的无冕之“王”到京时，中国体育部门官方竟无一人出面接待。好不淡漠！

晚上九时，贵宾莅临北京饭店宴会厅。

大厅冷冷清清。

门口仅站着两人。一个是尽力堆着笑脸的霍英东，另一个是其长子霍震霆。

不仅如此。

会长和秘书长的住房也不可通融地安排在一般外宾住的中楼，不安排到贵宾住的东楼。规格之低，一目了然。

唉！——霍英东处此尴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多方解释，尽量自圆其说。

尽管遭受了一回挫折，霍英东先生仍然满腔热情地抓紧一切机会，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而四处奔走。

1974年，德黑兰。

霍英东以香港足协负责人的身份，赴伊朗首都参加亚洲足协会议。他有意藉此机会，先从亚洲足球协会打开缺口，争取中国加入“亚足协”，再图扩展。

当时，联合国已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国际奥委会及其它许多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仍把中国排斥在外，而保留了台湾的席位。人们注意到，那个时候东西德、南北朝鲜都分别同时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亦都分别参与了各项国际体育赛事。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似乎除了“取而代之”以外，别无选择！

关于“恢复中国在亚洲足协中的合法会籍”的议案，照章应该在德黑兰会议开幕前60天提出。因此，大会前一天“亚足协”执委已经决定，本次会议下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据说，中国国家体委的人士也表示，认为不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取得突破了。

尽管如此，霍英东仍抱一线希望、尽心尽力地去争取。

他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两年后才再召开会议，又得拖后两年了！霍

英东心有不甘。倏地，象电石火花一般，有一段文字在他的脑海闪过：按照章程，议程以外的议案均不得在会议上讨论；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数支持，作为紧急事项，提出临时动议，才能列入议程。

这时，霍英东正在餐厅里吃牛扒。他放下手中的刀、叉，抓起纸巾擦了擦嘴，便起身去游说、活动了。

伊朗朋友首先作出了响应。他们在会上提出了“让中国入会”的问题。

主持会议的会长是马来西亚的东姑拉曼。他接受了伊朗代表的提议，在会上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辩论。支持动议一方所持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长期把它排斥在亚洲足协以外，当即许多代表同意把“让中国入会”的提案，作为紧急事项列入议程。会长虽有许多难言之隐，也只得付诸表决。投票的结果使霍英东力之一震：赞成票刚刚超过四分之三。

列入议程这一步总算争取到了。接着是讨论“让中国入会”这一实质性的问题。

这时，又遇到了难题。按章程规定，亚洲足协只接受已参加国际足联的成员。那时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足联的成员。

霍英东灵机一动，又与其它的代表一起逐议修改章程。提出章程可改为：“亚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的会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足球比赛的，其队伍亦可被接纳为“亚足协”的会员。按照规定，修改会章亦需有四分之三以上票数通过。这次是用举手方式表决，结果又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接纳中国为会员，就得开除台湾出会。当时一些国家与台湾仍保持微妙的关系。

霍英东胸有成竹，沉稳以待。

果然，一经举手表决：赞成票再一次超过了三分之二！于是，中国足球协会在“亚足协”中合法席位，终于取代台湾而得以恢复！

霍英东欣慰地笑了。

连闯三关，一连以三个超过四分之三通过议案的事，在亚洲、在世界体育史上都前所未闻的。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以及她的国际地位的举足轻重。而霍英东的积极活动和争取，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拿回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知法席位，打开了广阔的通道。

太白诗曰：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亚洲足协接纳中国人会的消息，借助新闻媒介顷刻间传遍了整个世界。有关人士为之哗然！

处于中枢地位的“国际足联”闻讯，十分震惊。在众多会员国的要挟下，当即采取了措施：由国际足联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中国的决定是“非法的”，要“予以取消”。其势汹汹，非常强硬。

台湾方面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足球”被突破了，会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台北与瑞士的“热线”不断，频频施加压力。

有消息传来，国际足联有意要处分亚洲足协。

霍英东遇乱不惊，处之泰然。

国际足联的会长历来都由欧洲人担任。新近当选会长的第一位非欧洲人阿维兰热，是霍英东的朋友。这位风度翩翩的巴西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但因刚上任，各方压力又大，只能谨慎从事。他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亚洲足协的问题，这个小组，由每一个洲选一名代表组成。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的副会长。他代表亚洲足协参加了这一个小组。每逢讨论，霍英东均据理力争，使得国际足联无法作出结论。

1975年。香港。

四方瞩目的亚洲足球赛，在政府大球场举行。中国能否参加，这是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足协的会籍已正式恢复，但在国际足联的官司尚未了结。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更大波折。

香港足球总会拟拍一封电报到瑞士，向国际足联请示。

“不。”霍英东沉吟片刻，说道：“发电报乃举手之劳。但万一复电说不行，便再无转圜的余地。而且将形成恶劣的先例，以后中国参加其它国际比赛都会遇到麻烦……”

如何才好呢？

霍英东当即与霍震霆商议。他让霍震霆立即启程前往欧洲，请求会见国际足联的会长和秘书长。

随后，霍英东亦飞抵瑞士。

会见时，霍英东力陈己见。他提出了一条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香港“亚洲足球赛”邀请中国参加是适宜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国际足联的会长和秘书长权衡再三。当然首先考虑到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引人注目的巩固和提高，中国返回国际体育大家庭乃大势所趋；其次也出于他们个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终于，他们十分开明地应允了。

霍英东欣然与之碰杯答谢。

这，便打开了缺口。

1975年后，所有亚洲足协举办的比赛，中国足球队都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加。

自从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以后，其它各个单项国际体育组织接纳中国为会员国的障碍便宛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伏了。

尽管仍然棘手，但最终都得到了解决。

1979年。日本。

在国际奥委会的名古屋会议上，中国奥委会提出的设想（即：只要台湾奥委会改名、改旗、改歌，就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体育组织，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代表的接受。正式付诸表决，获得绝大多数票。这一划时代的决定，使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达30年之久的合法权利得到了恢复。

霍英东欢欣雀跃，倍受鼓舞。从而，更加积极地力争取我国体育的合法权益尽力。本来，有了国际奥委会解决中国问题的“模式”，其它许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皆可依样恢复我国的会籍，“但事情并非如收简单”。

棘手的“多米诺骨牌”依次如下：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最早处理此事的，是 1980 年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在会上，正式提出表决：要求台湾改名为“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所谓的“国歌”、“国旗”，同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会上台湾代表发言，认为台湾与其它扩员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不能奏国歌，挂国旗？他认为这是一种歧视。霍英东代表香港与会。他说，姑勿论对此事如何看法，如获通过对中国、对台湾都有好处；因为，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可以参与比赛。及后表决，提案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

几天后，轮到国际足联开会。霍英东据理力争。会上，台湾变换了对策。他们的代表对欧洲的一些代表说，改“名”是可以的，但不必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那一条。欧洲人对此表示了同情。霍英东闻讯，一惊。他想，如果不坚持“不能挂国旗、奏国歌”这一条，那岂不是又在制造两个中国吗？于是，霍英东在会上建议：台湾不使用过去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歌，可仿效奥委会的做怯另制一旗、另选一歌。经过协商，欧洲朋友也同意他的意见。最后，由国际足联的负责人与台湾代表讲清楚。这事终获解决。

中国恢复在国际羽毛球协会的会籍，困难重重、波折横生。羽毛球在各球类项目中，是较为国际化的一种。在世界各地比乒乓球更普及，尤其在东南亚和北欧影响也更大。东南亚各国羽毛球实力很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当时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不甚友好，解决问题有一定的难度。开始比较顺利：经无数次会议反复讨论，国际羽毛球协会终于通过了“以中国代替台湾”的提案，后来台湾不服，告到英国法院。中国外交部向英国表示，不得制造“两个中国”。英国政府推说：“司法独立”。英国法院判决台湾“胜诉”；换言之，国际羽毛球协会通过的提案无效。霍英东好不烦恼！当时除乒乓球外，中国的羽毛球最强。如果不能参加国际比赛，十分可惜。

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霍英东四处游说：由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筹备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羽毛球组织。然而，谈何容易？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支持；东南亚国家表面上是支持的，但内心很复杂。霍英东首先争取强队，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的支持。新的国际组织即将成立，由谁来担任会长呢？

从客观上来看，中国或香港都不适宜。

霍英东只好亲自飞往曼谷，恳请泰国的一位副总理出任新的国际羽毛球组织的会长。新的国际组织终于成立了！

新的国际羽毛球组织的成立，对原有组织势必形成压力。更为至关紧要的是，因为同一项目有两个国际组织，羽毛球就不能列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不久，旧的组织终于接纳了新的组织。两个组织在 1980 年至 1981 年间合并。这以后，还经历了一些反复。“真是一言难尽”！

1982 年，羽毛球被重新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随后，霍英东当选为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的名誉会长。

古语有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霍英东没有想到，在中国加入国际蓝联的问题上，台湾人演出了一幕：“请君入瓮”。本来，国际蓝联已经通过了“以中国代替台湾”的提案。台湾仿效霍英东在国际羽联的做法，策动一些亚洲国家要另搞一个国际组织，以南朝鲜人为会长。霍英东不得不亲往汉城，提出是否成立这个组织，应通过投票解决。南朝鲜建议采用通讯投票的方式，霍英东担心有人借口没有收到票，而制造麻烦。于是他亲自出马，先后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一一

把票收齐，直接送往南朝鲜。从而，否决了台湾人策划的这一组织。
难得霍英东先生如此精心、如此热心、如此苦心！

第二十六章 赞助体育 尽全力振兴国运

当新华分社社长周南和霍英东博士将那十八块沉甸甸的一公斤重金牌，一一挂在运动员的颈上时，健儿们都不期然地从口中“哗”了出来，回到座位便把它除下。可见这块金牌的“十足斤两”……连同奖金，每个金牌健儿获得数额应超过四十万。

1984年7月，霍英东飞渡重洋。在美国洛杉矶，他参加了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亲眼看到中华体育健儿一举打破“零”夺得15面金牌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他高兴地为之击掌欢呼！

他对记者说：“杨振宁教授同我说过，中国在奥运会上破‘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之后第四件轰动世界的大事！”

作为中国通向奥林匹克之路的奠基、铺石者之一的霍英东，更是由衷地感到快乐和欣慰！

霍英东在接见记者时说：“很多人说我偏心。偏什么？偏爱体育。他们说，我在体育方面最舍得捐钱，对于其它方面就不那么全力支持。我怎么说好呢？我的财力有限，国家这么大，要办的事这么多，我只能有选择、有偏重地出一点力。”

唉，应了一句俗话：大有大的难处，富有富的苦衷！毕竟霍英东不是“广发慈悲”、“普渡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啊！

勿需讳言，他“偏爱体育”。

这是1984年的10月2日晚上，在国家体委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

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透过玉石堆砌般的有机玻璃饰条，洒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里。欢声、笑语，浑然一片。

霍英东在这里见到了我国在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射击、举重、跳水、击剑、体操和女排等项目金牌的运动员们。

他与他们大都是熟识的“忘年交”了！

他曾专程远渡重洋，亲临加利福尼亚为他们助威、呐喊、鼓劲！

他曾和他们一起仰看国旗，挺直脊梁仁立，聆听国歌，扬眉吐气……

他曾参加了为他们祝捷的酒会，在欢喜若狂的人群中，频频举杯。

……

正如一篇文稿中所写的，“在洛杉矶，霍英东度过了平生以来最不平静、最亢奋、最幸福的时刻。他在商业界闯荡几十年，还从未有过这种激动不已的体会。为自己吗？完全不是。为那一次次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为那一回回凌空高奏的《义勇军进行曲》，为那些衣着中国运动服的体育健儿——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

此刻，他的眼前一忽儿闪现的是国庆阅兵的分列式方队，一忽儿闪现的是游行队伍中“金牌”运动员的彩车；一会儿是中国制的火箭腾飞的镜头，一会儿是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预选赛中以3比0击败科威特队时万众欢腾的场面；一瞬间又回到40年前在香港铜锣湾被人辱骂为“东亚病夫”的情景，一瞬间又回到几年前台湾运动员纪政夺得奥运会铜牌的心境……啊啊，百感交集，他的心里翻腾着多少话语！

“这一届奥运会夺得了15块金牌，下一届呢？再下一届呢？能够保得

住吗？能够更上一层楼吗？

“我们这样 10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金牌还应该多一些。

“多一块金牌，就多一分民族精神；少一块金牌，就少一分国家威望！

“在和平时期，体育运动是最能够显示国力的了……

“到下一届还有 4 年！从今天算起只剩下 1400 多天了，过 1 分钟，就逼近了 60 秒！

“下一届奥运会，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参加。举重和射击这些项目的竞争会更强、更激烈！

“游泳怎么办？田径呢？如何急起直追；再来一次零的突破？

“足球一定要进军汉城！

“还有体操、跳水……”

他运筹帷幄，如数家珍。

这些话，霍英东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过，与李梦华、荣高棠、徐寅生谈过，与袁伟民、郎平、李宁、朱建华、曾雪磷谈过，还有杨伯镛、许海峰、陈肖霞、赵达裕……长长的一串我国运动员、教练员的名单！

他的心潮翻滚！

他的情思飞扬！他想得很多、很多……

他看得很远、很远……

但是，当他在招待会上站起身来，面对着倏地安静下来的人群时，却突然不知道该讲什么才好了。脑门子上似乎是一片空白。他的普通话本来就说得不算流利，而此刻就更近于结结巴巴了：

“我……我想……拿出 1 亿港元，给国家……”

稍许停顿了一会儿，他才较流畅他说完了要说的话：“我已是 60 多岁的人了，并不希里把钱都留给子孙，只想在去见者祖宗之前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

“这 1 亿港元，就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吧！”

一石击水，千层涟漪！

顿时，掌声如雷、如鼓、如潮……

1984 年 10 月 2 日，新华通讯社编发了这样一则电稿：

霍英东先生捐款 1 亿港元

发展祖国体育事业

……

一夜之间，这条新闻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传遍了北京，传到了香港，传向了整个中国和世界！

啊，霍英东的中国心！

1992 年 11 月 13 日。

中山温泉。

碧云天，黄花地。

霍英东博士应邀参加了群贤毕至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主席台上并排坐着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及袁伟民等一批中国体育界的知名人士。

如逢知音。

一向不善言辞的霍英东博士，用不甚流畅的国语侃侃而谈。信马由缰，文本无题。一位记者在整理笔记时，赫然冠以“解放思想，换换脑筋，在改

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颇有几分一板正经的红头文件的格式。

霍英东博士说：

“这次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广东、在中山温泉举行，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应邀列席这个会议，感到高兴。”

“我跟大家一样，是非常爱好和关心体育的。”

“体育，对于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刚才伍绍祖主任谈到了当年的‘乒乓外交’，那是一例。我还记得一件事，邓小平先生在1977年恢复工作的时候，他和首都人民并透过电视和全国人民见面，就是在北京的一个体育场。那是1977年的7月，当时我率领香港的一个足球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足球邀请赛；我亲身目睹了那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的场面。”

霍英东博士侃侃而谈：

“要看到，体育运动已经不单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方面产生影响，在政治生活方面必然发生波及。”

“我们知道，最近第25届奥运会在巴塞罗那举行；参加的人数、国家和地区是历来最多的一届。很多政治纠纷以及历史遗留的问题，譬如以色列问题、南非问题，也包括南北朝鲜、东西德国问题，当然还有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问题，在体育交往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这次我们在巴塞罗那得到16枚金牌，全国人民、港澳台海外同胞都非常鼓舞。这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

“记得是在一次世青足球赛上，非洲的喀麦隆打入了决赛圈；并没有得到冠军，四分之一决赛时输给了德国。但是回到非洲，足球队受到了‘民族英雄’似地欢迎；来的人非常之多，最后把机场都站满了，飞机也没法降落下来。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是不能预计和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个人十分看重我们中国在巴塞罗那获得的16枚金牌。了不起啊！”

听至此，笔者想起了1992年10月6日权威的新华通讯社发自香港的一条快讯：

中国第25届奥运会获奖运动员代表团，今天结束了在香港为期一周的访问返往内地。

香港工商、体育界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9月30日在沙宣道33号自家花园宴请奥运健儿，并向他们颁赠了金牌及奖金共1,300万港元。这样，每个金牌得主可获一枚一公斤重的金牌和四万美元奖金；银牌获得者获一枚250克重的金牌和一万五千美元奖金；铜牌得主获一枚100克重的金牌和四千美元奖金。另外多名香港和台湾人士，也向奥运健儿们赠送了金牌和奖金。

.....

据文汇报记者现场报导：“当新华分社社长周南和霍英东博士将那十八块沉甸甸的一公斤重金牌，一一挂在运动员的颈上时，健儿们都不期然地从口中‘哗’了出来，回到座位便把它除下。可见这块金牌的‘十足斤两’.....连同奖金，每个金牌健儿获得数额应超过四十万。”

“竞步女将陈跃玲表示，她取得这笔奖金之后，会在明年到美国读书”；

“跳水好手谭良德表示，还未有想到如何使用这笔钱”；

“女神枪手张山认为，这是人生难得的纪念品，故她不会将它卖掉”；

“熊倪则会在他的家乡实间房子保值，其后事情不知”.....

一时间全国轰动，舆论大哗。“一公斤重一枚的金牌和四万美元奖金—

—总额超过四十万”，对于大多数的大陆中国人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的财富！

霍英东先生闻讯，在会上如是作答：

“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关于奖金和金牌的问题。我们说，每一件事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是我们要朝好的方向去。我们给运动员发奖金，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我担心下一届中国奥运会的成绩不好了、下降了，就有人说是你这个奖金给得太多了，起了负作用。所以我们的奖金这次结得还不是很多，只能一步一步来。”

“从开放改革的角度来说、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来说、从全世界运动员普遍的收入来说，我们给运动员的奖金还没有什么出格。我们现在的运动员，好多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我看他们每一个人练得都非常艰苦，他们的整个青春，都献给了国家。更要看到，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得到奥运金牌、奥运奖牌的；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或百万分之一，其比率非常、非常地小。我希望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入体育运动。也希望他们能象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运动员一样，可以得到那样高的奖金。”

“我们不是强调一切都向钱看。但应该看到全世界 50 多亿人。在这个项目上就他得第一。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一块金牌打动了多少亿中国人民的心啊！真的得到一块奥运会金牌、全国人民每人给一元给他，那就有 10 多亿元了。所以我看这个奖金，从总的方面来看，还是对的、适度的；起码使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到体育运动中来。这不但是为国争光，对有些年轻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中国的人多，如果每个年轻人都投入体育运动，那个作用不可估量！”

霍英东先生进而引伸道：

“我们非常需要多得一些奥运会的金牌。要在国际运动会争取更好的成绩，为我们中华民族作出贡献。我们不但要冲出亚洲，还要面向世界。这是我们的愿望。再过四年，在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可不可以再得 16 块金牌？我认为，这里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知道，在巴塞罗那整个亚洲的成绩都不很好。中国得 16 块金牌；南朝鲜有 12 块；日本的 3 块金牌中只有一块游泳是有影响力的，另外 2 块的项目都不重要；第四个国家是印尼，得 2 块羽毛球金牌，这 2 块金牌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但我们丢了。别的亚洲国家，一块奥运金牌都得不到。印度 8 亿人口，别说一块金牌甚至一块铜牌都得不到，很不光彩！”

“以往亚洲人得的金牌，总是跳水、体操、射箭、乒乓球、羽毛球呀什么的，都是比较娇小玲珑型的。真正要跟别人拼体力的，我们的强项就不多。这次我们能得 4 块游泳金牌，真是不简单。1984 年在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游泳连前 16 名都进不到；现在一下子得了四个第一，而且有三项破世界记录，还有几项破奥运会记录。我个人非常感动。在田径方面，我们也有进步，得了一块金牌；这对于亚洲来说，也是很突出的。另一块田径奥运金牌，是南朝鲜的马拉松。别的亚洲国家，象中东的国家和印度则根本不值得一提。”

霍英东博士没有讲稿，思路却非常清晰。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有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我们亚洲人的体力上有问题呢？从这次巴塞罗那运动会上可以看到，真正拼体力的项目，都是欧洲、美国人强一些，成绩

比亚洲人好。特别是足球方面，亚洲最强的跟欧洲最弱的队，我们也不一定能打过他。其实从地理环境方面来看，中国北方的气候跟欧洲差不多，运动员的个子也高大、有力量。关键是如何选材、如何训练、如何出成绩？庄泳到香港来时，我跟她握手；发现她的手比我的大得多。这说明，选材的重要性。要当世界冠军、要破世界记录，不单是刻苦锻炼就可以的，还要根据不同的项目，选取不同身体条件的运动员。”

“还要说一点，我知道国内有的省、市对于争取奥运会夺金牌并不太热心。甚至有人说，那是国家体委的事情。各省、市还是希望在全运会得到比较好的成绩。我看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好好讨论。我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扯皮，要同心协力、一致对外！”

正如南朝来人鲍照在《代朗同行》中所写道：

千金何足重，
所存意气间。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奥林匹克金牌在一定意义上是无价的！

第二十七章 穿针引线 为申办奥运出力

身兼中国奥申办顾问的霍英东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出一百万美元，支持国际奥委会建立奥运博物馆。因此，中国奥委会的会徽被刻在奥运博物馆中央的云石墙上，永留青史。

跨世纪的、盛大的二〇〇〇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择址何处？
世人瞩目。

正式申办的国家及城市的名字，宛如五座星辰光耀天宇：

中国 北京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英国 曼彻斯特

澳大利亚 悉尼

德国 柏林

风格别具的宣传攻势；

匠心独有的人文攻势；

焦点各异的心理攻势；

奇招不一的环境攻势……

每一个城市都似乎信心十足；每一个城市都似乎义无反顾；每一个城市都似乎志在必得。

这是为什么呢？

霍英东博士一言中的：

“最近一时期，特别是近十年来，体育运动的比赛通过卫星转播到全世界，使得体育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联。过去办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非常困难。但是有了卫星电视转播以后，就大不相同了。”

“从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举办大型国际运动会。很多时候都可以一方面扩大主办国的政治影响；一方面又可以不赔钱，甚或赚到钱，所以我们中国在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时，竞争非常激烈。”

何等准确！何等实际！何等精辟！

霍英东先生全力以赴，支持中国北京申办二〇〇〇年奥林匹克运动会。1993年7月2日，香港《文汇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新闻彩图“国际奥运博物馆揭幕巡礼——北京申办中国二〇〇〇年奥运的最新努力”。

记者是这样描述的。

瑞士，洛桑。

国际奥委会第一百次全体会议在此间召开；

为庆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九十九周年的新奥林匹克博物馆在此间揭幕。

在这里，记者遇到了当今中国体育界的风云人物，何振梁、张百发、魏纪中；他们既是来庆贺这一国际现代奥运史上的盛事，亦是来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传媒，再一次宣传中国人民申办2000年奥运的热切期许。

在这里，记者会晤了中国政协副主席、国际体育界知名人士霍英东及其公子、同样是体育界名人的霍震霆；作为炎黄子孙，他们到洛桑的目的与何振梁、张百发等人相同。身兼中国奥申办顾问的霍英东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

捐出一百万美元，支持国际奥委会建立奥运博物馆。因此，中国奥委会的会徽被刻在奥运博物馆中央的云石墙上，永留青史。霍英东强调：“开放的 中国盼奥运”，如能成功主办奥运，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进一步。

在这里，记者邂逅了来自台北的体坛元老徐亨，盼望北京申办成功，当然也是台湾同胞的心愿。

在这里，记者聆听了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艾哈迈德亲王的庄严宣布：整个亚洲都支持北京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还有国际奥委会的首脑人物萨马兰奇以及他的同事们的仗义执言，反对美国一小撮人将政治牵涉入体育，阻挠中国人民为奥运作出贡献的企图。

距离 1993 年 9 月 23 日在蒙特卡罗举行的二〇〇〇年奥运主办地投票选举，还有不足 90 日——瑞士，洛桑。留下了霍英东以及全体中国人为争取申办奥运最新努力的身影。

6 月 28 日，霍英东先生一行飞返北京。在驶出首都机场的大道旁，两行醒目的大字跃入眼帘。

“给中国一个机会”；

“还世界一个奇迹”。

在霍英东先生交给我的一叠剪报资料中，笔者读到两则关于中国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旧闻。我了解到：1993 年 1 月，北京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的报告书；此举至少已经圆了中国体育先驱们八十余年前及四十年前的两个“梦”——祈盼有朝一日，申请在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早在本世纪初，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就以其特有的魅力，引起还在“运动启蒙”时期中国人的注视。1906 年，在希腊雅典举办的奥运圣火刚刚熄灭，中国就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奥运热”。首先，《世界》杂志刊登了印制精美的巨幅照片，并附文介绍此届大会的盛况和奥运会的历史。其后，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 1907 年天津学界运动会发奖仪式上，以奥林匹克运动为题，发表了著名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奥运战略”——建议在中国筹建一支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制订计划并聘名师指导，加强训练，准备赴会参赛……这股“热”，一直持续到 1908 年伦敦奥运会举办前后。天津一份报纸上刊出一篇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再次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与发展；该文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仅应积极培养奥运选手，还要争取这一盛会在 中国举行。

这个建议得到热烈的反响。

天津体育界人士在全市运动会上，用幻灯展示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并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奥林匹克专题演讲会。大会组织者提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何时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邀请世界各国的选手到北京来？

此外，申办奥运的念头，在旧中国也曾动过一次。

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因为受到即将到来的胜利的鼓舞，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 1945 年 6 月 1 日在重庆召开第二届理监事会议，商讨今后五年的计划。会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奥委会委员王正廷、著名体育家袁敦礼、董守义等，提出“请求第 15 届世界运动大会（1952 年）在我国举行”的议案；获与会人员一致通过。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披露于报端，引起国人一时的兴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美好的愿望有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

而不可及。决议最终不过成为一纸空文而已。

中国通向奥林匹克之路几经周折、几经磨难，几经坎坷，其间，霍英东先生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却又默默无闻、功绩卓著却又鲜为人知、处境微妙却又锲而不舍的穿针引线人。在中山召开“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霍英东博士言之所及、透露了这许多年来的万千苦衷于一、二：

“……又譬如，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一些革项运动组织的合法席位问题。早在 1971 年，我国就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在体育方面我们直到 1979 年、1980 年才回到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中来。真正解决问题，是从 1980 年才开始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霍英东先生谈到，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际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国际惯例”的问题，他忆及当年的情况说：

“在这以前，我们连一封信都不愿意写，坚持只有先把台湾赶出来，我们才正式申请。这就不符合国际惯例。我们一直坚持台湾不能叫‘台湾’，而叫它‘蒋帮’。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可以允许台湾存在，同意它用‘中华台北’这个名称。这样就得到全世界体坛的谅解。因为要驱‘蒋’，要把台湾赶出去，国际上有很多人对于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台湾也有两千多万人口，同时它一直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很多世界单项运动组织，他也有份。”

“我们改变了态度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如此以来，中国恢复了在世界体坛的合法席位。中国的体育事业也得以很快发展。1979 年中国女排开始赢日本，并保持了‘五连冠’；1982 年我们在新德里亚洲运动会，总分第一次超过日本，结束了日本长期称霸亚洲体坛的历史；1984 年我们开始在奥运会得到第一块金牌……那一年正是建国 35 周年国庆，邓小平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大阅兵！”

霍英东先生充满了坦诚的赤子之情，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我真正的感到了我们民族的崛起和我们祖国的强大！”

如果进行倒计时的话，霍英东博士的这一番讲话，距离蒙特卡洛的最后投票日——1993 年 9 月 24 日，还有 315 天。这是他在这次长篇发言中的最后，显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话题。他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申办二〇〇〇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每个人，都要非常支持这个目标。14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申办奥运会如果能够成功，将对我们的整个事业产生巨大的动力！”

“我本人跟萨马兰奇主席谈过一次，希望他支持中国办奥运会、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萨马兰奇主席多次来中国参加我们的运动会。1983 年上海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时，他就来过。那时因为我们刚‘开放’，接待及组织方面还有不少问题。譬如，宾馆一到晚上十二点空调就关了；要喝咖啡也找不到地方；每天都是大家坐在一起，四菜一汤；后来因为下雨的原因，开幕式也取消了；要走，又没有办法买到飞机票……客人很不满意。当时，我也无能为力、帮不上忙。以后，1987 年到广州开全运全，萨马兰奇的印象一下子改变了。他感到仅仅四年，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天河体育中心奇迹般地建了起来，还有令人惊叹不已的白天鹅宾馆……记得当时萨马兰奇对我说：1964 年在日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接着日本经济起飞了；1988 年在

汉城举办奥运会，韩国的经济也起飞了：因此，从道理上来说，也应该支持中国——这个在亚洲第三个经济起飞的亚洲国家——举办奥运会。”

霍英东博士最后指出：

“现在举办大型体育活动，好多时候是不需赔钱的；特别举办奥运会、还有世界杯足球赛都是赚钱的。又有‘名’又有‘利’，所以争办的国家特别多。我们的机会相对就减少了一些。但我们要很努力。因为，它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话，一点也不说满；丝毫不偏激。这就是霍英东先生一贯的准则。总之，留有余地。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的语气始终是平和的，他的论点始终是有根有据的。话不高声，娓娓道来。

“1990年在北京举行亚洲运动会，我感到虽然是‘六四’以后，但亚运会使北京人从精神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都改变了许多。所以，我非常希望、而且衷心地祝愿我们中国申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能够成功。邓小平先生说他也要参加这个跨世纪的、盛大的运动会。总之，申办成功需要国家政府、体委、全国人民大家共同努力。如果能够办到，这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香港有一家报纸说“霍英东言必称‘改革开放’”，这是没有错的！

历史，将永远记得这一个难忘的瞬间。

蒙特卡洛时间：1993年9月23日晚上八时二十六分（即北京时间：1993年9月24日凌晨二时二十六分）。

路易斯二世体育馆里，数千名忐忑不安的与会者的眼睛注视着他——数以百计的摄像机、照像机的长短不一的镜头瞄准着他——

由卫星传送的电视屏幕前，五个申办国以及全世界的无数亿人的迫不及待的目光捕捉着他——

他——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

他平静得就象一潭清冽的水。他登上讲台，他毫无表情地缓缓打开信封。他简单得近乎无情地宣布：“有幸举办二〇〇〇年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是——悉尼。”

这时，悉尼代表团及其支持者狂跳起来、相互拥抱；其它代表团的有关人等惊呆了：有人镇静下来向胜利者表示祝贺，有人沉默地退场而去……

整个世界在这一瞬间定格：

北京代表团团长陈希同不失风度地说：“奥林匹克的精神是贵在参加。我们将继续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泪花似乎在镜片后闪动，李其炎的脸上却一点儿也没有失态：“祝贺悉尼当选。感谢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继续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而努力。”

张百发微笑着，依然是一口京腔：“奥林匹克运动是长远的、发展的，我们这次未获得举办权，将来总有机会。”

……

霍英东呢？

霍英东不无有意地向旁侧了半步，避开了逼人的电视镜头。在那一刹那间，人们在他的眸子中读到了坚毅、执着和“败而不夺其志”的气概，他经历了太多的挫折、磨难和坎坷，眼下这一切实在算不了什么！就从这一刹那

间开始，新的申办奥运之路又在他的脚下铺开，他一定要、也一定能走到胜利的终端！

在现场，霍英东一言不发。事后，却有一位外国记者录下了他的一段讲话：“很不幸，中国一直试图在申办上不加入政治。中国试图伸出友谊之手，但他们被描绘成另一种样子……我感到这里有一股围攻的气氛。”不知道，这是霍英东先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的？

霍英东先生引以为至交的好朋友萨马兰奇在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萨马兰奇说：“我非常高兴悉尼获得二〇〇〇年奥运会举办权。国际奥委会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澳大利亚是第三次申请，北京只是一次。早几年、晚几年对北京来说，问题不是太大。我希望，不久北京将再次申办奥运会，但我不会强调北京申办。我要说中国的申办，是对奥林匹克运动有意义的。因为，中国是对奥林匹克运动有着重大意义的国家！”

正如同一位新华社记者，在1993年9月23日，目睹了一场“巨人间的竞争”后，写的一篇，“北京申奥回顾”所引用的标题：

竞争告一段落，
道路也许漫长。

霍英东以及所有热情参与奥林匹克事业的中国人，对此确实感到遗憾。许多人甚至很伤心。但是没有人会感到后悔。因为参与是重要的。参与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啊，霍英东的“奥林匹克梦”！

啊，中国的“奥林匹克梦”！

第二十八章 慷慨解囊 支持发展科教文

霍英东曾放出豪言：“将出资 10 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10 亿元，即是按当时全国人口的总数，给每个人捐赠 1 港元。他的设想是：“估计每年可从 10 亿元的投资利润及利息中，得到 1 亿港元，为发展祖国的科技、医药卫生、旅游、体育和教育事业，办一点实事。”

霍英东毕生的座右铭是：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

1982 年的秋天，昆明池浅、香山叶红。在首都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霍英东曾放出豪言，“将出资 10 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

10 亿元！

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简言之，即是按当时全国人口的总数，给每人捐赠 1 港元。

这笔钱，用来做什么呢？

霍英东的设想是：

“估计每年可从 10 亿元的投资利润及利息中，得到 1 亿港元。为发展祖国的科技、医药卫生、旅游、体育和教育事业，办一点利国、利民、利港、利乡的实事。”

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1984 年 10 月 2 日。在国庆招待会上，他宣布捐赠 1 亿港元，成立了国家体育事业的基金会。

他当然不仅只“偏爱”体育。

霍英东是一位堪称有眼光、有见地的慷慨的爱国亿万富翁。他常说，“一个体育，是为了健民强身；一个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这两‘育’，是国家 and 民族自立于世界的两条‘腿’！”

说得真好啊！

1986 年 4 月 2 日的下午，柳丝渐长，紫燕绕飞。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会见了霍英东。

他们早已相识，老朋友式地握了握手，没有更多的寒暄，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霍英东欠了欠身，趋前说道：

“为了振兴中华、培育人才，我决定提供 1 亿港元建立教育基金，以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

李鹏笑了。他说：

“我代表国务院和国家教育委员会，感谢霍先生的这一爱国行动。霍先生许多年来，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做了许多的工作。特别是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翌日，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霍英东又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当你决定以 1 亿港元支援国家教育事业的时候，你是如何考虑的呢？”记者们在发问。

霍英东爽朗地笑着说，“欧美、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发展教育事业是百年大计。中共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国家发展的战

略重点之一，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早年，知名的爱国人士陈嘉庚在厦门积极办学，培养乡梓的子弟，我就十分仰慕。但是，当时自己没有条件那样做。现在我的经济状况好一些了，理应为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根据你的想法，这 1 亿港元的教育基金应该怎样使用呢？”记者又问。

霍英东毫不迟疑他说，应该把它用在发展教育事业最急需的地方：

“首先是用于装备和发展师范院校。目前，我们国家的文盲还很多，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当务之急。而解决中、小学师资短缺和水平不高的问题，又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关键。这笔钱，应该为‘师范’作一点事情。譬如为师范院校建图书馆、发展师范院校的重点学科等。

“关于另一部分教育基金，我则主张用作出国留学生的奖学金。去年 4 月，我已提供了 100 万美元，在全国重点大学选派 30 名高才生出国留学两年。将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派到国外学习，让他们有机会接触世界先进的科技技术，开阔视野，很有必要。当然，更多的、更重要的还是要立足在国内培养

仅仅只过去了 8 个月。

作为霍英东上述这番谈话的延续和印证，是 1986 年 12 月 18 日，一则发自广州的新华社电讯。

“由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担任理事长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与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今天在中山市中山温泉宾馆开幕。”

他说到了、做到了，也得到了结果。

霍英东是一个“全方位”的实业家。他的兴趣和爱好，是多方面的。

仅以 1984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为例，他旋风似的南、北奔走。其活动的范围，涉及到从“红线女演唱会”到“象棋大赛悬赏”等若干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难得他的一片热心、一腔热忱、一番热情。

霍英东堪称为一个奇人。

看一看他的日程表吧！

10 月 1 日，参加国庆盛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10 月 2 日，在国家体委的招待会上，捐赠一亿港元；

10 月 3 日，他参加了全国“政协”的座谈会，与海内外的各界精英、有识之士欢聚一堂，畅谈感慨，“好像 60 年前躺在自己母亲的怀抱里一样，那样温暖、那样安全……”

4 日，他返回香港，在接见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记者时，他说：“中国领导人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邓小平对于改革的分析，就十分透彻。没有过去的变革，哪来香港今日的繁荣？所以，只要今后的变革符合港人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安定，我们都应该给予欢迎和全力的支持。”

他又赴广州；6 日，在暨南大学捐款 100 万美元；

14 日，他赶去番禺，出席了大石桥的通车剪彩仪式，同时为家乡的另一座洛溪大桥奠基；他兴致勃勃、风采鹰扬，与在场的省、市、县府领导人，大谈其“修桥经”……

10月15日，在一次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后，他未及晚餐，又莅临广州中山纪念堂；那里，正在举行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独唱会。

“红线女”，是邝健康的艺名。当年她“红”满香江的时候，霍英东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打工仔。以后，红线女回到祖国；霍英东一跃而为豪富。虽相互知名，却往来不多。

幕前，霍英东读到了红线女的“义买启事”。这位粤剧名伶情真意切地写道：

“本人的‘独唱会’专辑，为友人赞助印成。现将专辑出售。所得款项，一送民办幼儿园，二送少年文化宫，三作红线女培养新苗基金。专辑最低售价5元一本……”

言简意赅，娓娓动人。

是时，帷幕徐启。红线女身穿一套束腰的素白衣襟，襟头戴一朵大红的花饰，款款移步来到台前。

其声，果然绕梁不绝；其情，果然牵魂不已……台前台后，浓情胜酒。

演罢去到侧厅，霍英东即席以10万港元买了一本《红线女独唱会专辑》。

哇，在场的无不哗然！

10万港元一本小册子，值吗？

不值吗？不，值得！——

因为“民办幼儿园”，因为“少年文化宫”，因为“培养新苗基金”……更是因为红线女最后的一首新曲：《盛世讴歌唱不完》！

好一个“盛世讴歌唱不完”！

欣逢盛世，谁人不衷情讴歌？！霍英东在心头唤起强烈的感情共鸣……

在这好似旋风般运动的一个月里，最后的一条新闻，发自香港：

10月31日，霍英东公开悬赏50万美元（近400万元港币），给在5年内有胡荣华（上海选手，多次全国象棋冠军——笔者注）参加的中国象棋大赛中，夺取冠军的非华人“国际象棋大师”。

这既不是“儿戏”，也不是亿万富翁的“心血来潮”。

众所周知，除了足球、网球、高尔夫球外，霍英东还是一个痴迷的中国象棋的爱好者。他也曾潜心研究《梅花谱》、《桔中秘》等象棋古谱，彻夜不倦……他常对人说，“中国象棋最富科学性、竞赛性，应该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成为一项国际性的智力体育项目。”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一句中国成语，相信外国人也是能够理解和施行的。霍英东悬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大力“推动中国象棋的国际化”！

在这一点上，霍英东可以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国粹派”。

第二十九章 轶闻趣事 更显富豪真性情

他的大媳妇是芳名鼎鼎的“香港小姐”朱玲玲。婚礼之排场、隆重、盛大，轰动一时。

他笑谑自己，生平有三怕：怕老婆、怕演讲、怕写文章。

霍英东的长媳（即：霍震霆之妻）是芳名鼎鼎的“香港小姐”朱玲玲。朱玲玲是 70 年代末当选为港姐的。第二年即嫁给霍家大公子。婚礼之排场、隆重、盛大，成为仅次于以后英皇太子查理斯与戴安娜公主婚配的一大事件，——最低限度在 600 万人口的香港是这样。

“香港小姐”竞选一年一度，算来迄今已有 20 多年历史了。而每一届的选美，都给市民们留下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话题。

其中，尤以朱玲玲小姐给人们的印象经久不衰。以至一些轶闻，都带有了传奇的色彩。试录二则“问答”（由香港“无线电视”的评判们出题，候选的佳丽作答）：

“假如让你生出第三只眼睛，你认为生在什么地方最好！”

一般的人会说生在“额中”，或是生在“脑后”……当选港姐的回答是：“我要让它生在手心；前后左右、上下内外，随心所欲，都能看到！”妙极。

“假如让你嫁给一位外国的历史名人，你选择谁？为什么？”

一般人的回答无外乎莎士比亚、诺贝尔、柴可夫斯基之类……当选港姐一开口即令满座哗然：

“我选择希特勒（！）。我要用我的爱情和影响阻止他发动令数千万人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精彩程度，足以收录入“世界大全”！

后来，有许多位香港人士告诉笔者，以上纯粹是那些对“港姐竞选”持有不同意见者的杜撰和捏造。而朱玲玲当时回答的问题，乃是别的一些……笔者以为，这似乎无关紧要。

在婚宴中，没有听说朱玲玲小姐有什么宏论。倒是霍震霆回答了来宾提出的两问题。

请问，你送给朱玲玲小姐的结婚礼物是什么？

“我要养她一世！”

这个回答，使人想起汉时“金屋藏娇”的典故。

又问，你们打算生几个孩子？

“一只小型足球队，刚好 7 个！”

霍震霆放此豪言，可见其伉俪情真意笃、相恋之深。

我们知道，霍震霆出生在动乱的“日治”年代。襁褓之中，父亲即遭浪迹香江的厄运。他直到七岁前，还没有过过一天温饱的日子。做梦都不敢想有今天的“艳福”！

再看一看婚礼上的一些开销数字：

霍英东给朱家的聘金是港币 1000 万元；新娘子的一袭自罗马订制、空运而来的婚纱约港币 25000 元，另各类钻石、金饰等价值未详；

婚宴筵开 326 席，每席菜价 2000 多元，洋酒 450 多元 1 支，以每围 1 支计算，连麻雀汽水小帐，一晚宴会共约港币约 100 万元，宾主共约 39000

余人，平均消费每人在 250 元以上。

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对比以下的几个数字：

霍英东进皇仁书院就学，每月学费 5 元（要命的 5 元学费啊），差点没让全家人勒紧裤带；

霍英东在启德机场当苦力，一天搏命只换得 7 毫半港币和约 4 两米；

霍英东远走柏拉达斯群岛，为蝇头小利不惜半年“流放”……

此一时，彼一时。正如同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所唱到的：

知否世事常变，
变幻原是永恒。

就像几乎所有白手兴家的百万富翁一样，霍英东有其节俭、勤勉的一面，也有其洒脱，挥霍的一面。这一点，又何必讳言呢？！

赫赫有名的建筑大师余峻南，自言在与霍英东先生的交游中，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为商经营之道。

试举一二。

譬如，霍先生说：“一个人为商的成功，不是取于社会，而是给予社会……”

又说：“有本事的香港人，赚外国人的钱，不在同胞的钱袋上打主意！”

还有：“拿钱做生意不是高明，要利用别人的钱（譬如借银行的）。利息不要紧，赚的钱多过利息！”

一次，谈到开办酒店的事，霍英东从未做过这一“行”。很多人都劝他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过于“冒险”。霍英东的弟弟对余峻南说了一番话：

“霍先生喜欢踢足球，他把什么事儿都当作打‘波’（球）。上场就有两种可能，他准备输，而不准备赢。办酒店一开始就有赔的思想准备，只要对社会有好处。第一要“输”得起；第二要弄清“输”在什么地方；第三要减少“输”的因素……到了没有输的时候，就赢了！”没想到，从打足球中，也能悟出这一番精辟的为商之道来。

又有一次，余峻南在座，听经办人向霍英东先生报告购买电梯的事儿。经过讨价还价，对方已经作了相当大的让步……霍英东听罢，问了一句：

“你懂打网球吗？”

那人摇了摇头，颇觉茫然。

“世界网球冠军的球拍是制造商送上门的，不但不用花钱，而且制造商还要送上成百上千万的美元给他。为什么？这是广告费。用了你的球拍，就是为你作了广告……‘白天鹅’是中国开放以后建的第一家酒店，用了它的电梯就是给它作了广告。它知道不知道，整个中国的市场有多大？我们不收它的广告费也罢了，还能要这么贵么？你们再去谈谈，还要再压一些价下来……”

余峻南不无敬佩地对人们说：

“这就是霍英东！真了不起！”

有一次“白天鹅”便宴，霍英东先生兴致颇高。几位熟悉的朋友在一起，无分尊卑、老幼，渐而无话不谈。

有人问：考学位自然要写论文。但是，获取“荣誉学位”是否也要写论文呢？霍英东的答案是：“一样要写！”

他笑谑自己，生平有三“怕”。

众人洗耳恭听。

霍英东煞有介事，表情真诚地对席上嘉宾娓娓道出：“第一怕，怕老婆；第二怕，怕演讲；第三怕，怕写文章。”

“三怕”甫出口，众人哄堂大笑。

霍英东奉命写论文，认为是难关。其实，以他的丰富人生经验，应付当是绰绰有余。他自谦不够水平。幸而，他的儿女都已取得学位。于是他向儿女们求教。

他问道：“你们写一篇论文，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

霍家公子齐声答道：“起码要半年啦！”

殊不知，霍英东自爆内幕：他的论文只花了几天时间而已。实际上，他的论题内容只是他在大陆投资经历的写真而已。既是实践真知，又能坦诚真挚；毫不保留地剖析公开自己的想法和经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篇文章。众人认为他的“爆肚”演讲更为精彩，乃自我写真是也。

霍英东先生意犹未尽。

他忆及儿女小时候，望子成龙之下，专门聘请游泳名将教他们学游泳。两年光阴过去了，孩子们依然“浮”不起来。霍英东一时性起，把那教练“炒”了鱿鱼。然后自任教练。结果不到一个月，小家伙全都学会了游泳。

其诀窍何在？

霍英东不无自得地说：“很简单啦，我将子女统统投入水里，逼着他们去学‘浮’，结果学会了！”他再补充道：“其实每个人都有‘水性’的潜力，看看你自己是否够胆而已。”

精彩！

继而，霍英东先生以游泳来比喻白天鹅宾馆的兴建过程，他说：“道理是同出一辙的，一定要够胆；改革开放也是这个道理，一定要坚决、彻底和够胆。不能畏首畏尾，否则会溺死的！”

幽默、真挚，更兼坦率；博得席间众人一片掌声。有人谈到，白天鹅宾馆开业后，在霍英东的坚持下，成为大陆第一家对国内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记得几年前，那时曾有人埋怨“宾馆开放的第一天，厕所板被踏烂，水喉命运亦如此，厕所的手纸丢了成百卷，还有地毯被踩得一塌糊涂……一天损坏价，值500万港元的东西。”

霍英东先生淡然一笑，表示此举上佳、至今不悔。他说：

“……就是要让群众看看改革开放的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他们新的创造，增加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途的信心！从经济上来讲，也是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嘛！”

语惊四座，满堂掌声。

第三十章 开发“两沙” 对未来充满信心

霍英东说：“我是看好香港前途的。”江泽民，总书记闻言，肯定地答复说：“请你放 120 个心，中国只有越来越开放，绝对不会改变政策。”

霍英东英姿英发、风尘仆仆地出没在香港、大陆及世界各地。

他始终是那么年轻、那么富于朝气和拼搏的精神！

他集聚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数以亿万计的财产！

今天，在霍英东的名下，以房地产为中心，从杂货铺到石油、航运、酒店、旅馆、赌城、淡水湖……形成了一个遍布海。内外的、自成一统的、庞大的工业商业体系。他拥有有荣公司、立信置业公司、信德企业等 60 多家企业。10 多万的“白领”（文员）和“蓝领”（打工仔）在直接或间接地为他效力。正如一篇文中所写的，“他的举手投足，进退伸缩，无不牵动着香港各界的神经未梢……”

他仍然没有放弃水上的营生。从 50 年代以来，他的船运生意逐渐扩大，至今兴旺不衰。除了挖泥、淘沙的船队，霍英东更辟建了往返香港——澳门间水翼船航线。丽日碧海，宛如飞鱼似的 10 余艘小翼船穿梭往来，蔚为奇观。这种瑞士式的现代化水翼船，可载 160 余人，瞬时可抵。每年有数百万人次穿行在这条航线上。

10 多年前，据说霍英东又与澳门知名人士何贤等集资赌业集团，在澳门兴建了如“南天一柱”的“赌厦”——葡京大酒店，成为了“东方蒙特卡罗”的一绝！据到过这一座赌窟的人士介绍，五花八门的赌法、五光十色的赌具，中西合璧、应有尽有。“如果赌赢了（这种情况比较少，100 个人中大约能有七、八个），为防意外，有专业的柔道或自由搏击选手，负责安全地把你护送到由你指定的地点；如果你赌输了（而且是输得囊空如洗），酒店将为你提供免费餐券，且赠送一定数额的回程（香港或是新、马等）船票和‘的士’的现款”。听罢，忍俊不禁。好一派“赌博的君子之风”！

广东有一句俗话，叫做“大鸡不吃小米”。意思是说，财大气粗的巨富，不屑于去赚那不起眼的几个小钱。

然而，霍英东这一只堪称为超级的“大鸡”却非如此。几十年来，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和可能。兴味盎然，乐此不疲。据说，他曾对他的经理人员训导，“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即令只有一仙一毫的利润也要全力争取。百万港元是由无数个一仙一毫积累而成的，要毁掉它也是从一仙一毫开始的……”

踞于这个庞大的“经济王国”之上的霍英东，究竟有多少财产呢？无数次地有人问起过这个问题。

最简单也是最确切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记得已故的美国百油大亨约翰·保罗·吉蒂的一句流传得很广的名言：“如果你准确知道你的财产有多少，你就不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

他这样说，当然不是矜持自大，也不是故弄玄虚。因为财产不是一个含意简单的概念。在通常情况下，富豪们的财产分散在许多的大企业上；除非把全部企业售出，否则无法计算这些企业的总价值有多少。由手这个缘故，即使取得富豪本人的合作，要说出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仍然是几近不可能的事。

“财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它发挥出作用来……”这就是霍英东关于财产问题的看法。不善言辞，却又常常言简意赅，平淡而又耐人寻味，这是霍英东的语言特色之一。

1991年5月6日。广东番禺。南沙港码头。

经过一年半的建设，我国首座双层桥式汽车轮渡码头——虎门大渡口正式通航。霍英东与广东省、广州市的多位首要，力之隆重而盛大地剪彩。

这是霍英东跨世纪的一个构想！

从广州经济发展向南辐射、港澳经济发展向北辐射的趋势来看，珠江三角洲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区。霍英东的战略目光，自然倾注在处于穗港澳大三角重心——珠江三角洲东西两部中间的、他的故乡番禺县。

一是开发位于番禺县东南的南沙镇。它南临浩瀚的珠江口，东隔虎门水道与东莞市太平镇相望；三面临海，海岸线全长 25.5 公里，有建深水港的自然条件；有拟建的省港澳高速公路从镇内经过和兴建中的珠江电厂，陆上又有发展工业基础的用地；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南北、东西文汇的交通枢纽与工商业城市的结合点。

摊开霍英东随身携带的、描画涂染得灿然一片的番禺地图可见：南沙镇府所在地距广州 62 公里，至香港 39 海里，至澳门 30 海里，距县城市桥 36 公里，处于穗、港、澳地带举足轻重的中心位置。

二是开发位于番禺县北端的沙滘岛。它与广州市隔江相望，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橄榄形岛屿，江面宽阔；北有洛溪大桥与广州相连，南有大石桥直通县城市桥；全岛面积约 13,000 亩，可供开发的有 8,000 亩。霍英东认为，在该岛上开发建设商品住宅、国际旅游渡假村、商业楼宇等，不但可以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吸引外商对珠江三角洲直接投资，以及改善广州和番禺县居民的住房境况都有直接的作用。

开发南沙镇与沙滘岛，这就是霍英东有名的“两沙”计划——而虎门大渡口，则是这个环链上的、率先衔接的、万万不可断缺的一环。须知：此项宏伟计划的逐步实施，将促使珠江三角洲的整个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矗立在太平洋西侧的这个三角洲，将会在二十一世纪放射出灿烂的光彩，而霍英东在这项计划实施中的重要贡献，亦将载入史册：

迎着虎门渡口鼓荡的海风，霍英东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充满自信的笑容……

霍英东曾多次对人坚定地表示，他个人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几句话恐难说得清楚。

根据 1984 年草签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总的原则是否可以概括为是“港人治港”？

有人注意到以下情况：

1985 年 2 月 22 日、23 日，邓小平在白天鹅宾馆、珠海宾馆分别会见了香港、澳门爱国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马万祺先生。邓小平同霍英东、马万祺分别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祝他们新春佳节好，并向港澳同胞致以节日问候，希望他们和港澳同胞为香港、澳门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这当然不是一般性的会见。海外有记者猜测说，“中共最高决策人物邓小平对霍英东、马万祺的接见，实际上是对霍、马在香港和澳门的地位的确

认。是有安排的、有选择的、精心设计的。”

1986年9月，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伉俪访华，在广州、香港两次接见了霍英东，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霍英东向女皇赠送了礼品。有人评论说，“女皇对没有勋位的霍英东先生的礼遇，说明霍氏是英国方面可以接受的人选。”最为难得的是，霍英东本人的“自我感觉”亦极好。1984年11月，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后，霍英东于香港对记者发表了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请读几段记者现场绘声绘色的描述：

“我不说客气话，谈心里话。”霍英东先生微笑着举起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草签文本说，“这薄薄的一本，香港人所关注的问题，上面全有了，很周详！”

一年多来，香港各界人士组织了数十个代表团访问北京反映意愿。作为全国政协常委，霍先生回忆起这一举动，满意他说，“中国领导人对香港的情况很了解。有决心和信心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谈及“一国两制”，霍先生认为这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伟大构想，是香港人最关注的大事。他说，“中国外长把这一伟大构想公诸联合国，使它具有受国际约束的意义，更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亲眼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至于到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了。”说到这里，霍先生开怀笑了。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霍英东说，“如果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前还有疑虑的话，那么，现在阴霾已散，我对香港的继续繁荣稳定增强了信心。”

霍英东从祖父那辈开始定居香港，他亲身经历了香港数十年的变化和发展。他认为“港人治港”的政策，能够发挥香港人的聪明才智。所以企业家应继续投资，专业人才应各展所长，个个下决心，为香港走向成功之路贡献力量。

谈到个人的事业时，霍英东坚定地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

根据“联合声明”规定，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仍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霍先生认为这是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决策。

他说，“香港是个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资金自由进出，绝大部分商品免税入口。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更大的贸易自由。因此，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成为国际瞩目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霍先生又进一步分析说，“香港繁荣的重要支柱，仍然是本港工业。近两年来，港制产品出口量大幅度增长，促进了香游经济的繁荣。”至于香港工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要走多元化的道路和努力开拓外贸的市场。

霍英东谈锋很健。他说，“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盼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在引进资金加强内地建设方面，香港应该更好地发挥日益重要的桥梁作用……”

以上，像不像一篇组织得很好的、包容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竞选”或是“就职”的演说呢？

像。

霍英东一反常态，侃侃而谈。

199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霍英东，与他进行了广泛交谈。当谈到香港情况时，霍英东敞开肺腑说：“香港要繁荣稳定，重要的是国家的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到了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的支持，对祖国的前途是有信心的。港澳同胞对国家有感情，大家都是中国人，不管谁发了财，都是关心故国家乡的。中国的繁荣，必能力香

港的稳定繁荣起到重大作用。因此我是看好香港前途的。”

江泽民总书记闻言，肯定地答复说：“请你放 120 个心，中国只有越来越开放，绝对不会改变政策。”并以嘉许的态度充分估价了霍英东在大陆投资的作用及其影响，十分恳切地说：“你的贡献很大。”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霍英东也有着一席之地、他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和仰慕他的名字。

翻开香港的百年史册。可知，自开埠以来有过几次大的“变革”（或称“动乱”）：

1941 年底，算是一次，当时日军逼近香港，大批居民逃往“中立国”葡萄牙占领的澳门；

1950 年前后，大陆解放，一部分有钱人，奔走台湾或远去美国；

1967 年“左派”骚动，人心惶惶，纷纷移民，远走高飞；

1973 年“股市大崩溃”，整个香港陷入“疯狂”之中；

进入 80 年代，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酝酿、拟定及草签的过程中，诱发了一定范围的资金转移和小规模的移民。

有道是“真金不怕烈火炼”！

每一次的变革和动乱，都会造就一批“与香港共存亡”的富豪和知名人物。

历史，再一次地把霍英东推到了一个义不容辞的地位上！

到 1997 年，霍英东刚好 75 岁。正是德高望重、群星拱北的年龄。“作为香港的象征和行政区的代表人物，似乎非他莫属。”这是一位香港朋友的预言。

是否、是否？待等 1997 年后。

附录一：像霍英东这样的一个老板

——霍英东博士私人秘书梁东海访问记

谢 珏

“一见钟情”，这话通常是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的感情的。然而，梁东海先生在找到他第一份工作时，竟然有“一见钟情”的感受：“啊，就是它了，这是我的希望所在！”在这份感情的驱使下，他一干就干了32年。

32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对时下热衷于跳槽的人来说，漫长得简直像是一个世纪。不过，当梁先生亮出他的“霍英东博士助理秘书”的卡片时，人们的惊奇就转而羡慕了。

“老板对每一个伙计都有机会给他们，问题是自己如何把握到这种机会。”这是梁东海的感慨之言，也是他的成功之道。想当年，一个才14岁的黄毛小子，进入装修得豪华的写字楼后便只感到不知所措，那时候，大概没有想到今天这样顺风顺水的好日子吧。

梁东海跟随香港亿万富豪霍英东32年，在他眼中，霍英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9月5日，笔者有机会对梁东海进行一次专访，寻求问题的答案。

访问是在中环毕打行六楼进行的。想不到当笔者和《财富》主编到达毕打行时，霍英东已在那里等候。看来霍英东也很重视这次访问，他花了两个多钟头招待来访者，席间谈笑风生，显然想这次访问有更佳的效果。

不过笔者的兴趣仍放在梁东海身上，他为霍氏工作32年。给霍氏写传记都够资格了，吃饭时，梁东海说，传媒这样“间接访问霍英东”是从来没有过的，并认为我们问的问题也是“怪怪地”。

正式访问时，我才知道，今日的梁东海亦非等闲之辈，他拥有自己的事业，不过不方便透露罢了，我理解他这番话的含意。访问中，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当我随口说出《信报》一篇有关霍英东的文章时，梁东海居然一字不差地将文中的小标题全背了出来，这种“功力”，相信是他32年训练出来的。

下面是访问的录音纪录摘要：

访问地点：毕打行 Culture Club

时间：1990年9月4日下午2时

问：请问梁先生什么时候开始替霍先生工作的？初时担任什么职位？

答：霍英东先生是我唯一的波士，我一念完书出来做事就跟他了。我第一份工就是到他在德辅道中的立信置业有限公司上班。那间写字楼有一道道门，很有型，门口的“立信材料第一”的霓虹光管很大很抢眼，一进门就看到许多大厦的模型摆在橱窗内。我当时居然有点惊（笑），当然也有一种安全感，给了我希望。刚进公司，我的职位是很低微的，可以说是普通后生吧，要做很多事，一个人一脚踢。

问：后来是什么机缘令你获得霍英东的信任呢？你与老板有没有乡亲之类的特殊关系。

答：没有，我不是番禺人。我进霍英东先生的公司是霍先生的母亲介绍的。

问：你能不能说说你夜哪一年进霍英东公司的，你当时是什么学历？

答：（沉思一下，笑）1958年进立信置业公司，整整32年了！我在大陆初中毕业，来到香港后，经霍英东母亲介绍进了立信置业，心里觉得不错。做了一年左右，霍英东先生就供我读书。可能他那时就钟意我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于是我晚上就到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等于现在的理工学院）读建筑，读了6年。是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后来我一路升职，升到地产部经理。

问：你知道老板为什么会看中你呢？

答：我也不知道，可能人夹人缘吧！我同他非亲非故，也没有什么背景可言。他对我一向都是那么好，其实他对任何一个伙计都差不多，都肯给机会他们，问题是自己如何把握这种机会罢了。

问：（笑）那么你是把握到这种机会的了。你是否觉得自己很幸运？

答：幸运？都算幸运啦！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又能帮霍先生，经常同他回国内，珠江三角洲、北京、海南岛等地到处走。

问：哦，原来你并不是他的私人秘书那么简单，你能不能谈谈你自己拥有什么事业？

答：（笑）我是他的所谓秘书啦。但我在这里不方便谈及自己的公司，不过可以告诉你，我的工厂也不小，在香港同行里排名第二。

问：霍英东对他的雇员，在工作效率之外，最注重的是什么？

答：诚恳、负责，这是霍先生最注重的。

问：《南华早报》曾在1978年刊登过一篇“霍英东发迹史”，该文指霍英东“性喜冒险”，你跟随他多年，对这句话持何看法？

答：刚才你也听过霍先生的谈话了，人总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但是成功不但要靠冒险还要有运气。在我看来，霍先生是个很稳重的人，其实人们常说他敢冒险，正说明他有远见，他做每一件事都考虑十分周详。他刚才也说，冒险就是把眼光放远。

问：这是不是你老板成功的要诀？

答：我想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要思想敏捷，对每一件事反应必须相当迅速。

问：最近《信报》一位专栏作者在柏林巧遇霍英东，和他一番谈话后，赞他“有一颗中国心”，不知梁先生能否更为具体地介绍一下？

答：那篇《柏林邂逅霍英东》我也看过。文章的小标题，如“精神抖擞疏财仗义”、“沉着思考热爱中国”、“锲而不舍协助建设”、“呕尽心血建设家乡”、“亲力亲为绞尽脑汁”等，差不多是霍先生的形象，每做一件事，除非不做，否则非做到底不可。例如这次搞番禺县南沙港的开发，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去大陆，同当地有关各方商量，究竟将来的前景应如何。他不是看某个地方，而是着眼整体规划。

问：霍英东似乎对珠江三角洲的建设特别热心。

答：对，他是很着重珠江三角洲的。去年他与恒基、奥海组织了一间虎门渡轮公司，主要是疏通珠江三角洲的东面、西面的交通要点，因为现在广州至深圳的公路已经很挤塞，而沿线的范围，如东莞、深露、宝安发展很快，香港差不多有80%的工厂都搬了去。预料未来八年至十年间，香港西面也将有很大发展。霍先生成立这个渡轮公司，就是要配合香港未来的发展。

问：但是前不久《瞭望》周刊说，大陆未来十年的经济重点将向上海、长江三角洲一带倾斜。中央的这种政策会不会影响你老板的发展大计？

答：我想不会的，因为各有特点，每一个地方和地区，都有其本身的特点，例如上海现在要发展浦东，上海是最古老的工业城市，有条件发展自己的东西，但会不会因此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呢？事实上珠江三角洲靠近港澳，将来的发展与上海是不同路线的。

问：我的意思是大陆是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当它将经济重心从南向北转移时，珠江三角洲势必失去它以往的政策上的优势。你近来跟随霍英东回大陆，有没有感到广东沿海经济特区的优惠条件在渐渐消失？

答：绝对没有，所谓优惠，其实广东省各城市差不多都有，对如何吸引外资、如何吸引三资企业，各处都有自己的一套优惠，并不是特区才有优惠。例如东莞就不算特区，为什么外商喜欢到那里去呢？正如霍先生所说，乡镇企业要比市县企业的制时少得多。

问：你刚才说过霍英东成功的要诀是目光远大。报章最近有一篇短文，题目为“伟大领袖——远见及於百年”，你心目中的老板是否一位“伟大领袖”？

答：这个问题我不懂得回答了。

问：那么你能否举出霍英东有远见的具体例子？

答：例如中山温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年前中国刚刚开放，他是第一位回去投资的港商，合资办了中山温泉，当时他就知道，要维持这样一间宾馆并不是容易事，于是就设法用其他方法来支持中山温泉，例如搞中山公园球场来吸引外资，事实上中山温泉的高尔夫球场搞得非常成功。

问：霍英东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曾称赞他的拍档何鸿桑“思想敏捷，当机立断”；不知道他对另一位拍档郑裕彤的看法如何？在日常谈话中，你觉得他对哪几位商场名人是感到佩服的？

答：你问的问题是很私人问题。我对郑裕彤先生没有深入了解，只觉得他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很懂打算盘。至于后一个问题，霍先生本身是一个成功人士，说他钦佩哪些人，只能说互相了解，互相钦佩吧！

问：成功人士往往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你觉得霍英东有没有受这种困扰？

答：以霍先生的为人，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国内，都对他有一种敬佩之情。可能不少港人不知道，霍先生不但帮助国内，对自己的出生地香港也很热爱。他担任了二十多年的足总会长，既没有人反对，也没人出来同他竞争，说明香港人对他是不错的。他每年对港澳体育、医疗、教育以及社团所作出的慈善捐款，数以千万计。

问：但在一些大型慈善筹款活动中则很少见霍先生露面。

答：他不想沽名钓誉。例如他刚刚向香港大学捐了 2,500 万元，用来建造游泳池和研究生宿舍；此外，五六月间，在澳门的“爱心满镜湖”的慈善晚会，他私人就捐了 1,000 万，通常霍先生捐了钱之后，很低调，不想张扬。

问：你有没有这个感觉，霍英东似乎在大陆受欢迎的程度高过在香港？

答：这件事是相对的，其实，他回大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的将来。他花了那么多心血去发展珠江三角洲，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香港的将来。现在香港的佣金和人工高，同世界竞争有困难，霍先生回去投资，对国内有好处，对香港更有好处。我就不知港人对此持何看法。霍先生的一贯风格，每做一件事都不喜欢张扬出去，直到成功的时候，人们才会明白：啊，

原来如此！

问：刚才你提到霍英东在商场上对人只是“互相钦佩”，那么他最钦佩的中国领导人是谁？

答：我觉得他对中国革命老一辈都很钦佩，认为这些人为国家出了不少力。不管是邓主任、赵书记还是杨主席，个个都钦佩。

问：你说的“为国家出了不少力”，是不是指那些老革命用枪杆子打下了红色江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答：我想凡是对中国有伟大贡献的人，霍先生都很欣赏的。

问：霍英东先生从来没有去过台湾，这是为什么？

答：霍先生虽然没有去过台湾，但是他的儿子霍震霆先生是去过的。他很想去，但也要有机会才行。

问：是不是对国民党有看法？

答：不是。作为香港商人来说，到哪里也是一样。

问：现在你老板的生意做得那么大，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哪里？

答：现在霍先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因为香港的基础已相当雄厚，他的生意包括地产、航运、造船、石油、建筑、百货、船务，可以说包罗万象。

问：发展珠江三角洲是不是他最大的心愿？

答：是的。正如我刚才说的，他此举是为了未来的香港，也是为了未来的广东和未来的中国尽最大的努力。

问：霍英东说他现在已处于半退休状态，那么他名下的生意主要交给谁呢？

答：日常生意都是由他主理，经他控制的。虽然儿子也有帮手，但主要的决策人还是他。（笑）霍先生说他半退休，就是从旁看他儿子做事，所谓“创业难，守业更加难”。

问：霍英东喜欢打网球，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请问除了网球以外，他在生活上还有哪些嗜好？

答：霍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日间吃的很少，晚上宵夜对他来说比较重要，但也吃的很少，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芋头、粟米！（笑）这是他的主粮。

我跟他这么多年，发现他在体育之外可以说再没有什么嗜好。而游泳是他平日主要的运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每天都要在摄氏十二度的水中畅泳一番，有时游二三次。另外还有踢波，年轻时练过举重。

问：霍英东是不是捐了一亿多元给这次的亚运会。

答：是的，一亿有多，可能是港人中捐款最多的了。

问：我看到大陆报纸说，霍英东捐钱兴建的一个游泳池，原先有关方面答应以他的名字命名，后来却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

答：这件事我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他在国内捐献的医院，是不希望用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不过有时对方一定要用他的名，那也没有办法，如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英东心脏中心。

问：霍英东是怎样决定对国内某项计划捐款的？有没有人主动要他捐呢？

答：主动找上门的不多。他捐款主要考虑整体的效果。成立霍英东基金会就是为了安排国内、香港和澳门的捐款大计，决定之前先要衡量其重要性。

问：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什么期望？

答：他希望儿子当专业人士。霍先生有两个儿子都是当医生的，其中一个在玛丽医院，职位也相当高，这个儿子想出来自己挂牌，但霍先生不同意，要他留在政府医院继续为市民服务。这些霍先生都很少张扬。

问：想问一个也许是多余的问题，看来“九七”对霍英东完全没有影响，他和他的家人决不会离开香港吧？

答：对，他完全没有担心“九七”问题，当然也不会离开香港。

问：那么你呢？是不是同老板共进退？

答：我……（笑）我现在不想回答。

问：英谚说：“书僮看主公，英雄变狗熊。”不知梁先生对这句谚语有何看法？

答：我同霍先生相处了那么久，他对我就像世侄一样，我不觉得会有什么“英雄变狗熊”，反而更敬佩他，觉得他思想伟大。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从他得益不少，起码对我的事业帮助不少。

问：你跟着他 32 年，有没有看见过他发脾气？你印象中他最发火的一次是为什么？

答：事实上我真的没有见过霍先生发脾气，反而对儿子管教比较严，对伙计、同事很客气。

问：你是五十年代后期认识霍英东的，当时他已富有但还没有大发达，在他不断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我跟他那么多年，觉得他每做一件事都计划得很周详，很有远见。具体例子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南沙港。至于地产投资方面，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就有远见，看到整个形势发展的趋势，知道及时收手，但到了 1967 年、1968 年期间，在别人不看好地产时他买进，过了这段时间，他又卖出，他到现在对地产还是相当看好，问题是找适当的时机入货。

附录二：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

——在中山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典礼上的学术演讲

霍英东

1987年2月7日

4年前的今天，即1983年2月7日，是本人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也是全国第一间高级宾馆对广大群众全面开放的一天。从白天鹅宾馆的筹建、施工到开业、管理、发展，使我深深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对外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政策的正确性。今日，和大家谈谈的是——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发展旅游是实行改革后开放的一项措施。

1978年12月19日三中全会开幕后第一天，《澳门日报》发表了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报道，本人是第一批最早响应返回祖国发展旅游事业兴建宾馆的，在中山县率先派香港设计师勘测中山温泉宾馆兴建工作。同时参与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合资宾馆的计划。

在国内兴建现代化的宾馆，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当时大家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是不大清楚，许多事情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譬如旅游开放是否会带来思想污染；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呢？因为当时国内副食品紧张，物质短缺，很多大酒店洗面盆塞子也没有，要用热水瓶塞来代替，许多种物品还需配给，广州交易会期间，来多了港澳和海外买家，广东的副食品还要其他省份支援、电力供应更加紧张，市民生活甚感不便。同时广大群众如何看待投资者，是互利还是剥削？譬如文革前港澳同胞、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有定息存款，本是华侨支持国家建设的爱国行动，但是文革时期，存折放在亲友家里还会连累亲友。当时，在交通方面，困难亦很大，广州市内没有足够的“的士”。在建筑装修等方面，缺乏技术熟练的人才。另外，在服务工作上，问题也不少，除了饭堂开政规定时间以外，就吃不上饭。开饭时间前，司机不愿开车。有一次，我在去从化的路上，早上9时，就看见开山的工人，放下工具休息。旅游局负责人说，万里长城上的厕所，说了五年还造不出来。因此，兴建一座现代化宾馆，将会遇到思想认识。对事物判断和经营管理等一连串问题的考验。当时，我考虑采取捐赠方式，给国家赠送几百间房就算了，这样做法是易于被人接受的，自己也可减除忧虑，但我觉得这不符合党中央订下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利于将经济搞活，只好下定决心，硬着头皮进行探索，碰到问题就想办法去解决。

建设宾馆，北京是最理想的地方，是10亿人民的首都，世界各国使节，万商云集，有5千年文化，看不尽的名胜古迹，长城、颐和园、故宫、世界最宏伟的天安门广场等。上海在30、40年代已经同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著名城市之一。而广州除了在交易会开会期间外宾较多外，平时多是接待回乡探亲的港澳同胞、华侨，并无吸引游客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接近港澳，沟通较易，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在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下，我们

决定新宾馆的地点选在广州。

1979年1月，以广州市副市长为首的领导小组代表团，应邀到香港考察并商谈兴建宾馆条件。由于刚刚开放，许多事情双方还未能沟通了解，譬如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管理等问题尚未解决，但为了表示我们的合作决心，1979年1月23日和领导小组达成初步协议，随即在广州进行选点及商讨设计事宜，1979年4月10日签订正式协议。宾馆设在广州，但具体建在哪里最为合适，这里也有学问，由于国内情况特殊，市内公用交通工具不足，加上考虑购物的方便，酒店一般多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经过几天对全市亲自勘察，发现沙面河畔，有一块淤塞沙滩，我认为这里兴建宾馆最为理想。因此，要求以填河方法获得土地用来兴建宾馆。这个方案马上被接纳了。这样可以减少拆迁的困难。当时，很多人以为我选择这块地方是借鉴耸立在湄公河畔、世界大酒店之首的曼谷东方酒店，其实也不尽然。白天鹅宾馆面临珠江三江会台的白鹅潭。河面辽阔，风景特佳，比湄公河更具雄壮气派。为了增添沙面休憩地方，我决定拨款多填6千平方米土地，另捐资300万港元建设公园、供市民享用。

关于白天鹅宾馆设计、施工、采购的问题，我提出“三自”方针，这就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采购和自己经营管理。这个构思也不是抽象的，首先，我在广州参加来自香港及广州建筑师对宾馆设计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专家们各抒己见。由于国内建筑师对外封闭30年，对新的事物，开始仍然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对国内情况也有不理解的地方，譬如，国内设计要计算预防地震、餐厅与厨房的比例、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地方，宾馆要自己组织车队等，甚至有部门建议要在宾馆顶楼安装高射炮，由于图纸设计涉及部门达30多个，所以我认为必须由一批熟识当地情况的国内建筑师负责设计比较合适。后来他们应邀到香港参观考察一段时间，他们的智慧便充分发挥出来。终于设计了一间矗立如玉屏，配以飞瀑流涧，花艳草翠，堂内庭园中西合璧的白天鹅宾馆。

对于施工问题，当然是由国内建筑公司承建，但也采取新的办法，以承包方式进行。至于宾馆采购方面又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原来一间宾馆需要采购的东西不下十万种，大的如空调、电梯，小的如宾馆信纸、言封、杯、碟等，需要品种多，数量少，国内大厂供应不易，要从世界各地采购，但决定仍然交由国内自行负责，我们设法从旁协助，这样我们也给国内培养了一批采购人才。

至于经营管理方面，外国和香港高级酒店多是委托外国管理酒店集团，负责组织客源和管理，但一定要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用人用财权，由营业总额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由于国内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易，而对国内情况又不熟识，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职工，其员工待遇与本地人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之间的矛盾。白天鹅宾馆的管理，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干过宾馆行业的国内人士自行管理。衡量之下，我们还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方式。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整个宾馆2000多个员工，包括总经理在内，没有一个干过酒店行业。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奋斗，辛勤学习，终于能把白天鹅管好。1985年7月，白天鹅宾馆正式被国际旅业的组织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间世界超一流

酒店。这就证明了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是可行的，“三自”方针是成功的。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管理现代化宾馆的信心。

在白天鹅宾馆兴建期间，不能说全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体制分工不甚明确，也有扯皮现象出现，由于设计、施工、管理队伍，都能同心协力，艰苦奋斗，为建成白天鹅宾馆完成目标而努力，工程也能依照计划完成。

宾馆终于在 1982 年 10 月 14 日的春交会前试行部分营业，先是将 5 层楼 200 个房间开放，边施工，边营业，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开幕前我入住白天鹅宾馆，房间还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的供应。14 日客人快要来了，我早上巡视厨房，发现炉灶还未安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只有一塘水，当时见到一位青年主管，我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书记来宾馆吃晚饭，就算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当时省府来了 100 多位贵宾，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开出来的不只是四菜一汤，而是颇具规模的晚宴，部分营业计划终于实现，经过 3 个月部分营业，使 2000 多个员工积累了实地培训的经验。下一步决定在 1983 年 2 月 7 日春节前全面开业，有些人误会以为抢先营业是为了赚钱，其实并非这个原因，问题是春节开不成，南方天气潮湿，会损坏宾馆的大量物资。

1983 年 1 月初，我察觉工程进度很慢，就决定要求抢在春节之前最后一个星期全面开放。就是四年前的今天，当时大家对能否赶上，还没有信心，因为宾馆情况极之混乱，宾馆内有一个 2000 多人的施工队伍，另有 2000 多个服务人员，加上旅客不下 5000 人，酒店进出非常凌乱，搬运货物进出电梯拥挤不堪，工棚和数千部单车把半个沙面都占了，但在省、市各部门大力支持下，白天鹅宾馆正式于 2 月 7 日完全对外开放。开幕后，第一件事我要求大家将宾馆开放给群众。回忆 1979 年，我带领一个参观团到北京参观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封广州时，许多亲友到宾馆探访，亲友要在门外冒着风雨轮候登记 1 个钟头才获得入内见面，这是很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让任何人都能进入宾馆，即使不是顾客、亲友，就是入来参观影相的，也应该让他们进来，在经济上，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同时也应让群众看看一些新的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他们的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当时大家鉴于广州海珠广场为了争看一盏小太阳灯，由于人潮拥挤而出了事故的教训而有所顾虑，最后经过春节期间向大量群众开放之后，大家都觉得将宾馆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开放下去。这也是国内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宾馆是一个小型社会，包罗万象，不但是可以赚钱的经济实体，而且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国家的水平和面貌，既是世界各国人士汇集之点，对市民也可提供日常活动的好地方。

兴建宾馆不但引进外来资金，而且在技术方面，学习宾馆有十万种品种设备的使用、管理、维修、制造等学问。在建筑施工九百，吸取世界建筑装修设计新知识，对一些建筑项目采取承包方式。在经营管理方面，让台营企业得到较大权力，采取灵活措施，有效地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改善一些长期不合理的僵化体制，在部分员工中试行合同制，还对工资奖金，商品市场经济试行改革，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新问题、物价、工资和很多意识形态等，即使出现不同看法，但也只限于极少数的合资企业，广州白天鹅宾馆和其他新建宾馆开业对今日的广州兴旺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

宾馆的筹建、施工和经营管理及其发展，充分说明了我国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白天鹅宾馆可以突破，其他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搞活也可以发生一系列更大的突破，事实正是这样。

随着广东旅游业的进一步开放，来往人次增加，海陆空交通建设也带来极大的发展，港穗直通车不但恢复，而且更发展至双轨及全线电气化，水上交通有飞翔船，双体船及巨型豪华客轮。飞机已直航，班次随着需要不断增加，机场及火车站逐渐得到扩建和改善，过海关手续在不断简化，广珠公路的4条大桥通车和扩阔，也带动和改善珠江三角洲的交通，单是1984年1年间就有9条跨江、跨河大桥建成通车。这些建设是以优惠贷款、捐赠、城乡合作收费偿还等形式解决的。这就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排队过渡的落后状况。通讯设备也一步一步地改进，电力供应也通过国家与地方投资或与外商合作形式逐渐得到改善。由于珠江三角洲的交通的改善，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也促进了广州市的建设。现在广州市兴建了珠江第三桥梁、高速公路、立体交叉、高架路及行人天桥等种种设施。

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城乡各行各业，随着市场供求的需要，物价调整，农民发挥生产积极性（例如：1980年底中山温泉开幕后，中山生产急剧变化，由每年生产乳鸽1,500对增至今天已45万对），副食品供应充裕，很多以前需配给的生活必需品项目，也逐渐放宽。个体户不断增加，逐渐形成国营、集体企业有力的补充，经营方式不断改良，从考虑成本到经济利益的概念、贸工农体制逐渐形成，人的积极性得以重大发挥，大量年轻人就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精神面貌改变，经营管理和科技知识，精神文明，服务水平都有所提高，年轻梯队班子逐渐形成，总而言之，改革开放政策把经济搞活，对绝大多数人是受惠的，即使少数人受影响，但对整个社会经济是进步的，是得益的。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一窝蜂”的问题，国家亦逐步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办法去解决，我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和把经济搞活的政策是长期的，是坚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附录三：我与体育运动

霍英东

振兴中华 重要标志

35 周年国庆节，我应邀到天安门观礼，看到许多巨型导弹、新式坦克，固然精神振奋；当参加奥运的金牌选手经过的时候，我更是激动万分。

新型武器是强国标志之一，但中华振兴、国家兴旺，更重要标志是民众的体魄健康、精神文明。杨传广、纪政曾经为中国人带来光彩。我们健儿在奥运不但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面金牌，还，总共取得金牌 15 面，使中国成绩在亚洲名列第一，在世界名列第四，更振奋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觉得中华民族有希望，我们中国人有希望。

10 月 2 日中午，在招待金牌选手和中国体委领导人的宴会场合，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宣布，我愿意提供港币 1 亿元，发展中国体育事业。这是我心灰已久的愿望。1 亿港币原不算多，只希望作为基金，每年从基金收益项下用来发展体育运动，增加设备，吸收技术，使我国体育运动更普及，把各个参赛项目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使祖国人民认识体育运动不仅增强人民体质，更是我中华民族光辉的标志，务求在一年多后的亚运，三年多后的奥运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体育运动 人体必需

从不否认，我是体育运动迷。我觉得，人类对于体育，不只是爱好，而且是人体所必需。也只有运动才能使身体强健起来。听说，太空人飞到外太空，生活一段时间，进行科学实验，这段时间，最大困难不是饮食、呼吸，而是缺乏运动。由于缺乏运动，所以呈现肌肉萎缩，这是仍然有待于专家解决的问题。

我喜欢体育运动，是从小开始的。当时的环境，使我少年时代就深知体育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0 年前的香港，不像今天这样繁荣，城市建设不像今天这样进步！香港面貌的改变，包括重要建设，如高楼大厦、海底隧道、地下铁路等都是最近十几年才出现的。幼年时代我家境很不好，一家人往湾仔水渠街。面积不大的一层楼，挤着 50 多人。在那又破又旧的地方，有些睡三层碌架床，有些睡帆布床，有些晚上才开一块床板。如果天气太炎热了，就把床板铺在骑楼或者花架上。这样的环境，肺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同楼之中，姓梁的一家死于肺病，这是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居住环境恶劣，食物营养缺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的成长，全靠奋斗精神和坚持运动。

少年时代 读书用功

少年时代，我在敦梅小学的免费义学读了三年，后来考进皇仁书院，由 1936 年到 1941 年，读了五年半。

敦梅小学位于湾仔克街，规模很小，当然没有运动的地方。

我跟小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在住处附近，横街也好，公厕旁边也好，只要有二三十尺阔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球场”。这样的“球场”也很罕有，下课钟声一响，就要飞跑出去，先到先得，霸占地方踢足球。所谓足球，当然也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一种，只是简单的“橡皮波”。

考进皇仁书院之后，情形好了一些，皇仁书院有球场，尽管颇为简陋，总之一幅旷地，既是排球场，又是篮球场，而且是足球场。我什么种类的球都喜欢。当时我对足球最喜爱，我曾一度代表校队打排球，打的位置是三排中。

这样热衷于运动，正如前面所说，既是爱好，又是必需。我深深知道，如果不坚持运动，在那样的生活环境，身体一定越来越屠弱，最后被肺病征服，逃避不了。另外，如果不坚持运动，精神不但不旺盛，也应付不了繁重的学业。

皇仁是英文书院。以前常开玩笑，说“番鬼佬睇榜”，就是指英文书院的编制：进校由第八班开始，逐步升班，升到第二班，中学教育告一段落。

我念书很用功，成绩很好，考进皇仁，读第八班 A，考试全班第一；后来升到第七班，有一次考第三，为此哭了一场。

脑力劳动 更需运动

运动的定义，主要是“动”。越是缺乏动的机会，尤其是从事脑力劳动，做事也好，读书也好，越需要动。我知道象棋好手胡荣华等特级大师，他们也从事各项运动，如跑步、打球、游泳等，来增强思考能力。

运动方式如跑步、打太极、柔软体操、甩手操、球类、游泳等等，固然是“动”，有些人用适合自己环境、年龄、，以各种各样方式保持运动，也都是“动”。

在皇仁书院念书的几年，尝试各式各样的运动，第一个运动，就是步行上学。

那时我上课的地点，是位于上环“三十间”的校舍，由湾仔走到上环，是相当远的路程，每天步行上学。

那时候，走路是基本运动，有空就踢足球，打乒乓球和打排球，夏天有时到海滩游泳。越是运动，对运动越喜欢，有些当时高不可攀的贵族运动，如网球，我也想尝试，但现实不可能。

战争爆发 环境转变

我的体育运动，后来中断了一段时期，那是日军占领香港的年代。

1941年12月8日早上，因为学校考试，这天没有走路，要花三分钱坐电车，希望争取多些温习时间。在电车站等车的时候，九龙方面传来飞机轰炸的声音，接着响警报，不久知道日本进攻香港，不用上课了。

可能因为平日功课繁重，考试带来更大的压力，当知道不用上课，居然开心了好一阵，为了这一阵开心，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悔意，因为由这一刻开始，我就永远离开学校，而且长久的一段时间没有运动。

日军占领香港，环境完全改变了，变得比以前更贫穷，更困苦。生活所

迫，我每天到船坞、机场当苦力。起初配给“六两四”

口粮，已不足糊口，后来米粮更见缺乏，吃木薯粉、番薯藤、神仙糕，更是有气无力的。有一次要搬一个油桶，铁桶掉下来，把我一个指头压爆了。如此渡过了苦难的三年零八个月。

妹妹逃离香港，返回大后方广西宜山。我留在香港，照顾妈妈。说是照顾妈妈，其实是妈妈照顾我，我当学徒，妈妈鼓励我；我满身染着油污，家里没有肥皂，妈妈就用茶仔头烧水，才把衣服洗干净。

这样熬了大约两年，后来想着换个环境，就和 14 个朋友一起，凑点小本钱，由我负责，在坚拿道西找个小铺店，做杂货生意。那时物资极度缺乏，所谓杂货，不过是咸菜、咸鱼仔之类。虽然是这样，已经吸引许多顾客，只要有供应，往往引来几十人争购。一个人应付 10 人，这个讲价，那个争秤头轻重，还有叫买多少多少的，还要收钱、找赎，经常头昏脑涨。

日本人统治时代没有机会运动，更怀念运动，往往天未亮就摸黑跑步，也不计较戒严时期的危险，当时唯一的活动是推木车上环买货，来回起码要 3 小时，其次是早上开市时托大木门，晚上收市时又托大木门。

思考买卖 身体瘦弱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痛苦生涯告一段落。

当时我已经 21 岁，再也不是返回学校的年龄，索性跟妈妈做生意。租赁船只，把运港的煤炭接驳上仓，或由货仓送往大船。那时候的燃料，不是烧柴，就是煤炭，运输忙碌，虽然工作粗重而利润微薄，也算两餐安定。

和平后，许多战时剩余物资在市面出售。那时候，我开始在经济收入方面动脑筋，常常留意香港政府《宪报》的招标公告，当时看懂《宪报》的人不多，所以我占得一些便宜。有一天，在《宪报》看到有 40 部轮船机器招标，就向妹妹借了 100 元港币落标，想不到过了几天，水师塘通知我中了标，要我准备 18000 元出货。哪里来这 18000 元？真是一个大难题。

妈妈辛辛苦苦的经营煤炭接驳运输，相信有这笔积蓄，可是，大概怕我年少不懂事，钱财从来不经我手。她管钱管得很严。一天，看准她比较开心的机会：我大胆提出希望她拿出 18000 元，说可以赚 10 万元，怎料妈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口拒绝了。没有办法，只好走到九龙杂货摊找朋友，说出这件事，表示愿意 4 万元卖单，朋友同意了，给我 4 万元。这宗无本生意，赚得 22000 元，这是我第一次赚到作为日后发展的本钱。

这段时期，我的大多数时间花在思考买卖，运动少了，身体比以前瘦弱了。

事业转机 恢复运动

1948 年，我率领长洲一批渔民到东沙岛采摘海人草，运回香港，卖给药商，这是制造胃药的原料。读书时候，熟知“金银岛”之类故事，我喜欢幻想，常常想着自己也会到些孤岛探险，到东沙岛找生活，满足了我这方面的心理。

其实在东沙岛的生活苦不堪言，岛上十分荒芜，要自己带粮食，饮的是渗有海水的井水，一个月后，大部分渔民患上水肿病。我这样在岛上捱了 6

个月。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列强封锁中国，我帮助妈妈做货运，整整一年睡眠不足，虽然换来了财富，我的身家第一次达到 10 万元数目，但身体更见瘦弱，这时候，我的体重只有 103 磅。

我的事业真正发展，始于 1954 年，分析了社会的需要，我首创了预售分层楼花。在此之前，香港楼宇买卖，都是以整幢做单位的，买固然不容易，卖出也有困难。我觉得这种买卖方式可以改变，先研究将楼宇分层出售，然后把楼宇当商品，印说明书，推销楼花。这个改变很受欢迎，开售之日，门口排起队来，在当时来说，是前所未见的现象。

事业有了基础，健康却是越来越差。我觉得急需恢复运动：练好身体，如果没有健康，整天没精打采的，钱财有什么用？决定恢复运动，首先练习举重。

举重要跟师傅，当时的健身院大都在五六楼，而楼宇都没有电梯，我连登楼梯也不够气力，找来找去，在坚道找到李剑琴健身院，因为在低层，所以决定跟李剑琴学举重。

连入三球 信心大增

我恢复运动，练习举重，觉得过于单调，于是恢复踢足球。起初跟友好如毛云龙等，到赤柱的球场玩玩，偶然到修顿球场踢一场，已经觉得很隆重。50 年代后期，我跟友好和同事组织了有荣队、卓然队，每星期打 3 日，每日打两场，风雨不改，一年打 300 场，打足 10 年。

43 岁那年，我正式成为甲组球员，第一场赛事，在香港会球场对杰志队，我一连射入三球，从此对足球兴趣更为增加。

同一年，我学会打网球。这个项目我有很不错的表现，1972 年至 1977 年，我连续六次取得全港公开赛双打冠军。

现在年已 60，已经没有注册甲组，可是，我仍然不放过任何运动的机会，足球、网球、跑步，只要有空，跃跃欲试。

去年 10 月回到番禺，主持番禺宾馆的泳池开幕。看见一池碧波，仪式进行的时候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仪式结束，我带头下水。

十几年没有游泳了，浸在水里，身心舒畅，忘记疲倦，不停地游来游往，后来上岸，人们告诉我，原来我已经游了 43 个“塘”，超过 1000 米。

43 个“塘”，令我有更大的信心，我想今年还要练习冬泳。

精神振作 克服万难

越来越觉得运动的必要。在香港这么多年，我察觉做起事来，中国人与外国人有显著的不同。外国人分工太清楚，一件事情中，外国人分工做其中一小部分，他就真的管这一小部分，中国人大都不是这样，一件事如果分 100 部分，尽管我的责任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我往往关心全面、思考全面。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香港建筑世界上第一次设计的海底水库，以及建造世界上第一艘有 160 个客位的水翼船，都顺利完成，正显示中国工人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振作，要有志气、有勇气。

70 年代中期，内地宾馆设备一般很落后，我就想看有机会要搞一间现

代化宾馆。开放政策带来了机会，首先搞中山温泉宾馆，1979年11月动工，一年时间建成。接着兴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中国人设计、中国人施工、中国人管理的34层现代化宾馆。这间宾馆获得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批准的金质奖章，许多外宾称赞她可以媲美他们国家的五星级酒店。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人的智慧不比人家低，中国人的能力不比人家弱。

要振作，要努力，必须有强健的身体。

有人问我，当我工作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我愿意动，还是宁愿静。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宁愿运动。在运动中出一身汗，可以恢复充沛精力。

中国前途 充满希望

中国人参加23届奥运会，勇夺15面金牌，尤其是我们的女排，击败最强对手，取得“三连冠”。多少人激动得热泪直流，多少人禁不住上街欢呼。

健儿们取得的成绩，提高了每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为每个中国人增添了光彩。

国庆节那天，我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到金牌选手的花车经过，思潮起伏，感慨万千。

当时我十分兴奋，可是，也想起不少问题。想起一年多后，在亚运中，我们的选手应该有怎样的表现：想起三年多后，如果东欧国家重返奥运，我们能拿多少金牌。

记得科威特的朋友对我说，仅仅是天安门周围的人，就比他们整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我听了有点高兴，也有点不安，不安的原因，是我国足球队就曾经输给科威特。

冷静下来，觉得我国体坛各个方面仍然有待进一步努力，各个项目的成绩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体育运动要取得好成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情，三年多时间不长，一年多时间更短，时间迫促，我愿意贡献小小力量，希望引起国家重视，人民重视。

过往我们国家走了弯路，人民不温饱，如今情形改变，人们肚里有足够的热能，这是全面提高体育水平的最好条件。

我一生对事物的看法，是必须介入才知道真相；在困难中。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抬起头来。

几十年，我“介入”体育，深深领会体育的可贵；今后的岁月，我愿意更多介入体育事业，为我国体育运动更普及，各个参赛项目水平进一步提高，尽我一点力量。

我很乐观，我看到中国人有本事，中国一定有希望！

(1984年)

附录四：“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希望

——在德国汉堡欧华学会上的讲话

(1991年7月28日)

我祝贺：贵会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讨论欧洲大陆实现经济统一市场之后的变化是很及时和有意义的，有人认为公元二千年后，欧洲将可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六月份我又看到关愚谦博士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二十一世纪不是欧洲，而是中国的”。现在世界交通讯息发达，欧洲的进步必将会影响亚洲，反之，亚洲的变化和发展也一样会影响其他地方。我刚刚在欧洲和捷克走走，真是走马看花，说不出其所以然，希望听听大家的，我长期生活在香港，我想从我熟悉的情况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感想。

政通人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立国之后，都在探索如何进行经济建设，这里有南斯拉夫模式，有波匈模式，有捷克模式，有苏联模式，有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情况，我所知甚少，而对中国的情况，相信在座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切身体会；我以为“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经济改革的尝试，结果怎么样？！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了！中国兴旺发达，是中国人民群众所希望的；因为我身处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做生意，我就从做生意的角度去谈谈对这些变化的理解。

商品经济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根本是要考虑到人民的意向，是要将产品交到消费者的手上，消费者的需要与喜爱是决定企业能否取得利润和扩大生产的根本，是解决产品消化和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环节。对商品经济的理论，我说不清楚，从现实的生活里，我感到商品经济，对互通有无，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岛国资源缺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困难甚多，但却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我以为日本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在放高度发展商品经济。从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来说，日本不及美国，也不如苏联，与欧洲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比较，各有千秋而已，但日本在利用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商品化上，却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人把太空科技融汇放商品之中，例如图文传真、彩色复印、微型电脑、无线电通话，微波炉……变为市场实用的商品，进入家家户户，通过生活上的应用，提高了人民对科技的知识，培养大量人材，因为一般人都可以购买这些产品，於是有广阔的市场，为发展高科技提供无穷无尽的资金。至于香港、台湾、新加坡、南韩经济上能够起飞，也不外是乘商品经济的东风而起，如何理解商品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以为在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根本问题。

本来中国人很早便懂得做生意，春秋战国著名大生意人有陶朱公、吕不韦，但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生意人是受歧视的。“士、农、工、商”，“商”是摆在四民之末，社会舆论对商人是贬评的，认为“无商不奸”。从先秦到

近代，商人的地位改善不多，民国年间，亦只能亦官亦商，较活跃的工商业必须托荫於官僚，解放后在中国大陆，资本家是被否定的，民族资本家地位较好些，是团结的对象，但亦敌亦友。

香港和中国大陆内地虽然只系一桥（罗湖桥）之隔，但两地制度迥异，几十年目睹国内的政治斗争，我是不理解也很彷徨的；传统的中国教养根深地影响自己，我有爱乡爱国的一面，也因为自己是资本家，所以对未来的变化不能无所忧虑。对人生祸福得失，我不敢说看得很透。“人生易老”，“天难老”，“人寿几何”，能毫无所感？个人生活的需要，老天爷是有尺寸，不能多占多用，不管心里怎么想，生理有个极限，真是“万顷良田一斗米，千间房屋半张床”，我的胃纳还算不错的了，自问一顿饭吃不下一斗米。到我这样年纪的人，人世间许多事都看过，今天虽然事业薄有所成，也懂得财富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於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奋斗积累的结果，从个人来说也希望为桑梓做福，为子孙积德，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向前的。

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们这些人纵使怀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为家乡做些事，是不会被了解，也不会被接受的；直至 1978 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商品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的，提出“改革开放”，合情合理的政策，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出现宽松的政治局面，真是“政通人和”，大家的心又向着人民政府。从我个人来说，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有一份爱乡爱国的热诚，希望中国繁荣富强，既然共产党能够把国家管好，我便拥护共产党；对她有失策的地方，衷心希望她能够改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吃尽苦头，每次变乱，首先吃亏的都是老百姓。不久前，从电视看到库尔德族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况，我们上年纪的中国人，许多人都经历过这些日子；曾经吃过苦头的人，怎能不希望国家稳定？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改变其“改革开放”的政策，愿意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广开言路，让大家都能够为国家的建设各尽所能，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如果能吸收了教训，前面岂知不是又一番景色？！

在希望的道路上

我参加内地的经济建设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教育事业，有酒店旅游，有交通运输，有建筑工程，有港口建设，有工商管理人材培训，有医疗卫生，有体育和文化事业，所有项目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希望有利於国家经济建设，有利於“改革开放”。我是一个“生意人”，几十年在生意圈中打滚，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从财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以为香港是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香港的经验，香港的贸易基础，香港的地理条件等等，可能为内地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以为这些经验带有普遍性，不一定只对资本主义才有实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可能起到好的作用。我参与的项目，目的是希望通过具体实际的运作，脚踏实地能探索出可供参考的模式。我对承担每一件事都是有顾虑的，怕犯错误怕牵累别人；虽然自己安慰自己，好好坏坏上面有选择权，做不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好在自己无所求，不期待通过这些项目赚钱，我的勇气是来自做成一件事对国家、家乡积福的意愿。

在经济上和内地合资建设，我是起步得比较早，1980年12月，我在中山县建成中山温泉宾馆，那时候距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还不到三个月。

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亦在广州建成，虽然我在北京参与建设贵宾楼，在其他地方也支持建设一些宾馆，但中山温泉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所合资的宾馆，白天鹅宾馆也是在广州市最早落成的合资企业。筹建之初，要面对的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我要建设的是全“开放”型的高级宾馆，这间宾馆要保持中国传统的风格，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万事起头难”，那时文化大革命才刚刚落幕，哪些改变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我是很没有把握，我是心怀恐惧迈开第一步。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一直到建材的选用，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我都参与工作和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尝试。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社会，还往往牵涉到整个制度和习惯。以宾馆保安为例吧，过去来客访问，一般都先行登记，然后通知住客，经认对无误才准见面。白天鹅改变这种警卫森严的做法，任何普通市民都可进入大堂及使用餐厅。初时确实是“门限为穿”的，参观者差不多把大门推倒，这种紧张的情况，经过一个星期后，才稍为缓解下来。初时那些经理和保安人员都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原来的传统和规矩。老实说，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也发慌的，但我坚持再看看，几个月之后，情况逐渐正常了，现在可以说一切良好。物价的改革也有问题的，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价钱时价五角左右，白天鹅牌价定四元，价钱贵了几倍，那还得了！主管经理都不同意，但不改变又怎么办呢？白天鹅的售价成本不同於街边的摊档贩！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都要计算在内，不然何以经营？商品经济就是要赚钱，要良性循环，要改善员工福利，要有利于社会繁荣。我考虑的是我们的顾客主要是外宾，内宾是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作多种选择的。白天鹅虽然只是普通的宾馆，从其规模来说，实际相当於一个小市镇，客人和职工人数，经常不少於五千人，如果把为白天鹅服务的有关人员加起来，可能要超过一万人。要保证高标准的供应五千余人的衣食住行及水、电等等是极不容易的，需要数量很大，且品类繁多。这些需要改变了市场，市场的需要也促进了生产。由于国家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我们敢於改革我的管理，完善我们的供应条件；政策宽松了，群众才敢放手经营，市场渐见活跃；八十年代初期，珠江三角洲粮副产品供应日见充裕：中山县石岐乳鸽是很有名的，在“困难时期”整个县年产不足二万头，现在一个农场即产三十万头；华南地区过去是水果生产的王国，品种优异，称为“岭南佳果”，但一度陷於萎缩，个别佳品几乎绝种（淡水沙梨，花地杨桃），目前亦渐次恢复，东莞市（县）经营水果批发的员工达十万人。当经济政策趋向合理的时候，人民群众都动起来，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积极生产，满足社会的需要。为了供应城市的需求，人民利用简单的运输工具，发挥极大力量，沟通城乡的联系，把需要的商品及时供应市场，诸位可能没有办法想到。他们就用摩托车（粤人称电单车）运载大量货物，像杂技演员那样，一部车可以运载大猪八条，或者四十只肥鹅。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白天鹅客人，生活上需要的东西（除了不道德的），白天鹅宾馆都可以给以满足。这

种变化不限於白天鹅宾馆一隅，在整个广州，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是市场兴旺，人民生活获得改善，在广州各区的市场，人们到处都可以买到活跳跳的鲜鱼，新鲜的蔬果肉类；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里，你们可以看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的粮副产品，和多种多样的日用品；居住条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情况也获得改善，每当下班的时候，在乡间的街巷和小道，可见到人流处处。人们带着满足神情，手挽肉类鱼蔬，回家准备晚膳，当炊烟缕缕，人们会感受到农村小康升平的喜悦情景。

中山温泉宾馆去年（1990年）12月庆祝十周年纪念，白天鹅宾馆今年2月也举行了八周年庆典，我以为这些企业是办得好的，是成功的。所谓办得好，不仅仅因为接待过许多世界元首和知名人士（布什总统、尼克松总统、伊丽莎白二世女皇、李光耀总理、基辛格博士……）与受到不少的赞美之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样写：“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与白天鹅相比。其精美的菜式，优质的服务和超水准的诚恳招待使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这两间企业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是由中国人设计、中国人施工、中国人管理的企业。这十年是广州市经济建设变化最大的十年，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十年；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只系勇於实践和尝试而已。去年邓小平先生为中山温泉宾馆成立十周年题词纪念；对白天鹅的评价是“白天鹅好！”看来，我是没有做错？！

“改革开放”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希望，在十年的实践里，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曲折，但珠江三角洲“得天独厚”，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所以承受得起在改革中的震荡。所谓“天时”我是指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地利”是指珠江三角洲的地理条件和商品经济历史比较发展，“人和”是指干部和老百姓，对商品经济的运作比较熟悉和易於接受。以下我想谈港、澳特殊的经济地位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和关系。

共创繁荣

香港一百多年前是个荒岛渔村，现在是世界上著名贸易商港之一，近百年香港的变化发展，不仅影响广东，也影响全国，而影响珠江三角洲更早的是澳门。澳门早年是香山县（即中山县）的一个海滨小镇，明末由於地理条件及历史原因成为通往南洋各地的贸易港口，十六世纪初叶，葡萄牙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其势力伸展到印度、南洋、菲律宾、日本及中国。初时葡萄牙以进贡品为名，求借澳门曝晒水渍贡物，在明万历初年，以五百两租银获得在澳门辟港的权利，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澳门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货物转运枢纽了；由于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人民纷纷前往谋求生计，所谓“……百工技艺，趋之如市”，区区的澳门，在短短的日子里，竟发展为拥有十万之众的重要商港，贸易遍於南洋一带，远及欧洲、日本、马尼拉和南美墨西哥及秘鲁等地，出口商品异常发达，品类繁多，主要的有丝绸、陶瓷、铁器、茶叶、糖与手工艺品。据统计明万历三十四年至崇祯七年（1596—1634年）四十年时间，只对马尼拉一地的贸易，出口货品的价值即达白银26,448,011西元（西班牙元）。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影响珠江三角

洲是巨大的。商品经济有重要发展，明末清初建成著名的四大镇，“省”（广州市）、“佛”（南海佛山）、“陈”（顺德陈村）、“龙”（东莞石龙），佛山在清道光年间已发展为拥有近三十万人口的城市了，工商业都很发达，工业有炼铁铸造、陶瓷、纺织，产品遍销全国及外地；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亦在形成，为了联接产销的关系，有专门替外地客商售货的“行店”，有为包装及运输服务的“板箱行”，有“歇客行”及“酒席馆”为来往商人提供食宿之便，有“银铺”为客人存款生息及汇兑，还有“企市”（“企”粤语站立的意思），即劳动力自由市场。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的手工业有一百七十八行，商业行业七十行。为了适应商品市场的需要，农村的经济结构亦相应的起了根本的变化，顺德县基本改为桑基鱼塘经济作物区，成为生产蚕丝、制糖、养鱼、种植蔬果的商品基地，而且在养殖上创造了桑叶饲蚕，蚕沙（屎）喂鱼，塘泥肥桑，使生产循环往复，互相促进，科学先进的垦殖形式，把农村的生产推向一个科学的先进水平，出现了“沿海村落，户足人稠，商船络绎”的局面。

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算起，至今已历四百五十多年了。在这四百多年里，尽管朝代更迭，社会变化，外敌入侵和干戈战乱，这些变化也打击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虽然如此，但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始终生机未断，一直延续下来。解放后四十多年来，内地商品对港、澳的输出和转口，从未间断，港澳地区市民生活需要主要早靠邻近的县份供应，甚至食水也仰给於东江，这些历史和经济的联系，使得珠江三角洲的人民对商品的概念，对市场的概念，对价格变化的概念有深切的认识，由於这些认识，才能对“改革开放”的国策，较容易理解，较容易接受。

珠江三角洲，土地面积辽阔，有四万四千三百平方公里，1989年人口统计达一千五百八十九万人，这些地区和人口比许多国家还要大，经过十年的经济建设，渐趋成熟，已经培养出大批工商业管理人员，熟练和半熟练的技术工人，有较丰富的工商业管理和生产经验，建成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有较完善的水陆运输系统，工农业和财政状况取得巨大成就，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台资企业和个体经济各有所成。

在改革中，地方立足於自力更生进行建设，采取合资的形式投资公共事业，取得较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番禺县的洛溪大桥为例，该桥建成后，运转情况良好，现在每日通车超过三万架次，一年的收益将近三千万元，虎门轮渡，今年5月5日开始通航，接驳珠江东西两岸的汽车，通航后，对改善东西两岸的交通起积极作用，对珠江三角洲以西的经济发展展现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照这情况，估计三、四年后便可以收回投资成本，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学会：“以路养路”，“以桥筑桥”，以火力发电站建设火力发电站，作为一个企业家对每项投资都会盘算，到底是有利还是无利，无利的事不会做的。在内地做事我经常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无社会效益，一个是有无经济效益，对“改革开放”不利的我不干，没有经济效益的我也很难做，亏本的企业难以为继啊！管理学上有一句名言：“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

在改革实践中也经历过粮价狂涨，食盐断市的紧张局面。地方按商品规律，继续开放市场，所缺的物品，迅速地四面八方填补缺项，市价不久即平稳回落，现在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运转是正常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获得进一步改善，珠江三角洲人民在实践中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希望之路，广东的十年建设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是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取得的。

“省（广州市）、港、澳”三地，本地人习惯连在一起叫的。广州市属番禺，香港原属宝安，澳门原属中山，不仅因地理相连，大部分人祖籍广东，更多的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士，彼此不少是亲戚乡里关系，只是由于港澳分别被葡萄牙和英帝占领，互相之间才出现隔阂和较大的差别。由于祖国的进步和形势的发展，1997年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同胞应该高兴地欢迎这一天的来临。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和承认，由于一百多年的分隔，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统治，不同的生活方式影响，港、澳地区的市民，有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的，一家人长期隔离开之后，都会有陌生的感觉，何况多年分处在两个不同制度的社会？为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方针，我以为是合理的、是正确的，我接受这个方针，也支持这个方针，撇开一切不谈，如果北京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开明的方案，香港人可怎么办？大多数人不愿意跑，也无条件跑，跑不了，何况中国人依恋乡土之情特别深，“故乡难舍，故土难离”，离乡别井是无可奈何的事。老实说，北京对香港市民是客气的，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是照顾到我们的特点，制订基本法，就邀请各阶层人士参加研究讨论，而且也公开广泛征求香港市民的意见，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说气头上的口话，只能把事弄僵，不同意可怎么办？我们除了两条腿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为了做好一件事情，有意见可以提，也应该提，但对合情合理的方案，应该理智地接受和促其实现。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很多新的重要情况和变化，这些现象使我们眼花缭乱，“直选”、“跛脚鸭”、“北京的干预”、“迁册”、“玫瑰园”、“越南难民”、“公务人员请愿”、“兴建新机场”……；我们看不透这些事情，无所适从，香港市民过去一直为口奔波，平日埋头於生活，对政治是冷感的，把希望寄托於好人政府，现在面对一大堆新的问题，怎能不惶惑？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的，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以“越南船民”为例，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五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大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一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於船民身上已逾三十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香港政府沦为“跛脚鸭”，香港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跨越九七的大事，无论好好坏坏，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使他了解，要他们支持，北京过问是公道的。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希望中英对香港问题平心静气地商量，积极合作。7月4日发表中英双方对兴建新机场取得协议，这对香港是有利的，我拥护这个协议。

香港市民最关心的事情，我以为是莫过於香港未来能不能保持“繁荣稳

定”。从目前的条件来看，我们有不少有利的条件的。香港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是世界上三大优良海港之一，在亚太地区位置适中，经过百多年的经营，已成为发达的商业城市，有先进的通讯、交通、运输网络，有良好的服务系统，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是世界三大集装箱码头之一，是世界重要的转口和出口地区。去年统计，在全球重要贸易地区中，排行第十一位，近年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紧密，广大的企业界人士，认识到香港与珠江三角洲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在经济合作方面，事实上已结为利害相共的伙伴；有人说香港是走向国际市场的窗口，是桥梁、是服务站，珠江三角洲是“腹地”、是“港店珠厂”，两个地区的力量合在一起，“将成为九十年代亚太地区蓬勃富有实力和活力的经济区域。”

为了香港的“繁荣安定”，中英双方必须合作，不然将会影响未来的发展。英国一百多年来是欠下中国人许多债项的，但也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发展和繁荣是做了好事；过去的过去了，历史上的恩怨怨算不清的，要“向前看”。我以为日本很聪明，过去曾经是军事上的强国，纵横太平洋，侵略的结果是很悲惨的，受害者固不待言，其本国国土也逃避不了战火的惩罚，人民生活财产损失很大，但战后集中发展经济，现在其产品遍销世界各地，过去战舰飞机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都摆满日本商品，所得的利益大大超过几十年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英国在东南亚，特别在香港有长久的历史，有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友谊，为了中英双方的长远利益，为什么不看得远些？希望不要在具体事件上抱着怀疑态度，大家都需要朋友，中英双方的共同利益多於矛盾，只要大家互信、协商、合理的妥协。事情总有商量余地，“和气生财”嘛！我作为一个商人，希望大家都能合作，为香港未来“共创繁荣”。

我谈的就是这些了。可惜我接触的范围很狭，也谈得不够深，不避浅陋，望诸位会有兴趣去研究这个问题。多谢。

附录五：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

——在欧洲华人学会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霍英东

1995年7月31日。

尊敬的大会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非常高兴又有机会在这个两年一度的、令人愉快的年会上与贵会的各位朋友和来宾见面。我是以一个香港工商业者的身份参加这次盛会的。本届年会以《海外华人与中国文化》为主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衰，自有它存在的客观道理。它是属于世界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贵会举行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影响深远，造福将来。请让我向贵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记得1991年7月间，我曾在贵会的年会上作过一次讲话。现在四年过去了，世界又发生了许多事情，香港和中国同样发生很多事情。譬如，世界经济的重心一步步更加清楚地向东亚地区转移，珠江三角洲已经被人称为“世界最大的工地”；中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国家的经济力得到相当的加强；香港由于更加接近“九七”而出现的问题多多，等等。本来，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推进自己的改革开放路线并取得一定的成果，香港“九七”的回归都是必然的、正常的、无可避免的。是对世界进步、文明、繁荣的一件好事，只是近年又出现一些奇怪的事端。譬如，“睡狮”、“黄祸”⁽¹⁾之说忽然又流传起来。狮子是食人的，醒了怎么办？“黄祸”是指蒙古帝国横扫半个地球的历史，那时候中国是受害者，传播这些吓人的“譬如”的目的是什么？同时香港也出现种种反常的事端；台湾再次变成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筹码，岛内甚至还有人叫出“告别中国”的口号，在中国大陆周边掀起一个一个波浪。我以为中国人是不会愿意见到自己的国家四分五裂，如果我们还有一点自尊，我们不愿被人指手划脚，我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只是想和世界各国民族平等相处，我们只是想走向现代化，我们只是想国泰民安！我不明白引起这些事情有什么背景，说明了什么，会变出什么结果？我只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香港生活的商人，一个亲身感受现代中国种种大灾难和大变革的普通中国人，觉得有一些问题，想借今天的大会跟各位交换一下我的想法。

中国强大时，给了世界什么？

众所周知，在大约二、三百年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之一。那时，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是《易经》、《论语》、《孙子兵法》、《永乐大典》⁽²⁾，世界最早的《甘石星表》⁽³⁾、地动仪、浑天仪，特别是被人认为“挑翻整个旧世界”，的四大发明，以及从都江堰、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赵州桥等工程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智慧和品格。十三世纪末的马可·彼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时，把中国当作

天堂来介绍，使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人大开眼界。十五世纪后期的哥伦布，正是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中国的着迷，才有他后来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地理大发现。

虽然中国也有过几次拓边的历史，但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自十五世纪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开始进入“海洋时代”之后，中国至少在国家形态上显得太过稳健和保守，缺乏新的开拓精神，实际上是已隐藏着早晚要落后、挨打的危险，更谈不上对海外造成什么威胁。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宝太监郑和。郑和在 1405~1433 年间，带着当时世界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舰队七次下西洋，比哥伦布的探险早六十年，比达·伽马早七十年。其船只 260 余艘，装 27,000 多人；而哥伦布的航行只有 3~17 艘船，装 90~1,500 人⁽⁴⁾。可惜郑和是官方代表，其出航是与海禁政策一起推行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国威。这与哥伦布为寻找新资源、新机会、新市场而作的私人探险活动完全不同。中国人正是在此历史大转折的关头，失掉了通过两半球碰撞而引发商业大革命的大好机会。大明帝国为了加强皇朝的专政统治，其政治本位、官本位。权力本位，保守性愈来愈强；而西方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开拓新的道路，使经济本位、商业本位、财富本位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此后，中西方的距离亦因而拉开了。

到十六世纪后期，中国虽然一度开放海禁，广州、泉州等地，通过菲律宾与美国迅速开发海上丝绸之路，但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中国很快便退回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自我陶醉的大陆环境中。表面上，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帝国的人口等于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国内市场和贸易也远远超过欧洲，国家还处于鼎盛时期。那时，动辄以“经济制裁”对待外国的不是美国，而是大清帝国。取消口岸、闭市、封舱、禁运、停止与西方商人贸易等命令，清廷一个接一个下达。连林则徐等最有眼光的改革派，也自以为凭借茶叶、大黄便能扼制外人生命，常把贸易从甲国转让给乙国，以示“制裁”，即所谓“以商制夷”⁽⁵⁾那时，正是乾隆炫耀“十全武功”⁽⁶⁾的时候。中国人竟不知道一个历史性的生死搏斗即将来临，当局竟还是那样闭塞，那样不顾时势，那样自欺欺人，却不知盛世的骄奢早起，吏治的腐败已严重，八旗子弟开始变质，加上人口的压力大增，边乱频繁，天灾人祸叠起，长期重农抑商政策与忽视海外发展的消极后果已显现。就这样，一个曾经以文明、繁荣奢称世界过千年的东亚大帝国，一个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匆匆四、五十年间，竟至一落千丈，中国人百年挨打的屈辱便开始。人类的历史，没有比这更大的悲剧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强大时，向世界提供的主要东西，一是最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二是为什么忽然会盛极而衰，竟至突然败落的深刻历史教训。

中国衰落时，外国列强给了我们什么？

大清帝国的突然滑落，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跟鸦片毒品有关。十九世

纪州年代，英国人的鸦片潮水般从广州倒入，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掠走了大批财富，而且腐蚀了整个官僚系统，败坏了社会风气，伤害了中国人民的体质。其流毒之深广，真是史无前例。大清帝国每年因鸦片而流失国外的白银一项，达一千多万两，接近每年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⁷⁾。广州作为当时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亦因市场的被破坏而衰落。

今日的禁毒，已成为世界性的行动。美国为了“禁毒”，甚至可以派军队把人家的总统捉回来。但当年林则徐在虎门销毁毒品的壮举，只换来英国人野蛮的入侵，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要缴付 1,944 万两白银的赔款，各种被迫送出的特权和香港的被迫割让，以及更大规模倒入的鸦片。一个当时还是最庞大、最完备的大陆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大清帝国的衰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暴露无遗。此后，列强便把中国当做“病夫的遗产”，疯狂瓜分。从 1842 年至 1919 的七十七年间，外国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 709 个，其中，属中英之间的就有 163 个。到了 1949 年，这种不平等条约竟达一千多个，割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达 19 亿 5 千 3 百万银元，相当於清政府 1901 年收入的 16 倍、1901 年全国工矿总资产的 82 倍。被疯狂掠夺的财物还未计算在内，战争造成的损失亦未计在内。仅仅八年抗战，中国便伤亡 3,500 万人，损失 600 亿美元。还有总计 62 亿银元的外债、其中约 88% 为军事、政治性恶债。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70% 由广东负债，还有大批苦力被掠夺出国，广东的落后亦与此有关。⁽⁸⁾

1842 年 8 月 29 日（时道光任皇帝）在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第一个耻辱的“南京条约”。砵甸乍（英侵略军指挥之一、后出任港督）对耆英（将军）、伊里布（中堂）发表一番专横、伪善的讲话：“要禁止在英国种植鸦片或禁止这害人的贸易，是不合乎英国的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用专利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也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假如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员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中国来。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於中国，假使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使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中国人民总要设法得到鸦片，而不管英国的法律如何……”。堂堂大清帝国，为甚么会给英国侵略者指着鼻子数落得无地自容！？“人先自侮，然后人侮之”，知耻近乎勇，鸦片战争的历史和教训，我们和子孙后代都应当铭记心头。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在这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下受侵略、欺侮、凌辱、践踏、宰割、歧视、挨打和蒙受奇耻大辱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衰弱时，列强给我们的东西。百年来，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竟被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受尽大小各国的欺侮，简直焦头烂额。人类古今之耻，实以此为最，想到这一点，也许会明白今天某些人的“睡狮”、“黄祸”之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我不想请各位学者面前讲解中国近代史，只是看到眼下的一些中国人似乎喝了忘川之水，雨过忘雷，忘记了这段历史而有感而发。在这一辈人心中

还有无法平抑的巨大伤痛时，新一代人对这段残酷历史却已几近无人认识，这不能不使我感慨万分了！

我自己是不会忘记这段历史的，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全国要求废除“廿一条不平等条约”，及收回旅顺、大连；北洋政府的军阀正在混战，英美法日各国正在天津、长江、北京、上海、广州接连恐吓、示威、挑衅闹事的一年。我 12 岁时，中国便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到香港沦陷时，我才 18 岁，高中还未读完便被迫停学了。我亲身感受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所以，我对近百年来那些为中国寻求解脱之路，前赴后继地探索和牺牲的先行者，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对他们的事业非常向往。这一解脱之路，这一事业，就是开拓中国现代化之路。

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的艰难

近代中国的落伍，应从清顺治的海禁、迁海、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开始。这一政策名为防郑成功、张煌言的反清活动，实际上大清帝国一向推行重农抑商、专制封闭政策和妄自尊大的表现。其结果是扼杀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窒息思想文化的交流。当时的嘉庆皇帝甚至愚蠢到有“天朝不宝远物”⁽⁹⁾之说，连西方人传来的地图、历法、地球仪、火枪、船模、望远镜、钟表、玻璃全当做好玩的贡品。只有鸦片例外。就连极力主张闭关的代表人物琦善家里还藏有番银一千万两⁽¹⁰⁾，其洋化程度远超过大贪污犯和坤。

腐败，一向是中国的致命弱点。据史家的调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推行洋务运动时，中国所有军工、民用和私营企业的资本总额只有 2,000 多万元，而在大官僚手中的资本却在若干亿两白银以上。容闳就说李鸿章一家的私产高达 4,000 万两⁽¹¹⁾。这些资金不肯用于工商投资，而只是购置田产，挥霍享受，或窖藏起来。比较起来，李鸿章年代的腐败还远不如民国的军阀。

内乱不断，一再加深中国的危机。民国以来，情况更为严重。像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之战那样，山东、陕西、贵州等地也大战不休。四川在 22 年中的战乱，竟有四百多次⁽¹²⁾全国 19 年大内战惨不堪言，经济、政治、社会混乱到极点，人力、物力耗尽，国家的基础已近一无所有。

腐败与动乱会毁灭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以此为鉴。正是专制主义、蒙昧主义、腐败、内乱与外国势力贪得无厌的欲望、疯狂的暴力、政治讹诈、凶悍的入侵结合在一起，把中国推到落后、挨打的道路上。

这一切使中国在寻求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时，一开始便被迫走到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路上，因而要付出特别惨重的代价。而且，现代化的进程也一再被打断。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确实十分艰难。

事情虽然如此，但中国文化根基深厚，国家衰而未绝，贫而未竭，中国人德性未失，智慧和力量犹在，奋斗精神尚存。列强的介入，使中国面临“三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界精英奋起抗争，一百多年来，来见有停顿之时，从“师夷”、“应变”、“自强”、“求富”、“商战”、“学战”、“变法”、“维新”，“新政”、“宪政”等策划，到悲壮的“救亡”、“图存”的行动，到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和关于“西化”、“欧化”、“世界化”的热烈争论，还有义和团、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解放战争等，一个接一个的民族运动、爱国运动和战争，实际上都指向一个目标：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回想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外国列强似乎总站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守旧派一边，反对新兴的力量，更乐于见到中国的分裂，支持各自的代理人，制造混乱，而最理想的，还是把中国瓜分了。

列强对中国的政策之错误，其设计之不台时宜，连本世纪初率兵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都清楚地知道。瓦德西曾明白无误的说过：“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力下策。”⁽¹³⁾

一个千年相继的、庞大的国家，自有她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内在力量，外来的一时势力，怎可存有无理的奢望。今天，不论是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无路可退，唯有排除一切险阻，义无反顾地走向现代化，才会回到世界发展的主流。这样，只要中国自己不出问题，世界上是再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挡她的前进。

其实，西方人的“睡狮”、“黄祸”之说，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成果是矛盾的。现代政治学的成果说明：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愈高，政治会愈开明，社会愈稳定，文化愈开放，经济愈繁荣。赤贫国家的暴力事件，是富裕国家的四倍⁽¹⁴⁾。虽然现代化过程可能会出现混乱，甚至可能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动荡幅度最大的历史时期。但现代化与稳定性是不可分的。为何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反而会有“祸”起呢？

对中国能否走向现代化之路，如果还有一点忧虑的话，那就是中国人自己了。中国近世之现代精英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究竟有几次碰到过历史性的机遇？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都有人说过。在一本叫《九死一生》的书中甚至说是九次。不过，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就不知道了。譬如“洋务运动”是否真把洋务搬来，中国就可实现现代化？又譬如“新文化运动”，谁为“体”，谁为“用”，争论非常热闹。好像“体用”之说一旦争得明白，中国的现代化就有望了。是否如此，我自然不懂。我只是想，现代化问题如果只是在文化上进行讨论，是会很被动的。还有什么“立国”之争，情况也是如此。

我以为，中国人的失误之一，就是不仅迟迟未真正认识到现代化是无可避免的历史选择，而且未能认识到现代化是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制度化、民族化，以及民众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一个有机整体。

我们很难想象，任何单一方面的进展，可以导致现代化的实现。

譬如要求民主，我是支持的。但我同时赞成，在目前的中国，民主要与权威有个统一。思想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中国古代就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了，为何千百年过去，还未有民主？这说明，民主是个很复杂、很独特的过程。民主要以科学力基础，因而要以现代化为基础。为了得到今天的“民主”，英国人花了800年时间，美国人花了100多年时间。其实际所得，还不是真正的民主。英国人得到“民主”，却野蛮地挟武力东侵，德国人也得到“民主”，结果是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章太炎是清末激烈的改革派，后来却被批为保皇党，其原因值得专家去分析。中国当然不要有皇帝，但需要有领袖、有权威，要上令下行。人民有权监督政府，腐败当然要反，做官要有法度。要多听各种不同意见，人人要心系国家安危，全力以赴把经济搞上去。民主的风气，民主的制度，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要想一夜抹去二千年的传统是不现实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辅而行的，没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现代化的精神文明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现代化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会停滞，倒退，甚至於崩溃。古埃及、罗马、波斯及我国汉、唐盛世、其、烟飞灰灭的历史可以作为后人殷鉴！

官商经济若不改变，中国的现代化未必能实现

历史的必然是一回事，历史的事实又是一回事。一个历史必然的东西，往往会因另一个历史事实而被延误凡百年。作为历史必然的中国现代化，未必能保证在我们这一两代人之间实现。

以我的观察，直到目前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在本质上还不是企业经济，不是资源经济。其根子就是政企不分，众多的有权人士不肯转换角色，不肯放弃可以猎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在放公平竞争一有权力插手，公平就没有了，竞争也没有了，市场更无从说起。至於权力如何导致腐败，已经是学生的常识了。

中国人非常聪明，有文化、有科学、有技术，同样有商业头脑，更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为什么后来变成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地位低、军事上挨打、文化失范、社会混乱，似乎万事不如人的国家？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从经济上看，有一个现象是很突出的：历来都重农抑商，历史上，科举是名成利就的捷径，一般希望子女读书考取功名，一朝为官，可以出将入相，为万民的父母，以后又当官，又当地主。地主与官僚之间好像形成了一个“生态圈”。这一现象很重要，因为当完官要回家当地主，当“富时就一定用各种特权掠夺财富，掠得愈多，表示这个官当得愈好，愈有才能；两袖清风回家的官，必定是“窝囊种”。所以贪污腐化成了旧官僚的一种本能。更严重的是，因为回家当地主，首要的事情自然不是拿钱财重新投资去扩大生产，而是购田置物，千方百计显富比贵。从颐和园到苏州、扬州

园林，莫不穷奢极侈，国家也始终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进入世界市场，西方近代的资本家·把赚钱、节约、积累看作在行上帝的路。这是旧中国的官商无法学到的。

直到现在，我们在珠江三角洲一些不久前还是苦不堪言的地方，看到一些刚刚小富起来的人，把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大多数放到非生产性的消费上，在生活上摆富比阔，超乎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建大楼房，追求美轮美奂，亭台楼阁，湖光山色，极尽豪华气派。其实，这就是历史上在一种闭塞农业社会中形成的的地主心态的表现。这种风气放发展生产、搞活经济非常不利。

资本主义社会是严禁官员经商的，而且以保护私人商业、促进民间企业发展为基本国策。西方就出了很多有才能的企业家，而且他们是非常敬业的。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登过硅谷一位风云人物乔布斯的照片，38岁仍然穿着工作服，自己骑摩托车上班，其私人住宅内还是空空如也。但那时他已经是世界500首富之一了。

中国商品经济，春秋战国前已经存在，商代就有王亥“服牛乘马”经商，秦始皇的义父吕不韦是大商人，手工业、武器、交通工具都有相当水平，但商品生产却为王室所垄断·楚国工尹（工商部长），其地位仅次于令尹（宰相），历代重要商品俱为王室服务，例如瓷器，就有所谓御窑、官羔，最好的工匠都由官府管理，商贾是四民之末，中国确曾有过官商分离、商业繁荣的时候。北宋的《清明上河图》就显示了一片生气盎然的商业气势。明末更有禁止官经商的命令，甚至出现了一些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可惜明末经济发展的进程最终又被政治军事行为打断了。

从革命转向搞经济，从自然的农业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多种经济并存，既放手发展个体经济，坚持扶持国营企业，这条路是不好走的，过去没有过，很困难，但必须要探索，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然，何谓改革开放？这种变化是比任何改朝换代的转变更深刻：更困难，而又更有深远意义的转变。为此，政府必须明确转变职能，健全法制，政企分家，确立有效的税收制度，切实关注公共事务，其中以建立健全的税务制度最为重要。政府不应插手经济活动，而应保持有利於促进市场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稳定政策，要严禁官商。古有“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之说。但现在是中国产权变革的重要时刻，有些人只要一有机会，便千方百计去吃国家，吃外商，吃群众。而真正的企业家却往往被弄得寸步难行。如果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不能让私人企业自主经营，这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公平竞争和市场发育，因而不可能与世界经济接轨。

香港的回归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香港的历史是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一起开始的。英国人强占香港的原意，不需要我们再去说明。问题是入侵者的意愿是一回事，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另一回事。

今天的香港已经与好几个“世界第一”、好几个“世界中心”的荣誉连在一起。有些国家很少人知道，但香港却很少人不知道。世界在近百年兴起的城市中，没有一个能与香港相比。我们已经不必要一一列举她的成就，香港的确已经名动天下。

平心地说，香港今日的成就，过去的港英政府是有贡献的。其中主要的贡献是发展了市场经济，政府对工商业、贸易采取“积极的不予干预”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去年香港的税务收入几达二千亿港元。阎罗王也惧伯税务官的，普通人是税网难逃，企业家发财何惧之有？

但说到底，香港的成就主要是靠中国，尤其是广东人的勤劳和智慧，靠整个中国大陆的支持。所以，今天的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及整个广东的经济，已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这一点跟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关系极大。历史上，香港一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地。辛亥革命有八次战争是在香港策动的；解放前中共在香港也异常活跃。香港世俗化的、重实用的文化，培养了很多人才。从康、梁到孙中山，包括王韬、郑观应，都是在香港受训练后回国起作用的。民初总理唐绍仪、财长陈锦涛、外长伍廷芳等。都是我母校皇仁中学的前辈校友。在中国新一轮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中，香港不仅为内地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国际信息，而且成为大陆与国际接轨的枢纽，特别是成为三千多万华人与大陆交往的主要关口。而这数千万海外华人，据说掌握着二万亿美元资产，这比目前中国大陆的国家总资产大约高四、五倍。

回想中国近百年追求现代化的艰难而惨痛的历史，可以知道，一个如此庞大、如此僵化的国家，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是难以有什么变化的。所以，今天的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而香港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时常想，俄罗斯与东欧的改革，困难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点是因为缺少一个他们的“香港”，因此，我更加觉得中国一再宣布“九七”之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是非常重要的，我完全赞成。这表示中国不仅认识到港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香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中有独特的、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香港目前的问题确实出自港英政府。中国政策的要点是，除了主权回归之外，其余的事情不要大变。港英政府却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

香港什么时候有过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号，生出种种奇怪的事端：政制大变，立法局要揽权，新界传统的村庄又忽然发起女权运动。而其中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使房地产十年间升值十倍最成大害。现在，较好的商业铺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铺，也要几十元一英尺的租金，所得的利润几乎尽付於租项，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标升，失

业猛增，七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瑞兴要亏本，南联搬入鹤山，不少大集团在册迁或变相册迁。香港的竞争力迅速减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击，百业呆滞，购物天堂渐失去其优异地位。借款供楼的小业主，更是苦不堪言。

政治、社会如此，环境问题亦如此。机场问题、公路问题、码头问题、港口问题，维多利亚港已经变成维多利亚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计划。总之，破坏性的“发展”到处可见。而这一切，观察家说，还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处于这种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后的日子里究竟想做什么。

不过，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今天的中国确实不再是第一位港督沐甸乍时代的中国。中国走向现代化是没有回头路的，香港的回归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可缺的一部分。在回归前夕，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香港社会出现不安，忧虑、波动，是难以避免的。但我相信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我相信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人民要改善生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十二亿人民的希望，任何横逆都改变不了这历史的巨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渐兴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荣最大的保证。我相信香港将来仍旧会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仍旧是中西文化交通桥梁，香港仍旧是中国大陆与世界经济往来的重要港口。为着香港稳定、持续、协调和公正的发展，为着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香港一切有关人士都应当明白自己所处的时势和历史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谢谢各位！

注 释：

- (1) “黄祸”说，出自德国画家纳克菲斯。他有一画，以日本人为对象，极力渲染黄色人种对“西方文明”的威胁。鼓吹西方国家要防止“黄祸”。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将此画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有意无意之中，成了1904年二月爆发的日俄战争前的小插曲。“黄祸”之说由此而起，见《勿忘九·一八》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P9此后，有史家引伸到蒙古、匈奴的西征。
- (2) 《永乐大典》，明成祖时大学士解缙（江西人）主持，组织儒臣，文士3000多人参加，1407年（永乐五年）完成。收古书8000多种，共22937卷，3亿7000万字，装成11095册，为世界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巨著，比英、法的百科全书约早300年，原书正本失於明末战火，副本在八国联军入北京时大部分被烧、被枪。目前存世者，仅剩副本的4%左右。
- (3) 《甘石星表》又称《甘石星经》，为战国时齐国占星家甘德（甘公）及魏国占星家石申（石中夫）的著作，被西汉学者整理而成。内记约120颗恒星的精密测量数据，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和记载了800多个恒星的名字。这是世界最古的恒星表，比古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二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约早200年。见《中国

大百科全书·天文卷》

- (4) 关于郑和船队与哥伦布· 的比较, 见黄邦和等编《通向现代世界的 500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P338—351 (5) 十八世纪后期清帝国入口、贸易与欧洲的比较及“以商制夷”情况, 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P249—251
- (6) 乾隆(1711—1799) 25 岁即位, 在位 60 年。自称“文治武功”古今第一人。曾发动十次平定边疆少数民族的战役, 均大获全胜, 为清代“武功”的极盛时期。对此, 乾隆生前, 一直志骄意满, 自号“十全老人”, 大肆炫耀“十全武功”。而乾隆於 1799 年离世后, 不过 41 年, 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 (7) 关于鸦片流入对中国的破坏, 参看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五期《内务府奏审拟张进幅鸦片烟案摺》; 《林则徐集·奏稿》《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 3《湖广奏稿》; 《国耻的开端》,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 P43—45
- (8) 关于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及主要条约与赔款情况的介绍, 见朱育和等编《中国近现代国情问题剖析》,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P312—322; 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 P348—372; 马字平等编《中国的昨天与今天》,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P22—24; 其中关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军民伤亡人数, 此书 P533 说 2100 万以上, 杨克林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引语说 3500 万人。
- (9) 嘉庆皇帝(1796—1820), 见吕涛编《国耻的开端》,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 P21
- (10) 琦善家藏番银一千万元, 见吕涛编《国耻的开端》,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年, P22, 近日见有不同见解。例如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出版的《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 在第一章中, 否定琦善有卖国罪, 并认为他不可能有那么多资产。
- (11) 洋务运动时期, 中国企业资本与李鸿章私产比较数据, 见《比较中的审视: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P777; 另外, 关于历年银元与铜钱的比值, 参见《中国昨天与今天》, P25
- (12) 中国的内乱情况, 见《比较中的审视,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P800
- (13) 见《义和团》资料丛刊、第 3 册, P244
- (14) 关于现代化与稳定性及贫富与暴力事件之间的关系, 见 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三联书店, 1989 年、P37

附录六：霍英东生平大事年表

- 1923 年
5 月 10 日，降生在父亲驳船的舱板上。
- 1929 年
经营驳运生意的父亲在一次风灾中舟覆人亡。仅仅过了 50 多天，又一次出海翻船，两个哥哥落海淹死，葬身鱼腹。一家人迁入简陋肮脏的棚户区。
- 1932 年
在敦梅小学的自由义学读了三年。
- 1936 年
考进皇仁书院，刻苦学习五年半，成绩优异。后因日军占领香港，加上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再没有去学校。
- 1942 年
被生活所迫，每天到船坞、机场当苦力，一次扛油桶，一个指头被压断。有一段时间几乎处于半流浪的状态，浪迹香江，受尽凌辱。在母亲与人合资买下的杂货店里当售货员。
- 1943 年
结婚，一年后女儿霍丽萍出生。
- 1945 年
日本宣布投降。霍英东母亲再次经营起搁置多年的驳运生意。霍英东仍在母亲的店铺打工。儿子霍震霆出世。
- 1946 年
说服母亲，拿出自己份下的佣金，作买卖战后物资的生意，勉强有了一些积蓄。
- 1947 年
借钱参加一批战时剩余物资的投标，中标后因无钱出货，只好卖单，赚得 22000 元，这是第一次赚到作为日后发展的本钱。
- 1948 年
率领一批渔民到东沙群岛捞海藻，基本上是失败的，带回来的海藻，仅够贴补开支。
- 1950 年
抗美援朝期间，驳运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
- 1954 年
成立立信置业公司，开始进军房地产业。首创了预售分层楼花。
- 1959 年
淘沙及疏浚澳门港口、开发航运和娱乐事业。
- 1961 年
应何鸿桑的邀请，合盟竞投澳门赌牌，一举成功。
- 1962 年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成立，出任董事长。
- 1967 年
“星光行”大厦招租受挫。
- 1972 年

承建香港大埗海底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1975 年

争取中国重返奥运及“国际足联”。

1979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回故乡番禺寻“根”。

1980 年

建中山温泉宾馆，开创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河。

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副政协常委。

1983 年

2 月 6 日，投资兴建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并率先向民众开放的第一座五星级豪华宾馆。

1984 年

捐款 10 亿港元设立霍英东基金会，他说：“我成立基金会唯一的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

10 月 1 日，参加国庆盛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10 月 2 日，在国家体委的招待会上，捐赠 1 亿港元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

10 月 6 日，向暨南大学捐款 100 万美元。

10 月 15 日，参加红线女的独唱会，即席以 10 万港元买了一本《红线女独唱会专辑》。

10 月 31 日，公开悬赏 50 万美元，给在 5 年内有胡荣华参加的大赛中，夺取冠军的非华人“国际象棋大师”。

11 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后，发表了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

1985 年

2 月 23 日，邓小平会见霍英东，海外有记者猜测说：“中共最高决策人物邓小平对霍英东的接见，实际上是对霍在香港的地位的确认。是有安排的、有选择的、精心设计的”。

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霍英东基金会捐资 100 万美元，设立出国留学奖学金，鼓励和支持学子走出国门，学成回国服务。

1986 年

4 月，捐赠 1 亿港元，支持国家教委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并设立青年教师基金及青年教师奖，资助和奖励全国高等院校的优秀青年教师。

9 月，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伉俪访华，在广州、香港两次接见了霍英东。

1987 年

2 月，接受南中国最高学府——中山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1988 年

为表彰霍英东对广州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等多方面的重

大贡献，广州市政府在 9 月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1990 年

2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霍英东，与他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1991 年

5 月 5 日，国内第一座双层桥式渡轮码头——虎门轮渡码头开始营业。从此，珠江口东西两岸得到沟通，虎门海峡变通途。

11 月 18 日，霍英东捐赠 4000 万港元建设的北师大新教育楼落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表示祝贺。

1992 年

9 月 30 日，霍英东在他家里的花园设宴款待在 25 届奥运会获得金牌的 17 位健儿，并向他们颁赠金牌和奖金。

1993 年

3 月 24 日，在全国人大大会上，以“岁月峥嵘，喜迎机遇”为题，就开发南沙问题发表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讲。

1995 年

7 月 31 日，以“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为题，在欧洲华人学会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1996 年

3 月 5 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并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座。

